SHIJIE XINWEN CHUANBOSHI

明天传播学丛书

传播符号学

余志鸿＼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郁金豹
责任编辑／陈杉杉
封面设计／雨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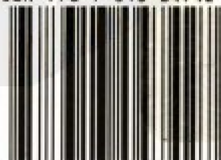
www.jiaodapress.com.cn
bookinfo@sjtu.edu.cn

SHIJIE XINWEN CHUANBOSHI

明天传播学丛书

- 传播学通论（第二版）
- 组织传播论
- 传播符号学
- 世界新闻传播史（第二版）
- 当代西方传媒制度透视

ISBN 978-7-313-04742-7



9 787313 047427 >
定价:18.00元

明天传播学丛书

传播符号学

余志鸿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语言学原理将符号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传播学，颇多独立见解和创新观点。书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具体的事实进行分析，分别论述了符号学的创建和贡献、符号中的学问、符号原理和结构系统及其传播功能等，指出没有传播符号也就没有传播的互动和传播价值的体现。

本书可作为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符号学/余志鸿著. 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明天传播学丛书)

ISBN 978-7-313-04742-7

Ⅰ.传… Ⅱ.余… Ⅲ.传播学-符号学 Ⅳ.G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048 号

传播符号学

余志鸿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0.75 字数：196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50

ISBN 978-7-313-04742-7/G・943 定价：18.00 元

明天传播学丛书编委会



序

虽然人类的传播活动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虽然人类对自己的传播行为的研究从人类有传播活动开始就未停止过，虽然人类对自己的传播行为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但中国人对传播的探索和认识也许是最早和最深刻的，正如传播学大师宜伟伯教授描绘的：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知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播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

著名传播学者、传播学中国化的强有力推动者余也鲁教授也深刻地指出：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播理论与实际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教人诧异。也许像刚刚说过的，传播行为太普遍，反而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近20年来，由于通信与交通工具的发达，人际与国际接触频度的大幅度上升，再加上现代传播工具的深入家庭，因此传播活动所形成的问题，以及更多与更频繁的传播需要，促成了现代对这种基本活动本身的注意，开始有了从不同角度与不同侧重点来进行传播研究。

这套丛书是又一次探索，是从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对传播学进行的综合探索，以找寻到一个出发点，一个研究的方向与范畴。

明天传播学丛书编委会

2000年5月

前　言

我是从语言学研究进入到传播学和传播符号学领域研究的。喜读一些文学作品，每吟咏唐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韦应物）、“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孟郊）、“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王维），仿佛置身于一个具有生命的自然界，风雨冰雪，日月山水，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都是能爱能恨、敢说敢想的“人”。于是，我渐渐跳脱“明月”“风雨”“梧桐” “桃花”“鸳鸯”“山水”这些词语的直指意义，发现只是一个个带生命的符号，联结着作者富有强烈情感的心灵，从而发现语言不仅仅指示客体事物，更是人类心理和思想的代码。

从儿童时代到步入成年，我从识字开始，学习各种知识，也从生活的经验中学习社会知识。在我“知天命”之际，真实地回忆自己的所谓“知识”，才真正感悟到经验知识是如此的微薄，我的“知识”几乎都在自己的“语言”中。特别是我们的母语——汉语汉字，无论其音韵的和谐美、文字的形象美，提供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形成了许多语言外的“知识”。这也引起我对什么是“知识”的思考。人类的知识，按获取的方式大概可以分为感觉的知识和思维的知识，前一方式获得并得到人们经验认同的一般称之为“常识”，后一方式获得并经过现实验证的一般称之为“科学”。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都必须通过“符号”做中介，才能传播，才能成为社会的共享财富。人类所有的知识中，最具有共享性的是“语言”知识。这里不是指“语言”这个东西自身的知识，而是指“语言”承载和传递的知识，即“语言”的每个单位里蕴涵着的人类认知世界的知识，整个“语言”系统便是整个人类的全部知识。没有被人类认知的世界的那部分，没有语言化，就不是“知识”，或者说它们在人类的“知识”之外，那么它也就在“语言”系统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人类“知识”的全部；人类的一切“知识”正是靠着“语言”的包装而进入人类心灵的。

语言不仅是知识的包装，也是借以表达知识的唯一工具。这样，人类的语言担当了多重角色，它既是知识的代码，知识的包装，又是知识的传播手段。说到语言，自然就归结到“词”。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词”都有实指的对象，具有实指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通常都“先验”地被规定——以定义的方式记载在词典里，其定义方式又是用别的“词”来规定它。我们意外地发现，原来人类的“知识”竟然是一个无限博大的循环：甲词被乙词定义；乙词被丙词定义，丙词又被丁词定义……乃至

最后被定义的词回过来去给未定义的词下定义。人们认为这个过程获得的“知识”是科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给“词”的解释往往并非如此。比如“雨”在词典中定义为“空中水蒸气遇冷变成的落向地面的水滴”，对缺乏“雨”知识的人绝对不会这样认识，他们只有切身感觉到的天上落下来的水滴——倾盆大雨或者毛毛细雨；而且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对同一事物引发的意象是不一样的，也会对“雨”的意义出现不同理解。同样的道理，比如对“冰”的理解，中国南方和北方就不同，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几乎看不到自然形态的冰，当然难以接受“冰”的概念，所以北方人说的“冰棍儿”或“冰棒”，广州人就叫它“雪条”或“雪糕”了，因为广州人认为“冰”和“雪”是没有根本性区别的。这是常识。

这样，语言表达的知识就表现得很不同：一种是表达科学的知识，在那里力求把语言变成不带任何个人因素的东西，并且使语言中的每个成分——“词”成为高度抽象的、远离感官世界的可定义物，因为它离感官世界越远，你对世界的把握就越准确，你的知识就越从常识走近科学。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越是接近逻辑上的抽象，那么我们认识上不可避免的差别就会变得越小，一致性越强。这一点很重要，它使我们排除了对任何“词”实指意义的依赖，消除了存在物对“时间”和“空间”为本身目标的依托。比如“你”这个词，每个个人在使用中具有某种实指意义，总是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某个个人，但是在“语言”系统中存在的“你”，则既不是指张三，也不是指李四，而是直指话语交谈中的对方（不管这个人是谁）。于是，我们把语言分为带有个人认知局限的具体语言和属于全社会共享的非经验性的抽象语言。

我们对语言的这种分析，促使我们作如下思考：人们在现实中使用的语言，都立足于个人的感觉知识——语言常识；而个人感觉是我们全部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又使我们进入深层的思维，使我们远离实体事物的直接意象而达到事物的本质，获得科学意义上的知识。以往我们还没有能在最广泛基础上——所有人所共有的、超越任何个人感觉——来确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传播符号学。

我们知道，语言始终被分解为双重“人格”，其一属于使用者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另一属于全社会共有的知识和理念。但是语言又必须体现双重价值，其一是传递信息表达意义，另一是描写事实表达客体事象。同时我们发现语言既是物质的又是抽象的，它由物质的可听感声音或可视觉文字组成，又由无法让人们直接感知的意义组成。我们准备在对语言的这一基本认识基础上展开传播符号学的论述。传播学的符号跟语言符号有典型的相似性，但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适用性。传播符号跟语言一样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价值，也具有物质性的能指和抽象性的所指，但它同时跟语言不同，它少了一些语言的个人经验和情感，既具有跟物质世界客体事象联系的实指性又具有远离客体世界而跟意识形态发生联系的意指性。

所以，传播符号学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传播学，也适用于语言学，更广泛适用于包括艺术和科学的一切学科的研究。符号学产生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由皮尔斯、莫里斯、巴尔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洛特曼等符号学大师的补充修正、发扬和发展，其理论和方法越来越精细，并被普遍运用于传播学研究。

当我们在分析符号系统时，发现它跟天文学上的太阳系和物理学上分子—原子结构的分析十分相似。目前跟地球人最有直接关系的是太阳系。太阳系是由太阳、行星及其卫星、小行星、彗星、流星和行星际物质构成的天体系统。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其外层是八个大行星，还有数以万计所占微乎其微的小行星；太阳的质量占太阳系总质量的99.8%。八大行星及无数小行星沿着自己的轨道万古不息地绕太阳运转着，同时，太阳又慷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太阳系中的每一个成员，促使他们不停地发展和演变。这是宏观的天文世界的基本结构。在微观世界，世上所有物质都由细小的原子构成，而每粒原子有一个被不超过八个电子包围着的原子核。肉眼无法观察到的原子核内含不带电荷的中子及带正电荷的质子，而带负电荷的电子则沿轨道环绕原子核运行，情况就好像行星环绕太阳运行一样。

那么，符号系统呢？符号系统也有两个基本层，内层是意指，意指由客体事象的心理印迹和符号的意义组成；外层是各类符号，符号按其功能分布于各个层级，进行相应的组合。每个符号的表层是物质形式能指和意识形态所指的结合体，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功能和意义。意指是符号系统的核心层，它不断向外层符号运动发射能量，通常情况下核心层意指的"能量"和外层符号的"能量"是平衡的，构成符号得以建立和在社会传播中发挥作用的稳定基础。这跟原子核的情况相类似。"能量"是一个比方说法，能量平衡的意思是指符号外在形式——能指包裹下的所指意义跟内在意指的直接意义之间存在直接对应的联结关系。但符号运动中始终有人类心理印迹的参与，使符号意义处于浮动状态。符号内核心理印迹的参与相当于原子核能量的释放，使外层符号的所指发生变异，产生"浮动的意义"。心理印迹使符号的意义产生分化，分化为跟外层所指意义对应的直接意指和跟外层所指意义发生偏差的非直接意指——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也叫隐喻意指)。心理作用越大，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的能力越强，就使外层符号的原有意义变得越弱(略相当于原子核外层的电子衰变)。随着心理印迹巨大作用的不断加强，内核意指的能量不断向外层释放，外层符号离原有意义越来越远，甚至最后蜕变为新的符号。传播符号的运动跟原子运动何其相似乃尔！它始终在平衡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形成新的变化机制，符号不断创生，规则不断创新，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人类认知域不断扩大的无限的知识圈。

记得小时候，我家乡上海市郊青浦县重固镇北有座小山，其实算不上是什么

山，只是小土丘而已。我和我的童友们常常做爬“山”游戏，捉迷藏、放野火，以此为乐。据说山上有座庙，很久以前庙里有个姓薛的道士，很有法术。人们便把这座小“山”称为薛道山。有人说这山上以前长满桃树，结满甜美的雪桃所以叫“雪桃山”。因为山体形如颠覆的小船，所以也叫它“覆船山”。当地文人以其名不雅，谐音雅称为“福泉山”。时隔50年，我返回家乡重游故地，发现此“山”已被铁丝篱笆围住，触及感官的已非童稚眼中所记，仅是荒秃的土丘。有一简陋的牌楼，匾名“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福泉山墓地”。同一地方，先后出现四个不同的名称！名称就是符号，符号所指的直接意指——直指意义没有变，都是直指同一个地方。但是，随着符号能指形式的变化，符号内核的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使所指意义产生了浮动，“薛道山”与姓薛的道士曾建庙于此有关联，“雪桃山”与当地物产有关联，“覆船山”与此不是山的“山”的形体有关联，这是间接意义；“福泉山”之名则与此“山”的出处、形体无关，“山”既无泉水，亦未降福于当地百姓，完全是一种联想意义——反映了我的故乡人民几百年来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是，1982年新的发现对原先的命名符号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原来家乡的那片“山”根本不是山，竟是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的高台墓地。符号在远离自身的直接意指后经过联想的隐喻，从“薛道山”“覆船山”到“福泉山”，最后能指发生急剧衰变，形成了新的符号——“福泉山墓地”。据说原始上海人就是从这片土地开拓进取的。虽然这个新符号对应的客体事象没有变，但是它的直接意指变了，地方仍然是原来的，不是“山”而是“墓地”。有意思的是，当地老百姓也包括我，仍喜欢叫它“薛道山”。“福泉山墓地”这个新符号，也许将引发我无限遐想，不知“墓地”这个古文明的发源地，能否真实地给家乡的农民带来幸福的源泉。

符号的生命运动就是这样微妙，它以可感知的能指形式给人以常识，又以直接意指的方式给予人们超越常识的科学知识，进一步又以内在的间接意指和联想意指启迪人们去遐想，去畅游符号世界——那里有非语言的传播，有无比优美和充满想象的艺术境界，也有无比深奥和充满考验的科学神殿。我在现代传播活动的符号世界里畅想，漫步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享受符号之美和意指之美。本著正是个人在心灵享受之余的心得，愿奉献给读者，并祈赐正。

是识于2006年11月27日，北京葫芦胡同。

余志鸿

目　　录

绪论 符号学的创建及其影响

0.1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图 0-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aaure,1857~1913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及理论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本人则因此而被推崇为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之一。索绪尔在语言理论方面的创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内容,构筑了此后语言科学的基本框架。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R. Robins)这样评价:“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①]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给了后世学者以极其深刻的影响,英国学者莱昂斯(J. Lyons)论述说:“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②]因此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

索绪尔于1857年10月26日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殷实的法裔家庭里,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曾出过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等多位学者。索绪尔自幼便在这个环境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科学思想的熏陶,表现出独特的语言天赋,他学会了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据说少年索绪尔就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并在不满15岁时以其语言天赋撰写了一篇叫《论诸语言》的论文[③]。1870年,索绪尔进入马迪纳专科学校学习希腊语,1873~1875年在日内瓦公立高中对语言学兴趣盎然,他开始自学梵语,阅读葆朴的《梵语语法》(Grammaire du sanscrit)和库尔替乌斯(G. Curtius)的《希腊语词源学基础》(Grundzüge

---

① Robins R. H.. 语言学简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5.

② 戚雨村. 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J]. 外国语,1995,6.

③ 赵蓉晖. 索绪尔生平事迹及其学术道路[J]. 澳门语言学刊,2004,27.

der griechischen Étymologie)。1875 年，18 岁的索绪尔进入日内瓦大学，主修化学和物理学，但他同时还选修了哲学、历史、艺术和语言学等课程。经过近 1 年的学习，索绪尔更加坚定了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决心。1876 年，他申请加入了巴黎语言学会。同年 10 月，他转学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1878 年 12 月，年仅 21 岁的索绪尔发表了他的杰出论文《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Les Mémoire sur le systè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 les langues indo-européenes)，使老一辈语言学家大为震惊。1880 年秋，他离开德国到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教授哥特语、古高低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比较语法、立陶宛语和梵语等语言学课程，同时兼任巴黎语言学会的秘书。在法国 10 年期间，索绪尔培养了梅耶(M・Meillet)、格拉蒙(M・Grammont)等著名语言学家。

1891 年，索绪尔离开法国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讲授印欧系语言历史比较和普通语言学。1906 年他出任普通语言学主讲教授职位，开始了三轮的普通语言学讲授。1912 年夏，索绪尔不幸得了肺癌。1913 年 2 月 22 日与世长辞，享年 56 岁。可惜索绪尔一生述而不作，没有为自己富有创建的学术思想留下专门的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C. Bally)和薛施蔼(A. Sechehaye)根据部分学生的课堂笔记和残存的索绪尔手稿编辑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于 1916 年在巴黎出版。这项工作才使索绪尔富于创见的学术思想得以为世人所认识，并在经历了最初的沉寂之后终于引发了语言学界内部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①]。《普通语言学教程》先后被翻译成德、西、俄、英、日、中等国的文字，是一部经典的传世著作，成为语言学的必修课程，其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索绪尔"述而不作"的教育传播思想，而由他的弟子整理成书，颇使人联想到中国的儒家创始人、教育传播家孔子和他弟子整理的《论语》。索绪尔以其如此特别的方式，奉献给了人们一部世界级的学术名著，同时又给后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科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当学者们提到语言学和符号学时，谁也绕不过索绪尔。

索绪尔从语言学出发，提炼出了结构主义思想和理论，把语言看成是由各个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成的一个结构系统。他把系统比作下棋时各个棋子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以由各种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做成，但是下棋的规则系统却总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木头的象棋棋子换成昂贵的象牙棋子，也可以换成低廉的塑料棋子，这种改变对下象棋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把围棋棋子的黑白两色改变成红黄两色，对下围棋也无关紧要。但是如果我们任意减少或增加象棋的棋子数目，或者任意改变围棋的棋盘格式，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下棋的

① Holdcroft D., *Saussure: signs, systems and arbitrariness*, CUP., 1991.

规则——棋法。因为，棋子的质料和颜色是棋子系统外部的要素，它们一般不会影响下棋的规则；而象棋棋子的数目或围棋棋盘的格式，是这两种棋子系统内部的要素，一旦产生变化，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在一定规则下的棋路又可以千变万化，这些变化都必须符合棋子的组合规则。下棋的人各式各样，下棋的路子也变化莫测，但是下棋的规则却始终有着严格的规定。例如中国象棋，车马炮、士象卒，将帅各率一方：马不能行象步，士不可斜飞出宫，兵不过河不准横行，炮不隔山难以发威，这就是下中国象棋的规则；至于国际象棋则另有一个路数，丝毫不允许乱套。棋子好比语言的词语符号，下棋的规则就好比语言系统的语法；词语的符号形式可以变换，但是语法必须严格遵守。

在这一系统思想的指导下，索绪尔把语言学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作为系统的语言的情况，历时语言学研究个别语言要素的演变。他又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属于全社会，是一个抽象化了的系统；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包括生理、物理和心理现象)物质化了的表现形式。索绪尔还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把语言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研究，是宏观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本身的各种构成要素，可以说是微观语言学。所有这一切，提供了语言学研究中较新趋向的理论基础，并由此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20 世纪以前的传统语言学重视语言的个性，研究语言的个别的构成成分及其特征，用“原子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各种语言现象；而在索绪尔影响下的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则强调语言的共性，研究语言的结构系统及其普遍特征，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处理语言系统和语言现象。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语言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系统的语言学观念和结构主义理论：明确界定了语言学的若干基本观念，诸如语言研究的共时观与历时观、语言的时空观、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以及系统中的诸多关系。现代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些观念的本质和意义而进行的，它们启动和推进了现代语言学的发展，阐明了语言学的任务和基本方向。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由语言单位和语言关系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点已经成为公认的语言学研究定义。

索绪尔的另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性贡献，是他在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创建了符号学(semiotics)。他指出语言是一个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个符号都有它的“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e)两重性质。“能指”即语言的声音印象，“所指”即概念。他认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印象，所以语言符号纯粹是心理的。这一观念导致了符号学的创建。索绪尔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引出“符号的任意性”，并把它定为符号学的第一原则。他这样

阐述[1]：

>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
> 等到符号学将来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将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以完全自然的符号为基础的表达方式——例如哑剧——是否属于它的管辖范围。假定它接纳这些自然的符号，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以符号任意性为基础的全体系统。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例如那些往往带有某种自然表情的礼节符号（试想一想汉人从前三跪九叩拜见他们的皇帝）也仍然是依照一种规矩给定下来的。强制使用礼节符号的正是这种规矩，而不是符号的内在价值。所以我们可以说，完全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语言这种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同时也是最富有特点的表达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可以成为整个符号系统中的典范，尽管语言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系统。

为了防止人们对"符号任意性"的误解，索绪尔作了很精辟的注解："**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它不应该使人想起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只有承认语言符号的这种任意性，我们才有可能面对事实，从零星、孤立的表面现象进入到支撑符号的基本结构。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为以后各语言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为符号学的诞生提供了构思。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并归结为心理现象的同时，又认为语言研究虽然纯粹是心理的，但语言的本质属性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心理的、物理的，但是作为言语的集合——语言则是全社会约定的符号系统。因此，言语只是个人对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即语言符号的规则性组合而已。这样，语言符号有可能在以后的研究中成为"元符号"体系，用来分析和解释其他一切符号，成为符号学的基础。他的继承者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1899～1956 年）发表了《语言学理论导论》和《语言论集》，为后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1902～1976 年）有关"陈述活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符号学借助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103.

于陈述来掌握意义成为可能，从而形成话语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使符号学更靠近了言语活动的实际情况。

0.2 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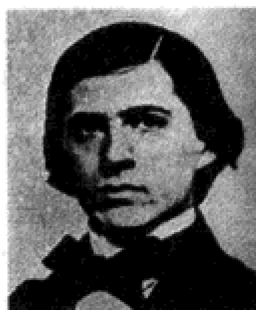


图 0-2

几乎与索绪尔同期，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查尔士·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1839～1914 年)也独立提出了符号学理论，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和符号学的创始人。1839 年 9 月 10 日皮尔士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他的父亲是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著名数学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皮尔士从小接受良好的哲学和科学的训练，他能背诵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 6 岁起就学化学，12 岁开始做实验，后来转学动物学。皮尔士曾在哈佛大学就读，在美国海洋和大地测量观察所任职，但一生甚不得志。1887 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大学谋到一个正式的教席。在哲学上，皮尔士提出了作为实用主义核心的意义理论，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的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该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后来，他将实用主义易名为“实效主义”。在逻辑学方面皮尔士有两大贡献，一是改进了希尔代数，一是发展了关系逻辑，即引入新的概念和符号，把关系逻辑组成为一个关系演算。在自然科学方面，先于 A. A. 迈克尔逊以光波波长作为测量单位。他的大部分论著由后人整理成《皮尔士文集》。

皮尔士还是一个杰出的数理逻辑学家。年轻时的他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期望这个哲学体系能够在遥远的未来，包含人类的全部学科。但他并不真的对哲学体系有兴趣，他有志建立的是一个能适应于各门学科的科学的逻辑。他在 1878 年 1 月发表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标志着实用主义的诞生，后来又发表了一系列阐述他的科学逻辑的文章，但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 1898 年詹姆士把他的哲学冠以“实用主义”的名称大力推广，人们才把他尊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他丰富的思想是在他的遗稿出版之后才发掘出来的。

在皮尔士看来，数学并不跟人类的感性直观有关，也不跟外在感性事物本体直接发生关系，数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的原始动作，经过主体活动抽象而来。计数的规定首先不是外在感性客体事物的归纳，而是从感知的具体走向逻辑的抽象。皮尔士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影响下，为了清理形而上学造成的混乱，把观念的意义和实际效果联系起来，断言一个观念的定义是这个观念的可感觉的效果，一个客体的概念无非是那些效果的概念。皮尔士自称为“实效主义”。实效主义的根本

含义是用实际效果说明和规定意义，其目的在于清晰地阐明表征事物观念的意义，确定意义存在于效果之中。在皮尔士看来，意义等于全部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则无意义。在实效主义的基础上，皮尔士建立了他的符号学理论。他指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符号活动包括计数符号的运作，都是逻辑运动。因而符号理论也就是关于意识和经验的逻辑理论。他把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组织在三个层次上，依次是感觉活动、经验活动和符号活动。符号包括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道路上复制的具体对象和符号所产生的效果。从广义上说，符号的效果也就是符号的意义。

皮尔士符号学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使他成为现代理论符号学的开启者和奠基人之一。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观是语言学方向的，那么，皮尔士的符号观则是逻辑学方向的。他的符号观对符号学研究中科学主义的倾向有着重要影响。与索绪尔侧重于对符号的社会功能的探索不同，皮尔士是第一位着重于研究符号自身逻辑结构的哲学家。他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把符号学范畴建立在思维和判断的关系逻辑上，认为任何一个判断都涉及对象、关系和性质三者之间的结合。与这三项范畴相应，任何一个符号都由媒介关联物（M）、对象关联物（O）和解释关联物（I）三种关联要素构成。“媒介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能指”，“对象关联物”相当于索绪尔符号理论中的“所指”，“解释关联物”则是皮尔士的独特创见，它们形成一种三角形关系，符号就存在于这种三角形关系之中。对符号类别进行划分，是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又一重要特色。他依据符号与它的三种构成要素的不同关联，将符号进一步划分为 9 种下位符号，由 9 种下位符号的相互结合构成 10 种主要符号类别，它们反映出符号所具有的不同性质。不无巧合的是，皮尔士与他的同时代人索绪尔一样，都将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也都将语言学看成符号学的标准模型。但不难看出，与索绪尔有别的是，皮尔士对运用种种标准给符号分类有着更强的兴趣。

皮尔士的现代符号学与索绪尔存在着某些不同，“对皮尔士而言，由于他是从自然科学走到符号学的，重心是放在自然符号体系，而协议性符号是适应于自然符号体系”[①]。皮尔士符号学观的历史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记号分类学思想，二是操作理论。同时，由于皮尔士在符号中增加了“解释项”，从而符号与所指客体事物之间出现了一个因解释者不同的主观因素，这样就使得皮尔士的符号系统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②]。符号的传播者和受传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对符号所作的解释或认知，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类自

---

① 瓦尔、郝长墀译. 皮尔士[M]. 北京：中华书局，2003：96.

② 张良林. 皮尔士的符号观述评[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

身智慧。作为符号的解释者的人，既然是社会人，那么他必须遵循社会共同体的规范，遵循社会共同体给符号的一种规定，因而决定了符号解释者对符号解释的不自由。但是，符号的使用者又必然是自然人，因而他所作的解释必然反映个体认识的一个动态自由发展过程，然而最终又无法摆脱个人对符号意义的自由理解的局限。个体解释在没有发展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约定的规范时，我们只能通过解释项来表示语言的意义，分析语言的价值，并由此了解语言是如何通过符号系统来翻译的。这样，符号系统的解释项显然跟语言学是息息相关的。

皮尔士符号理论跟索绪尔不同的是，他把符号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两个交叉的“三元组合”(two interlocking triads)。首先是“符号媒介”、“指称对象”及“符号意义”的三元组合，其次是三种符号类型——“图像”、“指示”、“象征”的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的三元组合。可见索绪尔语言符号学和皮尔士符号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是以先验论哲学和结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基础的，是一种“泛符号论”，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皮尔士提出的符号学，其应用范围不仅限于语言，它是研究一切事物的意指作用的科学。皮尔士的符号分类就是范畴论的应用，皮尔士关于符号活动(符号产生的过程)的论述就是逻辑学的应用。在皮尔士符号学中，符号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命题；而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符号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单词。这两个符号系统有各自的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排斥而是互补的。皮尔士的三位一体符号观是认知的、交际的符号观，它研究人怎样通过无限的、以人的解释为中心的动态符号过程来接近客观真理，因此他的语言符号都是具体言语活动的内容。索绪尔的二元符号观则侧重对结构系统内抽象语言符号的研究，他创立符号学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语言学以科学的地位，所以他并不直接涉及具体言语活动的内容。

皮尔士的符号学跟索绪尔符号学存在着很大差别，一般认为皮尔士的符号学在理论深度和适用面广度上优于索绪尔的符号学，他超脱传统结构主义对符号的理解，介入了语用成分。其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索绪尔的符号只有“所指”和“能指”两部分，而皮尔士的符号是一个层层三分的高度一致的体系。皮尔士的符号体系由“依据(representamen)”(类似于索绪尔体系的“能指”)、“标物(object)”(类似于索绪尔体系的“所指”)和一个关键性的成分“助释(interpretant)”(解释者对符号的解释)三个成分组成。“助释”是皮尔士符号体系的一个创新概念，它处于符号形式与客体对象的指称意义之间，从而使三个成分出现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被称作符号的“意指过程(semiosis)”。因此，索绪尔的静态的符号在皮尔士的理论里成为了一个动态的概念。“解释项”的存在使得皮尔士的符号学更贴近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看法。

第二，皮尔士符号学的动态性还体现在不仅关心“能力(competence)”层面规则性的“类符号(legisigns)”，也关心“运用(performance)”层面可重复出现的“例符号(sinsigns)”。“能力”属于认知范畴，对符号所相应的客体事物或事件按照人类的认知进行分类；“运用”属于交际范畴，通过“例符号”的典型性特征归纳符号在现实世界的反复重现的规则。近年来，随着符号学的发展，大量研究显示，能力层面的类化规则(即给符号按功能分类)常常只是运用层面的无数个案的个性规约化的结果。无疑皮尔士的符号学更具有认知功能上的理论解释力。

第三，索绪尔严格区分“形式”和“实体”，以前者为关注对象；皮尔士更着眼于意指过程中“助释”的作用并兼顾“实体”。而且皮尔士的“助释”使索绪尔强调的符号任意性和规约性之间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构建三分的符号分类系统指出抽象性依次递减、自然性依次递增的原则，把符号分为“标志符(symbol)”(规约性关联)、“像似符(icon)”(相似性关联)、“引得符(index)”(邻近性关联)三大类。其中的像似符又包含三种变体(hypoicons)：“影像(image)”、“图样(diagram)”、“隐喻(metaphor)”。这些符号类型在意指过程中总是彼此配合、互动，在语言里构成一个符号的网络(semiotic web)：[①]

表 0-1

像似符次类	影像	图样	隐喻
相似性的获得	共有某些简单属性	显示物体的抽象结构	显示与它物的平行性
相似性位于	属性(quality)	结构(structure)	关联(association)
能指—所指关系	直接的模仿	结构或关系上的类似	表征上的平行
像似性的程度 抽象性的程度	高 低	中 中	低 高

在索绪尔的语言系统里，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系统，所有符号都应视为基于规约的标志符。但是，皮尔士的语言系统里，指出除标志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符号属于像似符和引得符。像似符又可有三个次类变体：属性像似、结构像似和关联像似。这样的符号分类，显然代表了对语言系统的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此，从语言系统到言语活动，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一种开放的、人性化的符号学，具有更强的分析和解释功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更多的人文精神和解释能力。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里，只有历史的和结构的运动，把符号视为立足本体能够自行分解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否定人类和客观世界的封闭系统。而皮尔士

① 张敏. 自然句法理论和汉语语法像似性研究[C]. “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见 http://ihome. ust. hk/～hmzm/zhangmin. pdf.

的符号学说，使符号的形成、功能和运用有了更合理的科学的阐释。

皮尔士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发现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为此，我们将在索绪尔符号学“能指”和“所指”的理论基础上，引入皮尔士“解释项”概念，即“意指”。

0.3 结构主义与巴尔特《符号学原理》

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形成为理论前提，同时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也为符号学提供了部分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和符号学都关心话语中影响个体言语的文化因素，所以两者的研究在这些方面有所交叉。法国社会学家马塞·莫斯(1898～1950年)曾系统论述过价值物品与财富在社会循环中的相互关系，使我们注意到社会仿佛是一盘棋、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间也存在着衔接、等值和蕴涵关系。杜梅泽尔(1898～1986年)在《神话与史诗》里用相近的术语解释了印欧宗教中众神的“三种等级功能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总的结构，在不考虑个别的情况下出现了，在这种结构中任何个别都能找到它准确的位置。这样，结构主义几乎渗透到全部人文学科。

结构主义的真正确立一般以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版《野性的思维》为象征，又以1968年五月风暴时，学生们对罗兰·巴尔特的嘲讽“结构没有上街”，作为结构主义衰落的标志。作为一场思潮运动的结构主义也许已经是过去很久了，但是结构主义的思想却至今没有完结，它已经成为人类理智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结构主义使人们认识到了万物的存在基点，没有结构也就没有世界，它们构成了世界的可被观察的现象，也构成了世界一切非表象的与思想的可分析特征。

结构主义的出现，一是由于整个人文领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20世纪初，西方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世界展示了一幅崭新的图像：在那里，真正的自然与人世逐渐远离而去，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充斥耳目，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语言学作为分析应用于语言世界的成功方法来分析眼前这个表面纷繁无序的、噩梦般的现实世界，不失为一种可以验证的方法。结构主义的一个公认的特点是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当作方法论模式。二是由于当时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一些“思想运动”启发下的新生理论和方法日益丧失对人们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侧重本体论结构主义强调的是所谓方法论的实践：结构主义既回避主体意识的问题，又回避社会环境因素，而专注于“构成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如何”(how)置于“什么”(what)之前，正因为此，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结构主义也许会随着

人类认识论的发展而结束或消亡，但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将持久存在，渗透到各种人文学科之中。

结构主义思潮产生的另一个现实背景是：20世纪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相渗透，使得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性观点、方法不仅被自然科学家所接受，而且也为社会学家所重视和采用，从而推动了对人文学科普遍流行的非理性主义的批判。结构主义特别是符号学被吸收进传播批判理论中，其原因就是当时的传播精英主义抱着偏颇的非理性的感性义愤，使其分析的科学性大打折扣。结构主义将符号学原理引进传播分析，追求传播的规律和模式，成功地将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为现代传播学开拓了一条融合创新的道路。

结构主义的兴起，派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符号学。这是一门研究各种符号一般规律的科学：意义的各种系统，人们——个体的或群体的人们——用信号（姿态、广告、语言本身、食物、物体、服装、音乐，以及其他许多物质形态或精神形态的东西）来交流或试图交流的手段。它有着两条发展线索：一是沿着索绪尔的研究路线，朝着偏重于结构主义色彩发展，其继承者包括巴尔特、索莱尔、克里斯蒂娃夫妇等；另一条线索，则朝着更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的道路发展，其继承者主要有皮尔士、莫里斯、卡西尔、苏珊·朗格等。

在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符号学的，有影响人物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当结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种理论模式或者说思想模式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巴尔特的名字便和索绪尔、皮尔士、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物的名字一起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巴尔特符号学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在巴尔特看来，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只是符号表意的第一个层次，而将这个层次的符号又作为第二层表意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所指。巴尔特把它称为“内蕴意义”，也叫“隐喻”。巴尔特从结构主义符号学引出“隐喻”理论，创建了对传播媒介和广告进行陌生化[①]解读的观点，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符号

① “陌生化”原产生于西方的一种诗学理论，即所谓“惊奇感”。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主体与客体尚未完全分裂而矛盾已开始显现的时候，即人在客观事物中发现他自己，发现普遍的、绝对的东西时，惊奇感才会发生；惊奇感是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源泉。后来，俄国的形式主义者极力推崇诗语的“陌生化”特性，强调诗的功能在于显现其能指与所指的并不同一，认为艺术的使命不在于毕恭毕敬地模仿自然和社会生活，而在于对之进行创造性的“加密”和“变形”，从而使人们感知它，引发对事物的新奇感觉，使人们即使面临熟视无睹的事物时也能不断有新的发现，从而感受对象的异乎寻常，非同一般，感受语言的最原初的“诗性本质”。布莱希特把“陌生化”进一步上升到哲学上的认识范畴，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特殊规律，他曾经把陌生化的实现过程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认识（理解）——不认识（不理解）——认识（理解）。巴尔特借用“陌生化”概念，应用于符号学.

意义“自然化”的最有力批判。


图 0-3

罗兰·巴尔特是法国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符号学家。就其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而言，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其所编《巴尔特文选》里的一段话可谓盖棺之论：“在二次大战后从法国涌现的所有思想界的大师中，我敢绝对肯定地说，罗兰·巴尔特是将使其著作永世长存的一位。”[①]至于他在符号学上的崇高声望则以一件事最为突出，那就是 1976 年仅有学士学位的巴尔特在福柯的推荐下，成为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文学符号学的讲座教授。在那倍显荣耀的就职仪式上，他侃侃而谈：

> 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把权势看成是一种有些人拥有、有些人不拥有的东西。我们曾经认为权势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现象；现在我们则相信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于是我们发现权势出现于社会交流的各种精巧的机构中，不只是在国家、阶级、集团里，而且也在时装、舆论、演出、游乐、运动、新闻、家庭和私人关系中，甚至在那些企图对抗权势的解放冲动中……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ue)……说话(parler)，或更严格些说发出话语(discourir)，这并非像人们经常强调的那样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语言结构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②]

这里巴尔特已经把语言符号的适用范围大大进行扩展，并引出“语言权势”的概念，是非常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神话集》是罗兰·巴尔特划时代的著作。在该书中，巴尔特运用了陌生化效果，把符号学从语言世界领域扩展到现实世界，来分析当代社会，特别是分析传播媒介和广告。他表明广告符号的实际效果，是说服我们相信消费者社会的某些特定的商品是绝对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历史的，这些商品来自一个永恒的消费欲望，而这个欲望根植于“人性”之中。巴尔特认为弥漫于大众媒介的这些“天然感”隐藏着意识形态价值的运作。意识形态在媒介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建构

---

① [法]罗兰·巴尔特. 李幼蒸译. 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8：182.

② [法]罗兰·巴尔特. 李幼蒸译. 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8：3-4.

了符号文本的特定意义，或者说，防止了意义的无限扩散。巴尔特把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称之为“神话”，而他自负的使命就是要揭示出意识形态在神话中的运作方式，并对此进行批判和解构。这样的解构过程叫做“去神话”，其实就是陌生化。

这样，符号不仅具有任意性，而且具有赋予性。

巴尔特根据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的观点，指出符号意义本质上是人为建构的。尽管在理论上，谁都可以建构新的能指和所指，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平等地建构能指和所指。历史上总有一些特权阶级，他们拥有建构的优先权，并采取各种手段来让其他阶级认同他们的建构，以维持自身的利益。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就是从这一方面深化了索绪尔的思想。

在众多的法国结构主义者中，像巴尔特这样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其时代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屈指可数。其符号学的代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时装系统》，影响非常深远。1980 年，巴尔特 64 岁，正处在思想发展的巅峰。2 月 25 日，巴尔特在离他工作的法兰西学院不远的地方横穿马路，被一辆小卡车撞倒，一个月后不幸逝世。这不由得使人想到 1906 年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在巴黎几乎同样的不幸遭遇。一颗学术明星陨落了，命运有时残酷地永久终止了一个人的精神活动，但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将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停止。

到罗兰・巴尔特时代，学者们开始不再承认语言学的优先地位，而强调符号本身的特定性。但事实上，他们在解读一些非语言的符号（如图片、绘画、雕塑、建筑等）时，却不得不经常借用自然语言为中介。因此，我们在讨论符号学的时候，也将不可避免地要运用语言学的事实和基本原理来进行分析，并引入元语言的概念。

0.4 符号学创建的三大影响

符号系统，尤其是语言符号系统的出现，第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类与非人类的行为方式有了本质的区别。符号是人类的一种“自由创造”，以此来表示人与人、事物与事物，以及事物与人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绝对不等同于生物学上的条件反射式的联系，或遗传基因作用下的本能联系。正是由于这一点，符号只属于人类，符号的解释权也只属于符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类。但是，符号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它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人类认知世界的结果。人类生活在符号中，符号把人类组织成社会，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也许某些生物也有“语言”，例如蜜蜂用自己的“语言”——复杂的 8 字舞姿来向同类表示寻找食物的方向和距离。但是蜜蜂的这种“语言”完全是它们先天的和本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符号利用条件反射原理教会猴子或狗做各种把戏，表演给

人类观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会做把戏的猴子、狗将学会的把戏再传授给小猴子、小狗！相反，人类依靠语言这种特定的符号，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人类的历史也就随着语言符号的产生和运用而被改写。而以前的一切，地球上生物系统都是以遗传变异为基础发生的物种进化。有人可能会说，蚂蚁也有“语言”，它们也以此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有雌性国王，有雄性嫔妃，有兵蚁，有工蚁等，形成严密的组织，蚂蚁王国的体制建立了 5 000 万年，但至今仍然持续不变。因为蚂蚁所使用的“语言”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系统，只是基因遗传下生物反射的信号而已。人类有了自己创造的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以符号传播方式实现的文化进步的速度，与日俱增，与时俱变，超过了天地万物顺序变化的几何级数。

符号系统的第二大贡献，是把人类领出了自然界中一切依赖于有形尝试和无数失败的迷宫，从此走进一个理性的世界。当一只动物陷入困境时，它的本能反应只会猛冲乱闯，直到找到出路为止；就像草履虫一样，用它的不断的碰撞——本能支配下的反射性行为，经过无数次尝试和失败的经验来寻找出路，摆脱困境。在文学语言里用“狡猾”来形容狐狸，用“敦厚”来比拟大象，用“温顺善良”来比喻小绵羊，用“自由自在”来描写鱼的生活，用“横行霸道”来描绘螃蟹的行为，用“勇敢”来刻画海燕，用“勤劳”来称赞蜜蜂，用“虚荣”来讽刺蝴蝶……我们知道“狡猾”“虚荣”“勇敢”“勤劳”，或者“自由自在”“横行霸道”等语言符号，根本跟这些动物丝毫没有本质上的关联，这些动物存在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在语言符号支配下出现的行为范式。而人呢，却完全不同，人们借助符号，静静地进行内部思考，训练自己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行为；人们借助符号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既定目标不是用事物本身而是用事物的符号意义来做实验，不必事事亲历地来经验现实世界，去经受尝试的艰辛和失败的痛苦。科学家的许多极其有价值的创见，往往就是他们在符号世界里漫游的产物；艺术家的许多高潮精妙的不朽作品，不是来自于对现实世界实物生动形象的直接模拟，而是他们大脑中符号世界的一种再创造；大文豪的传世巨篇，凭借了书写符号的扩展而无限生成，由此再现自我的丰富经历和复杂心理，再现灿烂光辉的物质世界，给人以惊奇的感受；历代祖先们的生产生活经验，对真实世界的感受和感悟，历史投影下的丰富文化遗产，都通过符号的功能获得重生的力量，传播到四面八方，传承给千秋万代。人类有了符号，从此不再把谋取生存的物质生产视为唯一需要，而把从事精神产业的生产活动看成更高层次的需要。

符号创造使人类面临的混沌无序的外部世界转化为有序的、规则的、可以被认知的世界，从而对人类产生非常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人类的一切行为，从此摆脱本能驱动下的生物性功能，在符号化进程中变得有目的和有思想。人类以符号为认知工具，通过符号对现实自然界和社会实现分类和抽象，借助符号对客体事物实行

演绎和推理，利用符号完成人际交流和传播信息。人类有了符号系统，可以为自己的过去进行回顾和总结，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构想和展望，对将要实施的工程进行设计和规划。天地宇宙中的一切本来是混沌一体，万物包括动植物、其他各种生物以及人类自身，本是一个连续体。但是，人类却一一赋予它们明确的符号，也赋予自己的一切（身体、行为、思想、情感、心理，包括人类的创造物等）以各种特定的符号，或者说“给予”名称。然后，通过符号将它们一一分解，一一归类。经过分析和综合，逻辑的演绎和推理，人类在给外部世界符号化的同时，也符号化本人，把自己纳入到各种“关系”和“规则”当中，于是整个自然界和社会在符号系统中运行。自然界不再混沌一片，有了秩序，有了规则，有了合理的分布；社会不再盲目发展，有了规章、制度和法典，有了道德标准的建立和社会习俗的确认，有了行为准则的认同和交际范式的规定，等等。人类还发明了符号的符号（如文字、密码、运算公式、电子声讯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解释”系统，甚至发明了由符号系统演化出的有思想的非生命体——电脑和机器人——人自身的符号替代物，人类从此把许多事情转交给这些符号替代物去完成，同时把许多辛劳和痛苦让符号替代物去经验。这就是符号系统的第三大贡献。

符号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与贡献如此之大，因此符号学的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和有价值。但是，由于符号学还是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对它的研究还不很成熟和完善，有时我们不得不借助于成熟的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举证和分析。而且事实也只能是这样，因为几乎一切符号系统都必须依靠语言符号的语码转译才能被描写，并通过语码转换使外在世界融人人类的心理世界。语言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但是语言学却成为了符号学的基础，语言符号也成为了阐释其他各类所有符号的符号。另一方面的事实，符号是传播的信息载体，所以符号学也充分地关注信息传播的结构、规律、规则和模式。符号学也就自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母体科学，一切符号都必然是传播符号；离开了传播的符号无法存在，同样，离开了符号的传播也无法存立。

为此，本书将立足于传播与传播理论来详细阐述符号学原理，论述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形态及其特征，分析符号的结构与规则，并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和普通的实例（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来演示符号系统的运作模式。

第1章 符号与符号中的学问

1.1 传播符号的重新认识

什么是符号？索绪尔虽然明确提出了符号学的设想，也以语言符号为参照，给出了符号的基本构成和运作规则，但是，他却没有给"符号"以明确清晰的定义。索绪尔认为，给符号定义并揭示符号的规律，这正是未来的新学科符号学的任务。他说①：

>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叫它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符号"sēmeîon)。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这里充分显示了索绪尔伟大的预见，他没有给出符号学的定义，也没有给出符号的定义，但是指出了符号和符号学在未来科学发展中的前景。索绪尔把"符号"的构成和运行规律仅仅局限在语言符号这个范畴里，然而他在给语言进行符号学定义时却明确为我们理解"符号"的性质和范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他说："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它只是这些系统中最重要的。"②也就是说，符号的种类非常丰富，每个种类都各成"系统"，有特定的物化材料，有特定的指代意义，有严密的内部结构，有自身的运动规律……总之，它们既是历史的，又是社会的，所以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也必须从社会方面去研究。

如果按照一般词典或者教科书上的解释，也许反而会把我们引进一个概念十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8.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7.

分迷糊的怪圈。不同学科按自己学科的实用观点来解释“符号”。在语文学上，被视为经典的《现代汉语词典》把“符号”注释为：“记号、标记；佩戴在身上表示职别、身份等的标志。”乍看词典的注释很具体，记号、标记和标志的确都属于符号，但它们既不是符号的本质，也不是符号的全部。词典用了一种不完全、非穷尽的列举法，于是有意无意地把大量属于符号的物质现象一概排除在符号系统之外，比如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语言”和“文字”就不属于符号了。百科性词典《辞海》，从信息论角度称符号是“信息携带者”，认为传送信息时带有信息的电流、电波或光束等便是符号。这样无疑混淆了符号与符号的物质载体之间的区别。《韦氏大词典》从秘书学角度说：符号是一种代表思想的通用的记号或标志，例如字母、字或标记……用以表达思想、进行指挥或者表示愿望的一种动作、行为或姿态……大楼、房间、商店或办公室前写了字的牌子或别的引人注目的招牌，用于表示那里办理的业务、人或公司的名字。手写或印刷的商标、数字或图画……通常用来表示一个期限或概念……用以表明一样东西的存在的某种东西……[①]词典也采取了举例的释义办法，在解释时指出了符号的若干种形式；又引出了符号的功能，说符号代表“思想”、表达“思想”、表示“概念”、表明“一种东西的存在”等等。这种给“符号”进行描写定义的方法，使人很难概括出有助于对“符号”理解的确切内蕴。

一些学术著作中对“符号”的定义则比较科学化，如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符号是一种有机体存在，“这种存在依靠心理过程和社会成果起作用。例如记忆和符号化即所谓心理过程；例如规范、态度和语言即所谓社会成果。”[②]把符号分为两大类是很有意思的：心理的过程和社会的成果。前者后来被称为“内部语言”，用于思维；后者后来被称为“外部语言”，用于交际。心理学家把符号分为“内部”和“外部”是从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那里来的，但跟索绪尔不同。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部分 。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造句的特点。但是不管个人的特点如何不同，同一社团中的个人都可以互通，这是因为有语言的统一作用的缘故。索绪尔进而指出，语言有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因此语言研究又可以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关系。我们不要把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的“内部符号”跟索绪尔定义的“内部语言”混淆起来。

传播学著作中几乎都有章节要谈到传播符号，都有给符号的定义。戴元光等

---

① 戴元光、金冠军. 传播学通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271-272.

② [美]克特・W・巴克. 社会心理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

这样叙述："传播本质上为信息的流通，信息指只有凭借符号才能流通。事实上，信息首先就表现为符号，或者说一种信息的外在形式就是某种符号。世界上没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着的信息，正如没有不包含信息的符号。符号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①]周月亮转引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观点说："人是符号动物；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活动才能创造出使自身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实体，并且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符号化能力；符号化行为包括语言传播、神话思维和科学认识，换句话说，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物。……'符号传播'之符号的含义就是这么宽泛。"[②]卡西尔认为符号不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而定义为"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③]。这样，在传播学领域里，符号不仅是信息的载体和信息流通的工具，更是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

符号究竟是什么？要说清楚确实有一定难度，人类创造了符号，又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之中；人们借助符号来认知世界和解释世界，而且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指称着人们接触到或可感知的全部客体事物。几乎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地要接触到符号，各门科学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不可避免地要依仗符号。因而人们往往会在日常生活中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定义符号；同样也会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需要给符号以自己的定义。总之，不管从何种角度对符号的解释，基本点是一致的，即符号是信息的载体，它能代表某事物，而不是事物本身；它是人为规定的，是人类用来指称世界的特殊标记。例如在"他是张三"这个句子里，语言符号"他"代表"张三"这个人，但"他"并不就是所指的"张三"本人，它不过是传播者向受播者发出的信息，指示传受双方之外的第三人。又例如在"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句话里，语言符号"螺丝钉"代表"雷锋(一样的人)"，但作为符号的"螺丝钉"并不是现实世界里的螺丝钉。"螺丝钉"本来代表一种金属杆上带螺纹的零件，然而经过皮尔士系统里的"助释"，形成巴尔特系统里的"内蕴意义"，于是成为了"雷锋"的替代符号。用来代表"雷锋"的不是实体事物螺丝钉本身，而是螺丝钉的符号物"螺丝钉"这个词语的隐喻。

由于符号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因此符号的定义也往往根据对象和适用范围来进行阐释。我们就从传播学的范畴给符号一个阐释。传播符号的核心是信息，那么什么是传播信息呢？传播信息作为信息的一种，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对社会信息所作的有目的有选择性的抽样，也是受播者对抽样传播所回应的合目

---

① 戴元光，金冠军. 传播学通论[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271.

② 周月亮.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

③ 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的性、选择性的抽样。这样的信息既具有一般信息所固有的特征，又具有传播信息本身的特点。一般说，传播信息有它比较狭义的理解，其主要特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六点：

（1）新闻性。信息传播就是要告诉人们不知道的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信息量与本身的概率成反比，与意外性和新颖性成正比。信息量越大，新闻性也越强。

（2）娱乐性。在现代传播媒介中，随着公众消遣娱悦需求的上升，娱乐性也越来越成为信息的鲜明特点。从人类最原始的传播形式——神话、传说、史诗、寓言等，我们也到处看到众多的消遣娱乐性的内容。

（3）知识性。传播知识，交流经验，传继文化遗产，介绍最新科技，历来是传播的主要任务。事实证明，当代人知识仓库中的许多知识，主要不是来源于他们的父母和老师，而是来源于各种传播媒介。今后，传播信息的知识性将只会增强不会削弱。

（4）价值性。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传播者和传播媒介，而取决于受众，取决于信息对受众有用的程度和对受众接受目的投合的程度。一般认为，传播信息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理论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这种价值体系，构成了对传播信息的基本要求。

（5）真实性。媒介信息的真实性，是指按照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作真正客观、准确的描述和反映，而不能凭人们的主观臆想和推断作夸大、缩小和虚假的信息传播。当事物运动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时，大众媒介则应从不同角度、层面和以不同视野、方式对事物运动的全过程作准确、客观的动态描述，使受众对事物的运动变化有本质的认识。因为，不真实的虚假的信息会导致受众对外在变化作出错误的反应，造成决策失误。

（6）时效性。这是指信息从大众媒介发出到受众接收、利用的时间间隔及其效率。随着大众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信息时效性有增无减的需求将会得到进一步满足，信息传播与接收将会越来越快。在时间面前，信息是易碎品。即使是十分真实的、很有价值的信息，一旦失去了时效，它就会变成无人问津的东西。大众媒介中的昨日消息、上午新闻，正迅速地被刚刚发生的、正在发生的甚至即将发生的信息所取代。人们对时效性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如果按传播学前述观点来理解符号，是很不充分的。上面六点只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特征，远不能代表“传播”的真实含义和基本特征。在我国大部分传播学研究家是从新闻学转行来的，所以持这一观点不奇怪。

符号学家把传播视作“意义的表述”，不把它局限在新闻信息的传递。换句话说，符号学分析的重点是表意过程，是符号所显示的对客观事物进行阐释或抽象的

途径。因此,意义作为符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全部内容,是人(主体)对客观事物(指示物)进行阐释的结果。就某一事件来说,其意义的产生或阐释过程通常要遵循下述步骤:

(1) 传播者面对某个具体的实在的事物或事件本体。

(2) 这一事物或事件是可以感知的。

(3) 这一事物或事件可感知的部分能用一个物化的标记来表述。

(4) 这个标记能体现传播者对于该事物或事件形成的价值判断。

这一过程叫符号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抽象的阐释过程。当符号(词——有声的语言,或声音替代品的文字)越发抽象时,它跟那个具体的事件的关系就越发疏离。面对某一客观事物,用于指代或表述的符号常常是多样的。例如,反映同一对象——苹果,就可以用照片上的苹果,用画布上的苹果,也可以用中文书写的"苹果",用英文的"apple"、用日文的"りんて(林檎)"等。而同一符号——"苹果"的不同形式,对于从未见过苹果的人和生活在苹果园的人来说,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使是面对画布上写实的苹果,美术评论家和普通看客的译解与阐释也不会是相同的。

这样,用语义学的观点看,受众对同一符号的不同译解同符号的多义性特点有某种关系。一般来说,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外延意义与内蕴意义。所谓外延意义,是指语言符号体系中所固有的与客观事物有代表性关系的意义。内蕴意义是指人们在运用语言符号时所表达的与客观事物无直接联系的评价性意义。外延意义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是客观的,一般说是相对稳定的;当然有时也会变化,随着人类认知的深化,或对旧知识的修正,也可能要调整外延意义的宽窄。至于内蕴意义是在特定的场合和交际环境中产生的,是主观的,往往随时变动的。比如乌龟,其外延意义就是指那种下水能游、上岸能爬的有硬甲、长圆形、背部隆起的扁体动物。从生物学范畴说,上述描写是合符外延意义的,除非有新的特殊的龟类发现。但其内蕴意义则可以是中性的,可以是贬义或褒义。不过符号的外延意义跟所指客体事物或事件的外延意义,不完全是一码事。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再讨论。

1.2 符号、征候及其他

不管从何角度对符号的解释,基本点是一致的,即符号能指示某事物或某事件,但不是事物或事件本身;它是人类用以指称世界的特殊的标记。这个标记也许自身也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的事物,但是代表甲事物的乙事物,不一定都是符号,它可能是征候。

我们先有必要认识一下符号与征候的区别。符号具有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功能，它也能指称事物或事件但又与指称的事物或事件没有自然的联系；征候则不同，它指示客体事物或事件、并直接与事物或事件有着自然的联系。例如天空的乌云、树上的鲜花、泥地的脚印、山中的炊烟等，它们都是自然现象，也具有某种预示功能，乌云预示将要下雨，鲜花预示着结果，脚印预示有人走过，山中的炊烟预示山里有人家。但是，这些预示都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或事件有着自然联系，本身就是所预示事物或事件的自然特征。我们把这种具有预示功能的自然现象叫做“征候”：乌云翻滚是天要下雨的征候，开花是植物结果子的征候，泥地上出现脚印是有人走过的征候，山里冒起炊烟是山里有人在煮饭烧菜的征候。比如树上的鲜花，如果被采撷下来，在情人节时一个男子手捧鲜花献给一位少女，这时鲜花被赋予了特殊的内蕴意义，成为传递爱情信息的符号。传递爱情的含义并不是鲜花固有的而完全是人赋予的。如果在医院里，同样一个男子把鲜花送给一个女子，把鲜花插在病床边，鲜花的含义就变了，成为向病人传递问候和祝愿的信息的符号。传递问候和祝愿的含义也不是鲜花固有的，是人们赋予的。所以符号跟征候决然不是一回事：情人节的鲜花是传递爱情的符号，病人床榻的鲜花是传递亲友慰问的符号，但长在树上的鲜花是预示结果实的征候；战争年代侦察员在跟踪敌人时故意留下的脚印是传递情报的符号，敌人逃跑时留下的脚印是预示其行踪去向的征候；古代边陲的烽燧是传递战争信息的符号，农舍的炊烟是预示山里人家的征候。在医学上，医生就是凭着病人身上反应的各种病情征候来确诊的：战抖是热病的征候，咳嗽是感冒的征候，白血球增高是炎症的征候，心跳加速和头晕是高血压的征候，出血不止是再生性造血功能障碍的疑似征候，等等。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便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来观察病人的征候——神情、气色、声息、舌苔、脉象等，以了解病情；同时，又创造了一套与上述征候配伍的阴阳、五行、五性等名称来分析病人的病情，这便是符号。

总之，征候跟它所代表的事物或事件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本身就是事物或事件发生的迹象；而符号与它所指称的事物或事件之间根本没有天然的联系，它所具有的意义完全是创造者规定的，或者是使用者约定的。虽然鲜花本身是自然物，但是一经人们给予“规定”或者被人们“约定”，就具有了符号的特征。例如鲜花可以表示青年男女情爱的信息，可以表示亲友慰问病人的信息，可以表示环境幽雅和文化氛围的信息，可以表示荣誉奖赏或身份地位的信息，可以表示多种特别的含义。这里我们发现鲜花所以能表示各种不同条件和不同语境下的符号——象征物，不是鲜花自身的植物性质在起作用，而是人们赋予它的象征意义在发挥作用。就是说，符号与它所指的现实事物或事件的关联，没有必然性，其象征意义完全是人为规定的，但是这种人为的规定已经被人们在社会实际运用中认可和约定，而且它不

再是自然物，已经具有了人文特性，被赋予的象征意义也成了它的固有特征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样，符号便具有了意义——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意义具有人为约定性。

符号一旦被人们赋予了意义，并经过普遍认同和约定，便进入信息的传播系统。但是有的符号，其物化形式跟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明确的联系，也就是说这类符号与内容（客体的事物或事件）或意义（象征性）的联系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它们的传播功能是有条件的，受到时间、空间或对象的制约，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临时的，或者只在少数人群的约定中发生，或者只在特定语境中使用。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属于符号范畴，但通常不是符号学研究的主体对象。比方说“信号”就是这一种。信号仅仅表示某事、某物在某条件下的存在与否，它传递信息的功能一般说是短暂的，它与所指事物的联系往往严格地受到时空环境的多方制约。例如田径比赛时，发令枪发出的声响是参赛者快速起跑的信号，枪口的浓烟是裁判计时者按动秒表的信号；军队作战时，信号弹使用的数量、颜色都是特定的，这特定的数量、颜色就是军事行动的信号。这类信号的所指内容和意义都是人为规定的，并在一定的使用范围内也具有很强的约定性。但是，过了信号传播的那段特定时间，离开了信号传播的特定环境，空间或地点变了，没有了存在的客观条件，信号跟内容的联系便中断了，信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便消失了，于是信号不再有存在的价值。符号与符号的特殊形式信号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人类所特有的，也只能应用于人类，符号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意义是相对稳定的，不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后者则很不同，信号常常随着客观需要和条件变化而产生改变，另外信号在动物行为中也可以存在。某些动物对信号就非常敏感，它们对信号的接收方式还相当复杂。比如一条驯养的狗也会接受信号或发出信号，它能做出许多带有信号意义的复杂动作，它的吠叫声音、尾巴的甩动、来回小跑的动作，传递它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同时，它也能对主人的行为、面部表情、待人的态度等细微的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传递它对外界事物或事件的反应。蜜蜂的“8”字形飞舞、蝴蝶的优美舞姿和蚂蚁的触角动作等，有人称作是动物的“语言”，但是与人类的真正语言符号相比，它们只能算是在本能下的一种动物交际的信号。

从信息论意义上说，征候、信号和符号一样都是信息的一种载体，都具有传播信息的共同功能，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但是，征候引发的是事物或实践的自然反应及其天然联系的结果，信号引发的仅仅是某事、某物在特定条件下的存在及其条件反射（或本能性）的反应，符号引出的却是事物的概念或事件的象征意义。所以，符号是高级的信息载体。英国语言学家罗·亨·罗宾斯指出，征候和信号是“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注意别的事物的或者表明别的事物的事

物。它们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或者说是有因果关系的”[①]。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而征候和信号是物理世界和动物世界的一部分。信号虽然也可能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一般说它的传播是定向的、单一的，即使很具有符号相似特征的交通信号，比如红绿灯的翻转变化，它对行人和车辆发出通行或停止的信号，但是行人或车辆却只能按照交通信号的特殊要求采取相应的动作或行为，不可能创造对应的信号跟它进行互动，也发出某一信号来回应它。而且我们知道，信号是死的，自身没有再生性和派生功能，只具有非生物的比较纯粹的工具性质。

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恩斯特·卡西尔(1873～1945年)在《人论》[②]一书中专门论及符号与信号的区别。卡西尔说："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而符号则是'指称者'。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信号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为了操作的方便，使人的指令更加简洁，从而提高效率。而符号的建立是完全不同的，是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便，为了认识世界的方便，以提高人类整体认识的时间和人际交流的效率。因此他反复强调，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化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而且，信号(包括更加特殊的"暗号")的使用是单方面的，是单向传播的，具有特殊性。符号却和人类整个已经认知的世界相和谐地对应，并形成一整套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去认识现在正在认识或尚未认识的世界。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造成这种区别的秘密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也就是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他对人的这一定义，不仅开拓了对人类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也为符号学的重新思考开拓了广袤的视野。

我们不妨把征候、信号和符号三者的区别概括如表 1-1。

---

① 罗·亨·罗宾斯. 普通语言学概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② 恩斯特·卡西尔. 甘阳译.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卡西尔早年接受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训练，成为马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汉堡大学教授、校长，创立了"文化哲学"体系。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尔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后于 1945 年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席。其"文化哲学"体系集中反映在他的三卷本《符号形式的哲学》。到美国后，他简要地阐述"文化哲学"基本思想，并增加了不少思想，即成《人论》一书.

表 1-1

类别	人为性	互动性	生成性	指称性	多义性
征候	—	—	—	—	+
信号	+	—	—	+	—
符号	+	+	+	+	+

“征候”是一种在自然、社会或生理现象等一定因果关系下发生的事实，它既不是人为的创造物，也没有具体的指称意义。征候往往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制约着它的存在，虽然它是对象物的某种征兆，但纯粹属于物质世界的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它跟对象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也并没有必然性因素。比如开花未必一定结果，乌云出现未必一定下雨；脸红不一定是害羞的表示，也可能是因为发怒或者发烧等。

“信号”只是传递某种意义，却没有命名功能，只能一方向某一群体或对象物发出某种预示、警告或指令，实现单向传播的目的，接收方难以用同样的信号回应，甚至根本无法回应。符号则完全不同，它是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着自己特殊的生命，它能自我生成。而且符号具有指称性，指称又有多义性，同一事物可以由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同一符号可以表示不同的意义，并通过符号与符号的组合来表述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所以卡西尔说：“凡物都有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卡西尔还说：“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

1.3 语言的物化形式和意义

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符号中，语言是最完美、最高级形态的。语言符号的物化过程十分复杂，但就其本质而言，其物化形式是声音。以声音为物质形式的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也可以分为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外延意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进入传播活动的语言符号，其基本单位是词符，词符是音义的结合体。词汇意义是指跟词符的语音形成相结合的社会集团公认的单一词符的意义。语法意义是指若干个单一词符的有机组合所产生的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意义。内蕴意义包括修辞意义、语境意义、历史意义、文化意义等。这就是说，同一语言符号在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环境、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意义。这就是“500 个最常用的英语单词竟有 14 000 种不同含义”的原因。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外延意义与内蕴意义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符号的内蕴意义由于不断复现和无限扩张，会被固定下来转化为外延意义；而有的符号的外延意义也会由于社会的发展逐步

被人舍弃而退化成少数人的内蕴意义。在历史长河中，外延意义实际上是内蕴意义的综合和概括，而内蕴意义则是外延意义的个别体现和具体运用。

从表面看来，符号的外延意义来自于符号所指社会与自然界存在的客体事物的对应，内蕴意义来自于符号所指人类社会心理感悟的主观认知的反映。外延意义似乎更多地体现为人类在给社会与自然界的客体事物以命名，而内蕴意义又似乎是人类在给客体事物以心理地位的评价。因此，在索绪尔时代人们还没有恰当的地位给予符号，符号学只能附庸于心理学。因而大多数人存在着一种肤浅的理解，把符号看作是一种简单的命名集，认为语言符号的功能是用来给世界万物起一个个名称罢了。那么真实情况是如何的呢？符号——语言中的词语，确实表现为对外界事物的命名——给予名称，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汉字中的“马”及其对应的语音 mǎ，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名称包括声音来自哪里。也许有人会认为“马”对应的客体事物——马是很明白的，也就是说“马”的外延意义似乎是天然的。由于事物的命名在远古就已经形成，其文字和读音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也因世代传习，不容许人们去作深入地猜想，大多数人自然而然认为事物的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作业，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深究诸如马的符号——语音形式“为什么”要叫 mǎ 而不叫别的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不叫 gǒu 而叫 mǎ，那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而且好像也根本没有必要去解答。因为语音问题完全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事，是千百年来的约定俗成。至于反映客体事物马的书写符号——文字形式“马”，是在原始象形字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或许还有源头可考，但事实上即使原始象形文字的“马”跟现实世界的马相去甚远，到了现代汉字更加无法令人联想到它与自然界的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了，甚至已经找不出半点相像之处。说表示客体对象“马”的语言符号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不必去追溯它的存在理据；说它的文字符号是由象形字演变而来，其实现在已经跟自然界真实的马根本无法联想了，所以不必去追溯它的存在理据。这观点看似天真，也顺乎常识，但反倒使我们更接近了关于符号问题的真理。

但是，不少人不这样认为，主张语言是一个命名集，每个词语都有它内在的必然的命名依据，我国清末的大学问家章太炎也曾这样认为。他曾提出“摹声说”(所谓“天籁”)，认为语言的声音形式与语言表达的客体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即语言的声音是语言所指称的“物质”的天然声音，例如“雀”能发出“即足”的鸣叫声，所以叫 què；“鸭”能发出“亚亚”的叫声，所以叫 yā，等等。这并非毫无道理，现代汉语里的“嚏”的读音就是喷嚏的声音，“鸡”也正是小鸡唧唧的叫声。英语中也有类似的事实，cuchoo 就是杜鹃的鸣叫声，hoopoe 是一种戴胜鸟的叫声。这种以摹声方式建立的词语尽管在语言系统里也至关重要，但它们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中仅占极小极小的比例。这种试图给语言以理据性解释的摹声说，能解释的

范围十分有限，在理论上难以站得住。这因为，第一，无法解释现实世界中大量不发声事物的名称的来源；第二，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声音的事物会出现不同的名称。难道中国的鸭子发出“亚亚”的叫声，英国的鸭子发出“duck”声吗？难道中国的麻雀发出 què 叫声，英国的麻雀发出 sparrow 叫声吗？第三，更是无法解释一大批无实形可视察，又无实物可比拟的抽象事物的命名，它们根本无从摹声。所以，人类创造语言之初，声音与客体事物的联系完全是偶然的。也就是说，作为语言符号用什么物化形式来表示什么事物，最初是任意的，是没有什么必然的理据可循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内在的理据可言，当一个语言符号获得意义之后，它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尽管它最初无疑是人类意志的产物，但是它一旦进入符号系统，就不再受意志的管束，它将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规律实现它的价值。与意义结合的符号将具有赋予别的相关符号以意义的能力，这种能力使派生的符号产生理据性的意义。现实中的动物——马，当大家给它一个符号“mǎ”，而后又造出一个与 mǎ 等值的书写符号“马”字的时候，谁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了！事实就是如此。同时，“马”的符号在现实交际中使不同的人产生多方面的不同的心理联想和心理效应。“马”能使人联想到奔跑于草原的原始狩猎物，使人联想到原始战争中的军事坐骑，使人联想到古代行政筹划的传驿交通，使人联想到进入农耕生产的农业牲口，也许在有的人心理上还会联想到游乐生涯中的玩具、赛具或赌具等。而且这些理解还只限于人们对马的实用功能的概括，还没有涉及马在人们心理上的其他联想，包括它的功能和价值。比如“马”的比喻或象征意义：马在常见动物中比较高大，于是赋予它“大”的意义（马勺、马蜂、马蝇等）；马是古代先进的军事运载和作战工具，于是“马”在某些词语里被赋予了冲锋陷阵——速度和胜利的象征（马到成功、马不停蹄、马首是瞻等）。

奥斯古德（C. Osgood）[①]在《意义的测量》（1957 年）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在不

---

① 奥斯古德（Charles Egerton Osgood，1916 年～）美国心理学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1939 年获达特默思学院学士学位。1945 年获耶鲁大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博士学位。1945～1949 年间在康涅狄格大学任讲师。后任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副教授，1953 年升教授，兼比较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1957 年起任该大学中心通信研究所所长。曾任美国语言学会和行为科学高级中心特别委员。1962～1963 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自大学本科时代开始，一直致力于心理语言学、情感的意义与感情归因、心理社会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和较深的造诣。主要观点和成就：(1)认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与范围，广义的应是各种消息和个人对这些消息的特征的选择与解释之间的关系。(2)发展了“语义分化”法，即采用等级评定量表研究词的含义。给定的词是由被试按照诸如强度、活动、愉快、不愉快等维度去评定等级的。(3)提出迁移与逆效曲面，即解释并预测迁移的性质（正、负）和大小的三维模型，用以论证正负迁移的大小（一维）如何随先后两个学习课题之间刺激相似（另一维）和反应相似（又一维）程度的不同而变化。曾获卓越科学贡献奖。1971 年获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勒温奖。著有《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意义的测量》（合著）、《心理语言学：理论和研究问题概观》（合著）、《论情感意义的交叉文化普遍性》等.

同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对字词的外延意义是比较容易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但在价值判断（内蕴意义）上常常发生较大分歧。这是因为，前者的客观性、约定性、稳定性等特点只划定了有限的语言空间，而后者的主观性、个人性、临时性等特点却预留了多层面、范围广泛的语意空间。符号内蕴意义的语意空间主要集中在价值系统的三个层面：

（1）评判因素。指语言符号内蕴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使用者的主观态度，如好与坏、贵重与无价值、公平与不公平、诚实与虚伪等。在这个层面的两种评价之间出现若干等级线，显示出一个人对某个字、词或指代物喜欢或不喜欢的程度。

（2）效能因素。指语言符号内蕴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所体现出使用者表达的力度或强度等，如有力的与无力的、强壮的与衰弱的、重的与轻的、坚固的与柔软的等等。这个层次代表着一个人对字、词或指代物所体会到的强弱程度和心理感受度。

（3）活动因素。指语言符号内蕴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的使用者对符号所指客体事物或事件的物理属性的认知状况，如主动的与被动的、快的与慢的、活动的与静止的、动态的与静态的、变化的与重复的等等。这个层面表示人们对某字、词或指代物活动状况的估量和认识。

这三个层面的内蕴意义似乎是存在的，用它对特定的字符、词符或指代物进行测量和分析也是有用的。例如前面说到的语言符号 mǎ 及其文字符号“马”，它们的外延意义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但是它们的内蕴意义则随着人们对它本身在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它所代表的客体事物在人们心理上的认知地位，形成了复杂的价值因素。如根据“马”的评判因素分别在“马首是瞻、龙马精神”和“拍马屁、露马脚”里体现出来的是褒义和贬义；根据“马”的效能因素分别在成语“马不停蹄、一马当先”，古词语“马快”和常用词“马甲、马步、马车”等词符系列里体现出来的却是速度和用途；根据“马”的活动因素分别由“奔”（奔马）、“跑”（跑马）、“走”（走马看花）、“跳”（跳马）等属性确立起不同的组合关系，从而构成新的词符系列。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信息系统，它对客观事物的描述结果，对于符号含义的确立、引申、替换和稳定，以及受众对符号含义的体验和理解，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很明显，语言符号的物化形式与它的意义分布的非单一对应性，表明语言符号无力也无法直接指向客体事物和该事物的名称，而是直接与概念和音响形象联系，然后间接地指向符号所代表的客体事象，表示事物的名称。语言符号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符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经验心理得到传播和认同的结果。所以，语言既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并且比较高级和复杂的符号，又是具有很强主观色彩并带有经验性意指的符号。语言通过一定的声音和文字形式去标记客

观的事物或主观的思想，从而获得意义。比如对书这一客观事物，现代汉语就用“shū”这个声音形式标记它，又用“书”这个文字形式标记它，于是它们也分别获得了指代“书”这种“成册著作”的意义。如果说声音是现实的第一次符号化——产生语音，那么记录语音则是现实的第二次符号化——诞生文字。这两次符号化的过程，其演进在人类传播史上也许需要数万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现时的传播活动中，只要既定的语言符号标记指代了某种事物或思想，它就可以被分解为语音形式、文字形式和语义内容三个方面。换句话说，完整的成熟的语言符号应该是音、形、义的有机结合，它既包括听觉物质化——语音形式，视觉物质化——文字形式，也包括符号的心理感知信息化——语义内容。索绪尔曾精辟地说：“后者(指语音)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①]即使如语言中的拟声词“乒乓”或“乒乒乓乓”，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打碎玻璃等物体的物理音响。它们作为语言的声音符号，已经具有心理印迹。“乒乓”已不是打乒乓的物理声响，而与打乒乓的运动项目发生联系；即使纯粹拟声化的“乒乒乓乓”，也不是实指某一事物的现实声响，而是抽象为一切清脆刺耳声响的象征。总之，它们失去了原先的物理声响的意义，转化为人们心中声响的心理印迹。这种语言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言语活动就可以发现。我们不用启动自己的嘴巴，也不用滚动自己的唇舌，就能自言自语，或者默读诗歌和文章。这时语言对我们来说，不是物理声音，只是与概念联系具有一定内蕴意义的心理音响。语言的符号性在这里显得非常突出，它向我们表明，语言单位是由两项要素联结而构成的两重性符号：它一方面是与客观世界的客体事物或事件有联系的概念，形成外延意义；另一方面是与主观世界有联系的心理概念，形成内蕴意义。

符号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来源于语言学理论，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已远远超出语言学研究的范畴。符号学把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符号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它们有着怎样的质料、形式、所指内容及界域；无论是以何种物化形式——图像、动作、乐音、物品，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制度、礼仪、仪式，或者艺术语言类动感的演出、静态的造型，等等。尽管我们接触到的符号一般是由各样不同的质料、不同的形式组合成的复合体，它们未必构成直接的有声“语言”，但必定构成“意指”系统。所谓“意指”，就是指每个符号都有它相对应的意义——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的所指。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和分众传播的开拓，尤其是视频技术的进步、网络影响的扩大，人们越来越空前地关注“意指”的广泛领域。这使得符号学的地位上升到全新的高度，不再是个别学者的异想天开。

---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103.

1.4 语言是符号世界的中介

语言是一种最特殊的符号。它在两个方面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一个方面是语言利用了人体的某些器官(肺、声带、口腔等)的发声和共鸣的属性,利用了空气的传导属性和耳朵的听觉生理属性,形成一整套通过听觉器官可感知的符号,从而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文字是语言的“替身”,它形式上利用了笔等工具的书写属性,在物体表面留下可以看得见的印记,通过眼睛的视觉生理属性,与语言发生联系。但是,文字本质上还是要通过声音来与语言联结的,诚如前述,因为文字是第二次符号化的产物。另一个方面是语言利用了发声器官的可听符号(文字是可视符号),从而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同人类所积聚的无比广泛的经验的全部发生联系。这后一种联系完全靠传习而世代继承,同时不断地创造、充实,并无限制地扩展和变化。语言的第一个方面特点,既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使它成为人类所独特的赖以与动物世界区别开来的有声符号。第二个方面的特点,使它成为人类传播手段中最复杂的符号系统,并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符号中处于非同寻常的地位,语言(包括文字)为符号学的确立提供了可比照、可借鉴的对象。

关于语言符号的性质,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所认识,并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春秋时期著名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子在《名实论》里这样说:“大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①意思是说,事物的名称(符号)彼此并不相同,不同的名称是用来区别该事物与他事物的,但名称不等于就是该事物或他事物本身。客观事物纷繁杂沓,凭什么给它们名称呢?同一时期的荀子《正名》中说:“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名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②说明了语言符号的命名原理及其心理过程。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时,要靠五官去接触,用思想去感受,才能形成概念,给事物一个命名。如果事物没有名称,即使五官对它有所感觉却不清楚,心理对它有所验证却说不出,那么谁都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认识它了。这就是必须给事物以名称的原因。给事物取名称,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事物也可以有共同名称。因此,语言符号具有很强的人为规定的特点。在非语言符号系统里,即使接纳一些自然物

---

① 公孙龙子全译[M].四川:巴蜀书社,1992.

② 荀子·正名[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质构成的符号，原则上也是人为规定——以集体习惯和约定俗成为基础的。例如中国人以前见面时的传统礼节采用拱手方式，西方人则采取传统的握手方式，这是不同民族间长期约定的礼仪习惯。许多具有民族特色且带有自然表情的礼节符号，几乎都有这一人为规定性特征。例如我国封建时代子女叩见父母双亲的跪拜、封建王朝臣民向帝王的三跪九叩等，就有特定社会制度下确立的礼仪规矩。就是说，礼仪作为行为符号也具有强制性规定，礼节符号的外化形式服从于社会制定的规矩，而不是符号本体的内在价值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一切符号的所指的客体事物或事件，以及代表的意义，都不得不依靠创制者的"规定"和使用者的"习惯"，这种由心理认同形成的内蕴意义则完全要靠语言来进行解释。所以，一个符号如果无法用语言符号进行分解和阐释，使它的形式和意义联系起来，它也就失去了符号的存在价值，也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因此在所有符号中，语言是人类最复杂、最广泛的表达系统的符号。

康德说："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反之，思想标记的最优越的方式，就是运用语言这种最广泛的工具来了解自己和别人。"[①]萨丕尔比喻说，语言（语音形式）是商品，而文字不过是货币；货币是用来代表商品的，没有商品做保障货币就一文不值。同样，没有语言做依托文字也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是语音的画像，语义是文字的抽象。清代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写道："意（义）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②]综上可知，语言符号的符号形式有两类：一是声音新形式的言语，一是书写形式的文字。前者是可听到的符号，后者是可看到的符号，它们都属于语言符号系统。总之，符号总有特定的物质形式来承载，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和意义，而信息和意义亦不能脱离符号而独立存在。

语言是记录和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也是传递信息和实现交际的符号系统。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似乎至今还没有发现比语言更具有广泛性的符号来组织社会、沟通思想、实现人际互动的符号，因此现代符号学总是拿语言作为符号研究的典型对象，同时也把语言作为符号学的阐释工具。物品、图像、颜色、线条、动作等，都可能成为传播信息的符号，都可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大量被使用，并发挥着表达意义的传播功能。但是，这种表达从来不是以自主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些符号无法从自身的价值中来体现它们表达的意义，它们始终与语言的阐释纠缠在一起，即借助语言的表达功能来给其他各种符号以意义的阐释。因此，语言学和符号学仿佛是一对单卵双胞胎，出自同一个母体，彼此相似，形影

---

① 康德. 实用人类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4.

② 清·陈澧. 东塾读书记.

不离。

在大众传播异常发达和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无论以视觉符号出现的新闻图片、连环画本、美术作品、报刊书籍等，还是以听觉符号出现的广播、音乐、电话声讯等，或者以立体视角的符号出现的建筑群体、城市雕塑、园林景观等，或者以视听结合的符号出现的电影、电视、广告、网络传播等，几乎都要通过语言的信息辅助来明确其意义。图像信息、声讯信息、艺术信息、影视信息等与语言符号系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互补互动，即使这些信息中有相当一部分有意义的冗余成分、结构上的相似成分或某种替换关系，但是它们最终必须依靠语言来分解其形式，用语言来阐释其指称意义。即使像音乐这种最不依赖语言的艺术符号系统，也必须通过人的内部语言的分析和联想进行理解。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中写道，听罢琵琶女如怨如诉的演奏，“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音乐通过艺术语言——旋律、节奏、调式等传播深刻细腻的内心情感，受播者通过内部语言的解析和联想产生强烈的共鸣。受播者白居易从琵琶演奏中感受到演奏者用音乐语言传播的触及心灵深处的情感，于是运用诗歌形式的语言符号，通过《琵琶行》对线性的音乐语言进行完美的阐释。这说明不同的符号之间是可以用语言符号来转译和换算的。至于像时装模特表演、膳食宴席等实物符号的集合，它们也需要在语言符号的分配中(如节目单和菜单形式，实用和存在的理由等)获得系统的身份。网络传播表面上使传播者与受播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并消失了距离感，尽管它的中间过程虚无缥缈，仿佛与语言无关，但是在网络的多姿多彩的符号传播和接收中互换模式时，还是要通过语言的分解才使模拟的世界进人现实的世界。正是这种神秘的语码转换，使外在的世界渗人内在世界，一个个简单的符号都将变得可亲和可爱；死的符号在语言活动下被激活，变得生机勃勃。

我们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比语言符号更能以中介姿态出现在符号世界，并能把其他任何符号转换成人类可接收和可理解的信息系统。我们惊奇地发现人类所感知的世界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语言世界。人类给自己已经感知的世界命名，借助命名的已知世界去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发现未知的世界。没有被语言符号化的世界，正是还未被人类感知的世界。语言给世界进行命名、编码和传播，使混沌无序的天地变得清晰有序，使一切有形无形的事物符号化，使它们具有文化功能，从而推动人类对自身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这样，在人类面前呈现的将是如图 1-1 所示的三种不同形态存在的世界图案。因此，尽管当代传播学一开始把非语言实体的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如芬兰人类学家佩克・库西从生命形式的功能出发，认为拥有信息和传播渗透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生物基础，但是他仍然要从人际沟通着手，把蛮荒时代原始人的呼喊和手势放在原始人获取能量、安全防卫、开发信息和生殖遗传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命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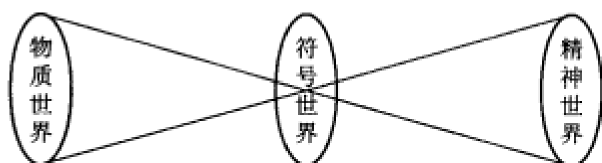


图 1-1

的传播和语言符号的传播在人类生存和进化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完全一等一的重要。而且，语言在这里不只是生命符号的陪衬，而是作为组成、替换物或所指出现，甚至是生命符号的解释工具，成为符号运动的中介项，符号的符号。传播符号是传播学的核心部分，语言符号也自然成了传播符号的核心。不过，这里说的语言符号，不是一般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音素和音位、语素和词汇、结构和句法等，而是指整个语言系统，包括更长的话语片段及语言的表意方式和意义蕴涵。在这种情况之下，纳入传播范畴的符号学研究必将涉及跨语言的全部表意内容，包括以分节语言为第一实体的意义所指集，如神话、文学、艺术、新闻等；也包括一切能用言语表述出来的表意片段，如通讯报道、现场采访、人物交谈等；甚至也包括非有声语言方式的“内部语言”集，如梦想、幻觉、想象等。这里的“内部语言”不同于索绪尔提出的概念。索绪尔“内部语言”是“内部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指语言系统内部的符号情况，诸如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这里的“内部语言”是指语言符号在大脑内部的运作，属于语言符号的自我传播。

在传播学研究中，曾有人认为：人在沉思默想时可以不用语言，只有将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时才用语言，也才有传播。因而错觉地认为所谓的自我传播或内向传播是不存在的。其实，人们在沉思默想时的内向传播，用的是无声无形的内部言语；把思维结果表达出来的外向传播，用的是有声有形的外部言语。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都是对某种具体语言的运用，都是意识活动的方式。科学家曾做过这样的实验：将细针状的电极嵌入舌头或下唇的肌肉内，令被试者默诵一段文字。这时被试者并不发声，全用内部语言诵读，科学家发现他的思维始终有电位变动伴随着。然后再让被试者用有声语言朗诵这段文字，所得的电位变动记录与前者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实验证明，语言与意识是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由于语言跟意识的这种关系，使语言可以成为一切传播符号的解释项——“意指”的承担者，无论是有声语言形式的言语传播活动，还是非有声语言的其他形式传播活动，都可以用语言符号作为中介来进行充分解释。

第2章 语言、言语与符号原理

2.1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几乎全部适用于传播符号学，语言符号在传播符号学研究中处于最关键的中介地位，是传播符号的解释项，承担着意指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已全部分解到语言范畴，那么也许有一天相反，传播符号学竟成为语言学更为重要的一部分。语言学研究的是指称世界的词语和表述世界的话语的那部分，而传播符号学则更注重词语与指称世界的关系，更注重话语与表述世界的关系，因而它始终把符号运动放在传播与受播双方的互动中进行考察，语言符号和物质符号具有同等意义的传播价值。这样，我们将发现语言研究中关于组合和聚合的分析方法，语言研究中关于语言物质形式（语音）的物理属性和内蕴意义（语义）的文化属性的区别性特征分析，语言研究中关于共时分布与历时演变的静态与动态结合的比较，语言研究中关于解释体系的语义、语用和语法分层综合处理的方法，语言研究中关于内部语言（思维）和外部语言（交际）的互动转换生成理论，语言研究中关于结构与功能、共性与变异、时空参照与认知心理等的分析等等，都同样有效地适用于传播符号的研究。两个学科如此相通，犹如水乳交融。语言学和符号学虽然是双胞胎，但毕竟各是独立的生命体，彼此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彼此却不能相互替代，各有各的职能和研究范围。作为传播系统的符号学其涵盖性更广，它还包括了语言符号以外的非语言形式的各种符号。因此，语言符号的研究原则、理论和方法对传播符号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尤其是关于结构与功能的理论，以及结构分析下的概念二元分类，二元对立下的三重元素，三重元素之间的全方位、多功能作用，如语言和言语，能指、所指和意指，外延意义、内蕴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隐喻意义以及在时空分布中的组合与聚合等，都是传播符号研究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语言是一种以声音为物质基础，服务于思维和交际目的的特定符号。它具有一般符号的全部特点。在心理方面，语言符号具有联想、象征和隐喻性质，它通过社会的约定可以无穷变化。关于语言符号的结构及它与现实事象的关系，如图2-1所示。

比如汉语中“人”的语音形式，即能指形式 rén，是听觉可以感知的物质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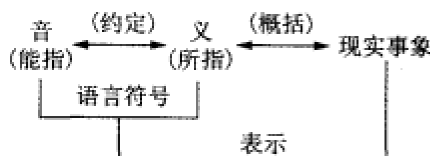


图 2-1

它的所指——外延意义是指所有的人，内蕴意义概括起来可以说："人"是"用两条腿走路、能思想、会说话、会劳动的高等动物"。rén 这个符号实际的内蕴意义远非一般文字所能阐述和逻辑学上的"内涵"所能概括得了的。rén 这个能指的物质形式和人的符号所指意义相结合，形成"人"这个符号，并以此表示客观世界的"人"这个现实事象。语言符号中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也就是语音和语义之间的结合。什么意义用什么语音来表示最初是任意的，依靠社会共同体的约定而形成。语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基础，也是表现语言符号的物化形式，我们称它为"能指"。语义是语言符号所表示的现实事象的概括和抽象，也就是符号的意义内容，我们称它为"所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结合关系上具有任意性，在使用关系上具有约定性。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把"人"叫做 rén，而叫别的什么，如英语那样去叫它 man 或 person，也完全可能。

恩格斯曾举过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他说：

"正与负，也可以反过来……北与南也一样。如果把这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称西为东，称南为北。太阳从西边出来，行星从西向东旋转等，这只是名称上的变更而已。"①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早在 2000 年前也曾说过：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②

由此可见，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之间的指称关系是人为规定的，语言符号的形式（或叫名称）和内容（或叫意义）的结合是使用者全体的一种约定，只有它们与现实事象发生真实的联系，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才能发挥交际工具的作用。所谓"现实事象"，一方面与符号所指的客体对应，指周围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事件、性质、动作等；另一方面与符号所指的主体对应，指人类的内心世界的感受和思想、情感和心理、道德观念、人生价值以及精神文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现象。总之，语言符号能表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可感知和不可感知的一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② 荀子. 荀子·正名.

切东西。

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就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缺一不可。语言符号不同于其他传播符号的能指，其物质形式有较大局限，主要是语音及其替代物——文字和文字的附加符号(如标点等)，其次是手势，还有特殊形式的旗语、电报等。这些能指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所指的意义。如果去掉能指，所指就失去了意义的物质载体而无法存在；没有所指，能指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而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自然物。自然界的万物都可能成为被人类赋予意义的某种符号，比如松树或柏树，作为自然物它并没有任何特别意义，它们跟其他树或者其他别的生物并无特别的不同，它们只是一种生存于自然界的物质形式，一类常绿植物而已；但是，松树和柏树的常绿性质被人类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之后，于是成为了汉民族传播某种思想感情的符号，例如在汉民古诗文里比喻高洁坚贞的操守，种植于墓园象征对死者永远的垂念等等。可见物质形式加上人类赋予的意义才是符号，物质形式与赋予意义两者不可缺一。

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约定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1) 不同体系的语言符号可以用不同的能指(语音)来表示相同的所指(语义)。例如表达"书"这个意义的时候，汉语用的是 shū，英语用的是 book，俄语用的是 КНИГА/kniga/，日语用的是ほん(本)/hon/。相同的意义在不同语言体系里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说明声音和意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2) 不同体系的语言符号里相同的能指(语音)可以表示不同的所指(语义)。例如 mi 这个声音，在英语里是"我"的宾格形式，在汉语里是"米、密、蜜、秘、泌、谧、宓、嘧"等多个不同意义的所指单位。在日语里写作み/mi/，则可以表示身体、果实、簸箕或者作为构词成分的前缀、后缀出现。但是另一类语言系统里，mi 作为音乐符号的能指，则其所指又可以表示七音之一——简谱中的 3。说明声音只是意义的替身，它对意义的存在和价值不起决定性作用。

(3) 同一语言符号系统中，也可以用不同的能指(语音或文字)表示相同的所指(意义或对象)。例如植物"玉米"的概念，在汉语的不同方言里说成"苞谷"、"珍珠米"、"棒子"，在植物学里学名说成"玉蜀黍"。又例如颜色"红"的概念，可以说成"朱"，可以说成"赤"，也可以说成"绛"，还可以说成"彤"等。这种不同能指的同一所指，有时表现为同物异名，在语音形式上反映为同指异音，如"自行车"和"脚踏车"即是；在文字上反映为同词异形，如成语"必恭必敬"和"毕恭毕敬"、联绵词"彷徨"和"旁皇"、外来词"巧克力"和"朱古力"即是。

(4) 同一语言符号系统中，相同的能指(语音)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所指(语义)。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能指形式 yi 的语音，就有上百个不同的所指。又例如英语的[ri:d]，可以指研读、解释、辨认(read)等，也可以指芦苇、芦笛(reed)等。即使能指

和所指的关系已经确认，同一能指，当不同的人在具体使用时，往往也会从不同的心理角度形成不同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红”的象征意义就很复杂，可以被视为暴乱、危险的象征，可以被视为革命、进步的象征，也可以被视为喜庆、吉祥的象征，还可以被视为热烈、爱情的象征。当某一符号进入具体的符号组合系列时，其意义的变化就更加复杂多变了，就以“红”为例，“红包”“红利”里的“红”有金钱的含义，“红人”“红角”里“红”有出名的含义，“红娘”“红绳”里有联姻的含义，又在“红烧”里特指酱油，“红心”里特指忠诚，“红糖”里特指褐色或黑色，“红潮”里特指鲜血，“红装”里特指女性，“红学”里特指《红楼梦》这部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著作，等等，几无定指可言。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通常视为是能指和所指任意性联系的体现。但是，我们对这种任意性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定位，也就是说，事实上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而是有特定条件的。所谓任意，可以理解为非理据，即能指的物化符号跟所指的意义蕴涵间没有必然的理据关联。就语言符号的原始形态而言，也许确实如此，某些表示原始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实体事物的能指的物化形式语音，跟所表示的客体事象根本无理据可循，语音能指和语义所指完全是任意的。比如在没有文字阶段，人的头颅为什么在原始汉语里会用 * skhjə gwx 这个音来表示？人的右手为什么上古语音表述为 * gwjə gh[①]？似乎难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是，世界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同样，语言世界的每个符号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组织的系统之中，因此当指称头颅和右手的能指符号产生之后，跟头颅和右手相关的一系列事物的能指也便以头颅和右手的能指为参照系，于是头部、头顶、头骨等都被赋予了跟 * skhjə gwx 相近或相关的语音，甚至在头顶上方的天也因此随头顶而得音。

《说文》:“顶，颠也。”“颠，顶也。”

《易·大过》:“过涉灭顶。”虞注:“顶，首也。”

《庄子·人间世》:“肩高于顶。”

《诗·秦风·车邻》:“有马白颠”意思就是指马的额头呈白色[②]。

这样，首、头、顶、颠等在上古都同音，进而山巅（山的顶部）、木槙（树的顶部）、颡题（脸的顶部），乃至人的头上方之顶部——天也称颠。所以《说文》又注:“天，颠也。”从而形成了一个同音或近音的能指群，构成一个同源词族。同样的道理，以表右手的 * gwjə gh 音为核心，形成“有、右、佑、祐、攸”等具有相同能指的同源词族。由此可见，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绝大多数是有理据的，无理据的只是极少数的原

①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 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5.

始符号，它们构成了整个符号系统的基本元。人们通过若干符号有限的基本元派生出无限的具有意义联系的符号群，这正是构成符号之间意义联系和产生传播价值的原理。

语言系统内部众多同音词（能指相同而所指不同）和同义词（能指不同而所指相同）的产生，不同语言千差万别的存在，固然一方面足以证明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结合的任意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恰好证明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这种结合具有系统的相关性，且受到极强的社会共同体的规定制约。符号一经社会约定，就不再是任何人能随意去改变它的。所以我们说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的统一体，意思就是语言符号的声音和意义谁也离不开谁，一旦联结就不再是任意的了，它们依靠社会全体的约定来维持和确认，同时不断发挥它们的再生能力，创造出更多的符号来。如果我们把语言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性”误解为任何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结合都是任意的，误解为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地规定语音与语义间的内在联系，误解为每个人都可以自有一套词汇和语法，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是可以随意改变社会共同体约定并长期使用的语言系统，那么人们就根本无法实现交际！

此外，语言符号的能指虽然是口舌运动和气流震动声带的产物，但实际上已经不是现实世界中出现的物理声音，而是具有心理属性的语音。同样，语言符号的所指虽然对应于客观事象，但实际上并不能直接跟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事件等同起来，它只是反映客观事象的名称和概念。例如下雨时雨水滴落在屋檐、窗户或地面发出的劈里啪啦声，是一种自然物质的物理声响，但是作为语言符号能指形式的语音——模拟物理声响的“劈里啪啦”已经不是单一指雨声，而是所有这一类声音的概括，它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声音印迹。这一能指背后联结的也不再是单一的雨声，而是包含众多客观事象——降冰雹、鼓掌、放爆竹等事物在碰击其他物体时发生的连续爆裂或拍打的声音，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2.2　语言符号的基本特征

虽然语言符号表达的对象是客观事象，语音表达的是语义，但是语言符号联结的既不是纯粹的物理声音和意义，也不是客体事物（事件）和名称，而是具有心理属性的声音和现实事象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可以用口说和耳听来进行外部交际，也可以用默读和心记来进行内部思考。前者用于人际传播，属于外部语言；后者用于自我传播，属于内部语言。内部语言也必须使用语言符号，这时的能指形式语音是一种不出声的心理印迹。科学实验证明，一个人在静思默想或默读文字资料的时候，喉头和声带始终处于紧张状态。语言对声音的依赖，以及语音对

语义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用X射线拍摄到人脑在回忆某一单词时的简单思维过程，发现围绕语言的回忆过程发生在人脑的三个区中[①]。可见，沉思默想的内向传播是离不开语言的，而只要有语言的流动和传递，也就有在人脑中内部传播的存在。就是在外部传播活动中，语言不仅无法脱离意识和思想而单独存在，而且要实现任何目的也离不开对话者的协同与合作。因此，语言符号的心理印迹是人类自我传播的基础，有时人们在独立思考时，会出现自言自语的情况，这就是语言符号心理印迹的作用。自我传播无非是一个接受外部信息的刺激，进行处理加工，产生思想，形成话语或形成理解或调整行为的过程。所以内部语言和自我传播表面上看来没有语言符号的介入，实际上都必须对语言符号的心理印迹进行编码和译码。

语言符号的心理印迹特征，使人类有可能不依赖表层语言符号而派生出语言符号的另一种形式——文字。文字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成为语音和语义的代码。这样，人类语言由此通过两个符号系统跟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听觉沟通的话语和视觉沟通的书写。话语利用了人体的发音器官，利用了气流的物理属性和耳朵的生理属性，语音是它的外化的物质形式；书写利用物体表面的可见线条，利用笔画的物理运动和眼睛的生理属性，文字是它的外化的物质形式。语言通过可听可闻的有声语音和可见可读的无声文字这两种视听符号，来实现外部交际和内部思考，从而同过去、现在和将来，乃至身边周围、相隔遥远的客观事象发生联系，总之同超越时空的人类经验的全部发生联系，从而以有限的符号形式表达无限的内容。无论是外化语音转换生成语义的话语传播，还是将语音内化为心理印迹的文字传播，都有一个语言内部传播的过程，都有内部语言在起作用。

在人类一切符号中，只有语言符号能从外部传播和内部传播与人类经验的全部实现最广泛的联系，跟天地间的万物联系起来，其他各种形式的符号都只能局部地与客观事物的事发生联系。比如绘画艺术是一种视觉符号的编码，如果没有语言符号在自我传播过程中运用内部语言进行译码转换，人们根本无法准确把握和理解，它至多给人以感觉和印象，不可能形成概念和思想。艺术家就具有这种内部语言符号的转换能力，所以他们能对绘画艺术达到超乎常人的理解。音乐艺术是一种听觉符号的编码，同样，如果没有内部语言在自我传播中的译码转换，也无法使听觉感知的印象与音响创造的形象形成概念和思想，从而使悦耳动听的音响转化为心灵的共鸣和享受。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说，其他一切符号都必须用语言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成为所有传播符号的中介系统。

语言符号所以能用来阐释一切其他类型的传播符号，因为语言符号像人体的

---

① 苏珊·格林菲尔德. 杨雄里译. 人脑之谜[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细胞一样，具有生存能力，可以称为“非生命的生命体”，交感互动，生存繁衍。语言符号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交际的扩大和人类生活形态的进步，随之无限制地扩展和变化。语言符号的这种生命力使它有许多不同于其他传播符号的特征。

1. 强生成性特征

语言符号具有很强的生成能力，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这不仅表现在它传之万世的顽强生命力，更表现在它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能产性。就以汉字这一书面符号来说，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字书写系统里，最初每个汉字基本上就是一个单音节词，或者叫语素词。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共收有语素字 9 353 个，至宋《广韵》已经发展到 26 194 个，到清《康熙字典》又扩展 2 万字达 47 035 个，到近现代的《中华大字典》删除过于生僻的字后仍然有 48 000 多个。字符的大量增长，正是语言符号强生成性的表现。语言符号的强生成性在词汇、句子方面有更积极的反映：

(1) 语言系统的词符是开放的。语言符号特别是词符系列，所指的是客观世界的万千事象，但客观世界的事象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系列，它们只要被人们认知就会踊跃地进入到语言符号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扩大，外部世界的社会和自然界也越来越成为人类已知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是人文产品还是自然界的自在之物都在人类的认知系统中转换成传播符号。这样，语言系统的成员（词语符号系列）也随之新生、扩展，迅速增长。许多 21 世纪的新生事物都被符号化为新词语，进入语言系统。语言系统中词符对应于客体世界，它的开放性是无限的。

(2) 语言系统的词符是能产的。语言系统中的词符单位是开放的，无限的，但是词符按其组合功能形成一个个“集”——词符集则有一个恒定的量。也就是说所有词符按它们的功能可以划分出的若干个类，是封闭的、有限的。词符集内部的每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符号功能，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而且有极强的生成能力。词符的能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词形上扩展，能跟别的词符构成新的复合词符；二在功能上扩展，能跃迁到其他词符集成为多功能的兼类词符；三在造句上扩展，有限的词符集按照组合规则可以组织成不同格式、不同含义的句子，谁也说不清楚一个语言的词符在组合规则的支配下，能产生多少句子。

(3) 语言符号作为系统具有生成能力。任何一个符号概括的是一个类或某一个个体的全部特征，任何人都能用有限的词符通过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表达无穷的思想和情感。一个掌握了一种语言的人，完全可能说出并不是出于模仿的任何具有创新价值的新句子。这种语言符号的生成能力，使语言成为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传播通道，成了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基本能力，成了人类创新思维的一种独特能力。人类利用语言总结自己的重复性行为和创造性实践，在认识

世界的同时也认识自我，并利用语言的功能集合社会全体的力量去改造世界，并实现自我的改造。

2. 一维线性特征

语言符号的能指的物质基础是声音，属于听觉性质，因此只能沿着时间轴在线条方向上展开，它们只能依次一个一个地出现，凭借时间维度的特征而绵延，不似其他传播符号可能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平面的或立体形式的铺展或迭现。语言符号的这种时间维度线性展开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空符的句法功能。语言的一维线性特别体现为言语有一个长度，一个理论上可以无限延伸的长度。但是，事实上言语因为人类发音机制的局限和听觉容量的局限，它的长度受到很大控制。发声需要换气，这便形成言语链的停顿，停顿就是这种长度控制的必然行为。停顿，是自然换气的生理现象，但是在语言符号系统里，它被充分利用，也成为一种语言符号的附加符号——表示意义界域的一种特殊标记——空符号，空符号在口语中表现为停顿，在书面语中表现为标点符号。有时它是话题的标记："饭/我吃过了。""饭"后出现间歇停顿表示它是传受双方共知的信息，是双方实现交际时需要涉及的话题。有时它是词界的标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词组里，我们随着自然换气读成三个单位，三个单位之间出现不易使人发觉的短暂停顿，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词组，停顿处是构成词组的词语单位。有时它是节律的标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停顿配合汉语的声调韵律，形成汉语言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抑扬顿挫的节律特点。汉语句子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句末有一个较长的停顿。无论是因为换气需要的停顿，或者有意识的句中停顿，都是言语链线性特征的必然体现。口语中因自然换气形成体现句法功能的各种不同长度的停顿，书面语上用附加符号——标点来体现的句法停顿，都是语言符号系统中特定的空符号，这是对一维性语言难以表达空间概念时的一种补足。

（2）向度的结构类型。语言符号的延伸长度只能朝着一个时间轴方向进行，这是由于语音只能随着时间推移而一个一个从口中吐出。语言符号在言语活动中排列的言语链具有很强的这种向度特征，这就使得言语链上的语言符号必须沿着向度进行组合，词符组合也因向度限制而具有很强的序列性，从而不同语言形成不同的语序规则。语序规则的重要特点，就是在向度控制下符号之间相互毗邻地一个紧挨一个地进行组合，形成在规则制约下的一定结构。向度的语序规则又跟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认知心理有关，相毗邻的两个语言符号按它们的功能组合时，形成特定的语法语义结构。比如由动词符号和名词符构成的序列，可以是"对象＋动作"的逆向组合，如日语的"ご饭＋食べる"（饭吃）；也可以是"动作＋对象"的顺向组合，如现代汉语的"吃＋饭"（吃饭），两种语言形成不同的序列组合关系，形成

不同的结构类型，表达的却是相同的意义。线性语言符号的排列必定是定向的，名词句里修饰性词符不是前置就是后置，动词句里被支配对象的语符不是在动词前就是在动词后，从而形成由语言向度规则支配的语言符号序列的类型特点。

（3）长度的语义控制。诚如前述，言语链的长度并不像理论上所论证的允许无限延伸，它不仅受人的发音的生理机能制约，也受语言符号传播时接收信息的机能所制约。因为人的记忆跨度是受限制的，声音瞬息即逝的特点使人不可能在瞬间把听到的声音即时记住，也不可能在瞬间把记住的声音立刻进行语码转换成意义，更不可能在瞬间把整段话语的意义经过内部语言进行分析、解码和领悟。所以，在现实交际中的言语链总是有一定的长度，在一定长度的语码符号里又必须有一定的复现量，以帮助记忆。当然言语链中出现的停顿也能帮助记忆，短暂的间歇有利于人对已经通过听觉或视觉进入大脑的语码作快速分析。其次，语言符号中的代词，则是控制言语长度的重要符号。代词的替代功能使言语链中大量必须复现的信息进行简化，减少语言信息的冗余度，把言语长度压缩到最低限。另外，言语链中的各个语言符号将由语言规则进行整理，概括成若干个语义块，使言语链转化为有限量的信息链，信息链中间都有一个个与语义块相对一致的信息节点。那样，无论多么长的言语链——句子，都被切分为有限的几个成分，长度不再是言语理解的难点了。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展开论述。

3. 二元组合特征

语言符号沿着时间轴在线性长度上进行单向（顺向或逆向）组合，形成言语链。在言语链上可以被切分的最小的意义组合单位是词符，而词符又可以看作是更小的符号单位——音素或音位的组合序列。语言符号在言语链上具有二元组合特征，也就是说，它总是跟自己最毗邻的另一个语言符号进行组合。每个语言单位在言语链上都视作一个组合元，其二元组合的具体特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层级配置。语言符号在线性长度上进行逐一组合，由较小的符号单位向较大的符号单位扩展，沿着时间轴不断延伸。但是，这种组合不是随意的，组合时有一套严格的层级装置：

音位→（音节）⇨语素→词→短语（词组）⇨句子

“→”表示符号组合中的层级转换，“⇨”表示组合过程中符号单位发生质变，向高一层级发展。在组合时并不总是循序进行的，有时会在特定语境下发生“跃迁”。例如有的音位符号本身就是一个语素，也是一个词，它不经过“短语”（词组）这个组合过程，与语言符号中的特殊形式——以停顿方式出现的附加符号——语气或语调组合，就能够直接“跃迁”进入句子层面。这在句法学上称为“独词句”。语言符号组合过程中出现“跃迁”时，跟原子结构中的电子跃迁相似，必须释放一定的能

量——语义。[①]

(2) 替换配置。语言符号沿着线性轴进行毗邻组合，形成言语链。言语链的每个符号单位都可以在同一功能的词符集中进行选择，用别的同功能的词符替换，从而组成新的言语链。新的言语链在结构上没有本质的变化，但言语链上同一位置的符号已被替换，因此语义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言语链上具有相同组合功能的词符之间的替换，正是言语千变万化表达丰富意义的重要手段。这里说的“功能”，不仅仅是词符的句法功能，应包括它的语用功能、语义功能和认知功能。比如动词“吃(V)”可以毗邻组合成“吃 N”，当“吃”表示咀嚼或吞咽意义时，其 N 能被所有食品类词语替换，但是在吴方言里则因“吃”的功能变化而能被液体或非食品类的烟所替换；而当“吃”表示消灭或吞并意义时，其 N 又不再是食品类词语，而是棋子、敌方或货物类词符允许替换，如此等等，说明语言符号的线性组合具有极强的功能制约特征。

(3) 聚合配置。言语链上的每个符号都处在既可以被相同功能的符号替换，又可以在线性链上与别的符号进行组合的二重关系中。诚如前述，可替换的符号具有相同的组合功能和相同的替换性质、类型。这种相互可以替换的符号自然地聚群成类，形成聚合关系。语言符号在言语链线性长度的扩展形式中，毗邻词符具有组合关系，具备组合关系的词符在功能一致基础上都可被具有相同功能的词符所替换，这样相同功能的词符集构成聚合关系。语言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是言语链的层级特点。每个聚合类，根据它在线性链上的组合关系，细分出若干个子类，试以“吃”为例分析：

吃 1<
- 吃 1a(咀嚼类)：吃饭
- 吃 1b(吸饮类)：吃烟；吃奶(吴方言中成立)

吃 2(消灭、吞并类)：吃掉两只子；吃掉三个团

吃 3(消耗类)：吃力；吃劲

吃 4(承受类)：吃败仗；吃亏

吃 5(领悟类)：吃透教材；吃准方向

吃 6(吸纳类)：吃水深；吃进一批货

---

① 在电子吸收入射电子的能量后被激发，激发通常是指低能级电子跃迁到较高能级。在内层电子跃迁到高能级后，外层电子和才被激发的电子都可以跃迁回到内层轨道，并发射一个光子。电子能否跃迁，取决于电子接受的能量是否相当于两个能级之差。因此当内层电子被激发时，外层电子也有可能被激发，激发几率取决于入射电子能量的分布和能级间的跃迁选律。语言层级的跃迁与此相类似。当传播活动中，受传双方注入自己的思想情感而在言语或文字中并没有出现时，使言语(文字)能力超越自身的意义蕴涵，会出现“跃迁”，如独词成句便是，复句的紧缩形式也是。

吃7(依附类):吃劳保;靠水吃水

足见聚合配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内部系统,必须注意到,每个子类之间虽然有相通的功能,但是它们的组合关系并不都相通。

4. 可传承性特征

人的语言能力是先天的,但掌握某一具体语言却是后天的。任何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一个早就形成的自然语言环境中,于是通过自身先天的语言获得机制对接触到的自然语言进行模仿,所谓牙牙学语。初生婴儿听到的是一连串的无意义的声音,渐渐在与周围交流的互动环境中,终于发现了周围人发出的声音是有意义的,传递着某种信息,于是揣摩其中的意义,加以概括,抽象出语言符号的组合和聚合规律,几乎在不需要专门教授的情况下自然地学会了说话,成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后认识世界的第一语言——母语。我们把人们自然地学会第一语言的过程叫"语言习得"。人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会语言,一代一代地传承,成为本民族的共同语。语言传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除了"语言习得"外还会出现特殊的情况。

(1) 第二语言的学得和语言变异。一个人自然地掌握了第一语言之后,在认知心理上便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尽管他的词汇量会不断扩大,生活经验会越来越丰富,需要表达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广泛,但是他说话的语音习惯和组织句子的思维模式几乎很少会改变。这时,母语的符号系统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大脑里和表现在他的言语活动中。当他接触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时,会觉得非常陌生,会很难适应,必须有一个较长的学习阶段。我们把非母语当作自己的学习目标,从而掌握第二语言,叫做"第二语言学得"。学习第二语言时,不可避免地会把第一语言的语符迁移到目标语言的学习中,于是产生两种语符特别是语音和语法的干扰和冲突。第二语言学得的各个阶段,学习者都会不自觉地发生语言迁移,出现目标语言的符号与自己母语的语言符号之间的调节——两种语言符号的交融形式——中介语。这种中介状态的语言符号,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往往强烈地推动母语的变异,有时甚至形成混合语,或叫"洋泾浜"语言。

(2) 两种语言符号的接触和转换。语言传承还有另一种情况,是翻译。当第一语言使用者接触到第二语言传播者时,通过中介者来完成交流,这个中介者就是译者。把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外部形式的语码转换的可能,证明了不同语言符号之间内在共性的存在。语码转换表面上是通过外部符号形式的解码来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三方人员(传播者、受播者和翻译者)共同参与的一个语言传播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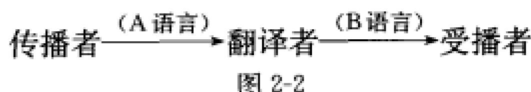


图2-2

大凡从人类有语言并开始在多元语言环境下进行交际之初，就有了翻译和翻译的承当者。但是史前的翻译大抵来自经验，不讲究翻译艺术、翻译技巧，也没有翻译理论，只讲两种语言的转换而力求达意而已。随着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诞生和发展，翻译正在逐步从字面上的移译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方向发展。我们知道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接触，如图 2-2 所示的传播者使用 A 语言（口语的或文本的），不仅传达着传播的内容和传播者的思想意识，也传达着 A 符号系统的语境条件和文化心理结构，A 语言对习惯 B 语言的受播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不得不借助中介人的翻译来间接接触 A 语言。担任中介的翻译者是既熟悉 A 语言又熟悉 B 语言的人或者是双语人，A 语言和 B 语言在他那里发生了直接接触——以内部语言方式进行接触、解码和等值转换。翻译者的语言能力直接影响到翻译的“信达雅”，但是不管翻译者是如何地精通两种语言，要完全准确无误地把 A 语言的语码信息全部转换成 B 语言的语码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符号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观念和双重意义（外延和内蕴），因此不可能形成与另一种语言符号的全等值转换。这就是语言符号接触和转换时“可译”和“不可译”的矛盾关系，从理论上说任何符号都可以破译并转换，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语言符号都是不可全破译并不可等值转换的。

5. 非对称性特征

在逻辑上，符号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依存的，但实际上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通常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即同一个符号可以指称多个内容，反之多个符号可以指称同一个内容。表现在语言符号系统方面，最简单的现实例证，就是语言中多义词和同义词的大量存在，以及同音词和异读词的大量存在，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从符号学角度考察，正是因为有同音词和多义词的存在才大大减少了能指的物质材料——语音单位的基本数量，每种语言的语音控制在最有限的数量而保持最有效的区别特征，减轻了人们在认知上的负担；正因为同义词和多音词的存在才使语言符号蕴涵的内容显得不那么单一而更丰富多样，大大扩展了语言的表达空间。语言符号有其对称性一面，也有其非对称性一面，从而使语言符号能全面准确地描述客观世界的一切事象，也能丰富真实地体现主观世界的感受和思想。

（1）语言符号的对称性。一切符号在总体上几乎都具有对称性特征，首先反映在选择的物化材料上，这些物化材料正是物质世界对立统一的象征。例如非语言传播的绘画，其线条、色彩和块面，每种符号几乎都是成对地呈现：直线与曲线、有色与无色、对称图形与非对称图形等；音乐语言中节奏与旋律的高低、长短、强弱等；雕塑之体积语言中的比例、方位、位置以及质感等无不体现出对称原理。语言符号中大量对举关系的对称性尤其明显，例如语言与文字、口语与书面语、口语与文语等，还有自然语和仿真语（人工合成语言）、有声语言与体态语言、交际语言与

艺术语言等。至于语言符号的物质材料——语音的对称特征就更加突出了，例如元音与辅音、擦音与塞音、清音与浊音、口音与唇音、齿音与牙音等等，此外有连续音与离散音、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等，还有声音的自然信息与约定信息、自然音和合成音等，语音的区别性特征尤其突出反映了语言符号具有对称关系的一面。但是，语言符号的具体构成成分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

(2) 语言符号能指的非对称性。语言符号的能指包括听觉的物化和视觉的物化，前者表现为语音，后者表现为文字。语音方面的不对称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唇音的清浊与送气，有的语言是两分的，有的语言是三分的。古代汉语的语音是三分的：清浊对立外，清音又分为送气音和不送气音的对立；现代汉语普通话则是两分的，浊音已经消失，只有清音的送气和不送气对立。现代英语的语音也是两分的，分清浊音对立，清音不分送气和不送气。就文字而言，有的是音素文字（韩国的谚文），有的是音位文字（英文），有的是音节文字（中文），有的是线性文字如罗马字母或拉丁字母，有的是平面文字如日本的假名、韩国的谚文和中国的汉字。平面文字的日韩中三国文字又不同，韩语是音素文字，日语是音段文字，汉语是音节文字。能指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语言符号能指层面表达方式的多元化。

(3) 语言符号所指的非对称性。语言符号的所指包括客体事象外还包括着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所指的多种心理暗示使得传播活动在实践中灵活和含蓄，也使得传播更具有人文个性。如果语言符号所指是单一的对称关系，那么语言也将失去生动性。比如语言符号“火”，其意义十分丰富，有文化蕴涵、生活色彩、历史积淀等不同角度的意义呈现，字符“火”对热恋的情侣可能是激情的联想，对商家营销的期待可能是旺盛的象征，对《三国演义》中三位政治家可能是军事谋略的暗示……不同生活经验和文化修养的人，对同一个语言符号的心理反应是很不相同的。不同传播环境下的传播效应也很不相同，几乎找不到跟它完全对称的意义范畴。

6. 超时空性特征

任何一种语言符号对于使用它的民族来说是共有的财富。语言的使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般来说，作为符号形式它既不因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也不因使用者的身份而被强迫改造，尽管它所表达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也不影响它为全民族、全社会服务的功能。尤其是语言符号的符号——文字印迹，更可以留至万世，传之异地。语言符号的超时空性突出反映在以下三点：

(1) 可以指称不在眼前的事象。语言符号超时空性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能指称不在眼前的客体事象。人们用语言文字可以描述远古时代的先民往事，可以再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任何事件，可以绘声绘色记录亲友的音容笑貌，可以形象地重塑异国他乡的生活风情，总之古今中外一切在眼前或不在眼前的、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道听途说而非亲眼目睹的事情，都能通过语言文字形式使它们

栩栩如生地呈现于人前。语言文字的这种表现再现能力，使它具有其他任何符号所不能达到的艺术意境。

（2）可以指称没有发生过的事象。语言符号超时空性的又一个特点，就是能指称没有发生过的事象。语言文字符号给人提供了最丰富的想象空间。每个符号所概括的内容，既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体事物，也不是可以被感觉器官能感受的实体事物，因为符号概括的是某一个类，这个类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比如“桌子”这个符号，既不是指称某一只具体的桌子，也不仅仅指称现存的所有桌子，还包括着尚未被制作出来的桌子。正因为这一特点，使得语言符号具有了虚拟的性质，可以指称没有发生过的事象，指称未来可能发生或可能出现的事象。

（3）可以指称非物质形态的事象。语言符号超时空性的另一特点，就是能够论述人们内心的思想，能够表达深邃的哲学真谛，能够转译心理的梦幻和臆想，能够指称身前没有经历过的主观想象，能够进行纯理论的推导和预测，能够通过高度抽象的思维活动从事创造性的艺术创作。语言文字的这种想象性和创造性能力，使语言文字本身成为知识的产物、思想的产物，成为人类进化中全社会共享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2.3 语言符号的变化和新生

符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为了表达的需要，无时无刻都在创造新的符号——能作为意义解释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人们创造新的符号，以总结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新经验或新认知。当新的符号一进入社会传播领域时，就成为整个传播符号系统的成员，成为新知识的载体被广泛使用。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像潮水一般涌向社会，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身边。为了沟通，为了实现信息共享，信息传播必不可少，而传播就离不开符号。人们把这些新出现的信息编织成新的符号，注入信息流，使传播者和受播者双方满足各自的需求。

一个符号包括新生的符号必须符合以下的基本条件：

1. *物质性*

具有传播功能的符号必须看得见，或者听得到，或者摸得着，它可以是音响、图案、线条、颜色或者实物。像交通的红绿灯、旗语的手势、书写的文字等，都是视觉可以感知的特定符号。为盲人提供信息服务的盲文，是触觉可以感知的符号。音乐、言语等是听觉可以感知的符号。物质性是符号构成的必不可少的形式特征。即便是无影无形、无声无息的物质，如微电波、超声波、红外线之类，用于符号系统时，也必须转化为可视、可听或可触摸的标记。例如电报符号，传播者通过电键用

或长或短的电波发射出去，在太空中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地传播，但是到了受播者那里一定要转化为有形的符号，或者用扬声器放大为可以听得到的长短声讯，或者是用纸带记录下看得见的长短标记。新的符号无时无刻、成千上万地在社会交际活动中产生和传播，有语言形式的，有非语言形式的。语言形式的，有如“电脑”“下岗”“扫黄”“三农”等新词语或新简缩词的大量涌现，有如“瘟酒吧”（Win98）、“伊妹儿”（E-Mail）、“克隆”（clone）、“秀”（show）、“托福”（TOEFL）等外来音译或音译兼意词的成群结队引进，有如“VIP”（贵宾）、“ADSL”（非对称数字用户专线，俗称一线通）、“ATM”（自动取款机）、“TV”（电视）、“卡拉 OK”（日语：无歌词音乐）等外来字母词对汉字书写系统的大规模渗透。非语言形式的，有如影视传播、电子刊物、网络世界等，有如动漫广告、形象设计、时尚实播等，这些新型传播形式中出现的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新符号，都不断转化为语言符号进入语言系统，如“城市规划”、“企业策划”、“新新人类塑造”等高度抽象意义的符号，“服装时尚”、“人体造型”、“公关礼仪”等行为模式的符号，频频簇拥入人类的眼球，烙印于人们的大脑。它们一旦融入现成的具有表达意义的传播符号系统，立即充分发挥它们的符号功能。

2. 系统性

任何一个新生的符号必须被原符号系统大家庭所认可，成为系统中的普通一员，否则它只能游离在系统之外，至多算是一个孤立的、特殊的记号，或者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出现的临时性信号。我们知道，传播实质上就是人际间通过普通的符号系统，交换彼此信息的行为，因此符号和意义（或信息）是传播的两个基本概念。离开符号，便没有传播。反之，任何单个标记（即使承载着信息），不进入符号的传播系统，便不成其为符号。例如红色，在交通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暂停通行”的信息；在城市工程规划的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危险”的信息；在报警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警令”信息；在电信电路的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电源接通”信息；在汉民族的民俗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吉祥喜庆”信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革命”信息；在物理现象的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某种光谱信息；在日常生活的符号系统里，传播的是可被人感知的颜色信息；在新闻传播的符号系统里，标题套红表示所传播信息的重要地位；在车辆颜色标记的符号系统里，涂抹红色表示消防火警的信息；在“十字形”符号系统里，红色传播的是医疗卫生的信息，如此等等，显示一个符号进入不同的系统所传播的信息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孤立形态的红色，只能表示一种光或色的自然存在，没有任何特定意义。红色对汉民族有着特别的情感因素，象征着特定民族意识，如果它不进入汉民族生活的认知符号系统，那么它的意义可能不是“喜庆”的信息而大相径庭地传递出“恐怖”的信息。

所以任何一个符号，必须作为普通成员进入到它赖以存在的系统，并在该系统

中出现于一定的意义节点上。因为符号具有系统性，符号与符号不是互不相干的一盘散沙，无论是符号的显现形式——能指系统，或者符号的深层形式——意义——所指系统，都有非常严整的结构和结构规则，它所呈现的层级体系、符号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以及对照系统和替换原理等，都十分有组织，十分有条理。符号系统是一种严格的分层装置，这种装置依靠三个最基本的规则来运转。这三个基本规则是：①组合与聚合规则；②转换与替换规则；③有序与定向规则。

3. 概括性

符号必须具有概括性，能把所指的客观事物的个体概括成类，并能屏弃所指事物事象的非区别性特征。符号可以表示客观世界的一切，由于现实事象或事件的每个个体都是无限的，人们没有必要给万事万物的每个个体设置一个符号，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做。我们不可能给一个个个别事物，如一支笔、一条船、一台机器，或一件事、一个想法、一个观点……都设立一个指称性符号（唯有人是例外，随着人的个体独立性加强，每个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立的符号——姓氏和名号，或者是各不相同的身份证号），而只能把个体事物概括成类，给每个类设置一个区别性符号。当符号成为类的象征时，符号本身的个性就不复体现。概括是人类的一种心理认识活动，它的成果就是“给予意义”，就是人类给予指称客观事象的符号以意义。所以说，符号的意义是人们对一类现实事象的概括的反映。在语言中，音义结合的统一体构成语言符号，成为现实事象或事件的代表。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与符号的所指所对应的现实事象没有直接的联系，意义是联系现实事象和语音之间的桥梁。语言符号的意义没有与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语音是联系人与意义的桥梁。比如一个词语“桥”，它就是现实存在的所有各种各样的桥的概括。至于它的声音 qiáo 并没有与现实事象的桥直接发生联系，它是在与“桥”的意义结合过程中才指向现实的桥。如果 qiáo 这个声音符号概括的意义表示抬起的动作时，它指向的现实事象就不再是桥，而是动作翘起（如翘首而望）了！

在更为广泛的符号系统中，当某一自然物被赋予意义，约定为社会性符号时，它作为自然物本身的价值便不复存在，只剩下能指（形式）和所指（意义）结合的交际功能。比如一件出土的陶器，当它被认定为文物——原始文化符号呈现时，它的容器功能就变得很不重要了。某些最自然的表情或生理反应，例如微笑、嗤鼻、咳嗽、点头等，当它们不是生理反应的自然流露，而被社会约定强制使用并作为一种特殊礼仪规矩时，就成为了交际符号——体态语言。于是微笑表示特定的赞许，嗤鼻表示某种蔑视，咳嗽表示制止某行为的暗示，点头表示应对对方的首肯等。即使某个基于象形构造具有原始意义的汉字，当它进入整个文字符号系统时，它与文字形体有关联的所有意义也常常被忽视（只有在古文字学研究中，它们作为文字符号能指层面的部件与所指层面的意义，才被重视），比如本来描绘鼻子形体的“自”，包

括作为部件出现在“臭”和“息”字里的“自”，人们在识别和使用这一符号时根本不会去领会、也根本不在乎它们在字源上与鼻子有什么样的原始联系。现代网络语言中新生的一个语言符号“虫”，它既与自然界的虫毫无本质上的关联，也与文字学上的虫的本来意义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它撇开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仅仅以 chóng 的语音形式为中介，表示现代人对电脑工作中出现的两类现实事象的概括：一种是指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正常工作具有破坏性的程序——病毒；一种指人，指沉溺于网络生涯的计算机迷。这里充分显示了符号的系统性和概括功能。至于网络语言中出现的谐声型的“美眉”（妹妹）、“葛格”（哥哥），纯符号型的“：-)”（微笑）、“？-?”（瞪眼），数字型的“－7”（负气）、“886”（拜拜啦）等，虽然符号的形式与内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因素，但在进入网络语言系统时仍然是网虫们“自我感受”的一种概括。

诚如前述，一个符号概括的是一个类，人们不可能为自己不断获得的新的认知都设置一个新符号，但是新信息又必须有新的符号来指称。于是新的信息往往借用旧的符号来表达，让旧瓶装新酒。有时旧符号可以照搬照用，只要为它增加新的外延意义和内蕴意义（不是逻辑概念的内涵意义），十分省事；有时要对旧的符号进行系统调整，使它能有效实现新信息的传播功能。扩大语义和调整功能，是对旧符号进行改造的两种基本方式，这种改造是在原符号系统中进行的，旧的符号形式与新的符号意义的结合也需要有一个约定过程，也必须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同。

符号系统是一个历时系统，有它历史继承性，谁也不能轻易地任意变动它，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它。每个符号在系统中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这是历史的准确定位。一旦稍有改变，就会牵动左右，往往促使系统的调整。符号系统也是一个共时系统，有社会约定性，谁也不能按个人意志改变社会的意志。符号在历时性作用下沿着时间历程进行自我调整和变化，同时符号又在共时性作用下与并存同一空间的相关符号产生相关性变化和同步调整。也就是说，符号的指称是超时空的，但它在系统中的存在却受到时间的历时性和空间的共时性两方面的作用和制约。一个符号的生成和发展需要历时的考验与共时的平衡，情况非常复杂。所以新信息获得符号的常见方法一般不是刻意去制造一个新符号，而是选择适当的旧符号，将新的信息内容注入进去，尽量维持符号原来的功能，这样既不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完整，又不必麻烦地创造新符号。我们把旧符号的改造归纳为如下几种类型：

（1）借用旧符号进行相似性处理。当初佛教传入中国，在寺院建筑中出现了悬挂的响器，通常用于寺院佛事，作报时、报警或集合的信号，梵语叫 Ghanta。在翻译为汉语时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的钟，钟在上古时代是用于祭祀或宴享的乐器。魏晋时代就借用古乐器的符号“钟”来表示佛教传播进来的新事物，古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里的钟声就是寺院佛事的钟声。后来西方的计时器传播

到中国来了，中国人也不知它是啥东西，一开始也许胡乱称呼着。但是一个新事物，如果没有命名就无法使人认识，无法进行传播。于是根据相似性原理联想到了钟。这样汉语的文字符号“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增加了佛事用的钟和计时用的钟的新信息。借用现成的旧符号利用相似性原理来传播新信息的情况是对旧符号改造的最常使用的方法。历史语言学就借用了数学符号的＞(大于)和＜(小于)来表示语音的历史演变，如用 *gw+j−＞jw−表示中古喻母三等音的历史来源；现代音位理论就借用数学的＋(正号)和－(负号)在区别性特征矩阵中表示肯否符号。我们汉语拼音字母也是借用了西文字母符号而来的。

(2) 借用旧符号添加特征标记处理。旧符号改造的另一途径是在旧符号上添加一些标记，以形成区别于旧符号的新符号，也表示其传播的新信息与旧符号所传播的旧信息的关联。语言符号中的前缀、后缀标记便是对已有符号的改造与更新。许多新造的汉字符号也往往具有这一特点，比如新的形声字“氕(取读音撇)、氘(取读音刀)、氚(取读音川)”，分别表示新发现的氢的同位素，“气”表示与气体氢的关系，“丿刂川”表示一号二号三号，其读音则按添加标记的原读音赋予。新造的物理符号“熵”在“商”旁添加“火”，表示在热力系统中不能利用来做功的热能，即用热能的变化量除以温度所得的商。这种给符号以某种标记性处理形成概念特征的方法在其他类型传播符号中屡见不鲜，汉民族男女性别特征除了天然的性标记外，其区别性符号是比较后起的，如通过头发的发式标记作为区别符号，或通过服装纽扣左右标记作为区别符号。例如商品标价牌用不同颜色标记作为价格变动的区别符号；又例如学生上课出缺席用/(出席)和○(缺席)符号表示，两者复合构成⊘表示迟到，出席标记/添加＼标记成×表示早退，如与迟到符号复合，构成⊗(迟到并早退)，便形成新的区别符号。

(3) 借用旧符号进行重新组合处理。许多新词语的诞生一般也利用原有语素进行新的搭配，而不再另造新字，所以所谓新词新语只是旧符号的重新组合而已，例如住宅用语“小高层”、商业用语“超市”、传媒用语“直播”、计算机用语“软件”、教学用语“自考”等等。其中“小、高、层、超、市、传、自、体、播、软、件、考”等语素符号都是现成的，只不过进行了新的组合。在其他类型的符号系统里，也无不如此，重新组合符号的新信息中蕴涵着原有符号的固有信息。这样的改造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不影响原有符号系统的结构，也不会干扰旧符号的信息传递。

随着新符号的大量产生，随着旧有符号的不断更新，对旧符号进行内部的系统调整就势不可免。这是旧符号改造最复杂的过程，但它可以使符号内部更趋一致，使符号的分工更具细密。这一点在语言系统中反映特别突出，比如文字符号“表”，本来除了表示外衣外，还表示中国古代测量日影的天文仪器。当西方的计时器传播到中国时，曾联想到古汉语中的表具有表示日晷信息的意思，就借用了这个符

号；但最初借用的时候这个“表”与“钟”是没有区分的，白话小说《儿女英雄传》第3回：“（安公子）看了看墙上的那个表，已经丑正了。”所指的表正是钟。相同的所指却用不同的符号表述，必然会造成传播信息的噪音干扰，不利于交际。于是系统必须将它们进行调整，把悬挂式和台式的计时器叫“钟”，把戴在手腕上的计时器叫“表”。又如“臭”本来蕴涵的信息比较多，有气味（不管香臭）和嗅的意义。古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是指香味。随着“香”从酒味转为香味，随着“闻”从听觉到兼有嗅觉，“臭”的表香味和表嗅觉的信息功能就弱化了，便调整为只剩下一个信息成分——臭味。语言符号的系统调整还表现在构词法上，例如在上古汉语里并列关系或修饰关系的语素在组合时，其序列组合的顺逆是自由的，意志＝志意、人民＝民人、国家＝家国；蝗虫＝虫蝗、中心＝心中，等等。这种自由组合明显不利于符号系统的规则性，于是在使用中它们的“自由”终于被制约，组合序列渐渐固定下来。大部分语符的顺逆不再允许互换，一部分语符的自由变换成为语符的别义功能，例如“兄”和“弟”这两个语素符号所指的意义关系是并列的，但是“兄弟”和“弟兄”表示的意思就不一样；“手”和“脚”也是并列的意义关系，但是“手脚”和“脚手”意思就不一样。加缀的情况也类似，“老”作前缀的“老×”，传递着说话人对听话人又敬又爱的信息；而带后缀形式的“×老”，则爱的信息量减弱而敬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语言符号在传播交际时，线性序列的调整对信息的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入句层面时，这种信息差别尤其明显了，例如“客人来了”表示这个“客人”是交际双方所共知的信息，而“来客人了”则表示这个“客人”是交际的某一方所未知的信息。这些就是符号系统内部调整的结果。

2.4 语言、言语和非语言符号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运用便是言语。正是由于言语的诞生、完善和协同运用，使得人脑高速发展，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动物，并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组成了社会。人类的言语行为成为社会的粘合剂。尽管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除了语言符号之外还存在非语言符号，但是只有语言符号组成的言语系列是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假如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言语，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言语，那么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所以，语言符号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一、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比较

传播符号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非语言符号系统同样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非语言符号最终必须由语言符号来阐

释。而且我们会发现，不管非语言符号有多少种和采用哪一种传播方式，也不管它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而为，都有一些跟语言符号不同的特点：

1. 连贯性

语言符号是线性的，沿着一维性依据语法、逻辑的规则排列。在一个语符序列中，不同性质、特点的词汇都有自己大体的位置，而且它们各自独立、相互分离。因此，语言符号也是数位符号。非语言符号"则相互连贯，并形成一个色带（色彩）和范围（声音）"。[①] 就是说，任何语言符号即使单个出现时，也具有某种可分析的意义，而且它在受播者心目中都具有确定的位置。即当一个名词性质的语符号独立出现时，受播者一定能从它的意义去补出它的句法地位，例如"谁?"受播者很快把它理解为"是谁?"如果受播者转换为新一轮话语的传播者而回答"我"时，原先的传播者也立刻转换为新一轮话语的受播者，他会从"我"的声音特征在自己的心理印迹中寻找"'我'是谁?"的答案。这便是语言符号数位特征的句法效应。非语言符号则没有很强的数位性，它传播信息时，只是在一连串的符号中着重突出某个符号，该符号的表述并没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与语言符号或其他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很少单独出现。例如绘画是由线条、块面和色彩等符号平面组合而成，单一线条或单一色彩都不能形成绘画，也不能显示意义，只有若干线条或若干色彩组合在一起，才显示特定的意义。音乐中的单一音符和单一节律的情况也如此。因此，非语言符号也可称作连贯符号。

2. 相似性

语言符号跟它的指称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必须通过人的心理印迹的中介才能获得解释。而大多数非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它是把客观事物直接地或间接地符号化。比如在人们的肢体语言里，竖起食指可以代表数字"一"，伸出食指再竖起拇指可以代表"八"，伸出双臂上下扑扇可以代表飞鸟，用双手比划可以表示某一物件的大小或形状，用握手表示友好，用鞠躬表示礼貌，等等。某些肢体语言的特殊形式，比如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在艺术舞蹈中，也有更多的反映。书面记录语言的表意文字（如汉字）在产生的初始阶段也许具有某种相似性特征，如日、月、山、水等，但随着文字的成熟渐渐失去相似性，其表音功能很快使文字的形体意义的相似性远逝而去。当然在表音文字（除拟声词）系统里，根本没有相似性。符号与实物相似，通过相似性使人们直接引发对意义的联想，似乎只存在于非语言符号之中。尤其是非语言艺术的传播中，无论是表现性艺术还是再现性艺术，作为艺术语言性质的符号都具有某种相似性特征。

---

① Steohon. W. Liittlejohn. 人类传播理论[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 通义性

非语言符号，几乎可以称之为“世界语”，一般地说，人们——不管母语如何地不同，都可以通过非语言符号的相似性获得跟客体事象的联想，获得非语言符号意义的译读、理解。但是，要认识文字、听懂话语，通常要经过学习、接受教育。而且不同母语的人对另一种不熟悉的语言，不经过专门的训练，几乎无法去认识它。但是对于非语言符号，似乎无须接受专门教育，即使比较专门化的音乐符号，没有经过专门化训练往往也能从节律控制下的音响产生恐惧或欢乐、忧虑或哀伤，人们从中感悟出举世通用的意义。又比如向人作恫吓或威胁的姿态，向人表示乞求或可怜的行为，向人做出欢迎或喜爱的动作，这些肢体符号所传达的意义，不同国家的人都能作出相近、共通的理解。在艺术语言的传播中，只有语言艺术必须经过语码转换才能传播，其他非语言艺术的传播几乎都不必有这个过程，就是因为非语言符号的艺术语言具有特殊的通义性。

4. 协同性

每个语言符号基本上都有独立的意指，在系统内部归属于一定的聚合功能集，进入词符序列时又跟毗邻的词符形成组合关系。但是，各种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往往是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协同一致的。如果它们不是这样，表达的意图就要受到怀疑。也就是说，非语言符号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组合，但总是在伴随现象烘托下，才能真实地呈现意义和价值。比如一个人的脸上写出愤怒至极时的连续性肢体符号时，尽管竭力克制，但沁出的汗珠、迅速的眨眼、轻微的哆嗦、沙哑的声音等非语言符号都会协同配合，纷纷帮助显示意义。即使是家具的布置、菜单图谱的安排、时装模特的穿着，等等，必须有相应的非语言符号配合，在非语言符号的协同传播下才能呈现其文化信息。

5. 回应性

凡是符号传播都有一定的回应。语言符号的受播方一般必须以同样性质的语言符号来回应，话语语言学便是建立在这种符号回应性基础上的。当然语言符号的传播在特定语境下也可能出现非语言符号的肢体符号来回应。但是非语言符号则不同，往往通过非同质系统的符号来回应，有的甚至是条件反射式的传播来回应。例如驾驶汽车，交通符号红灯一亮即踩刹车来回应；看电影电视，一出现紧张的场景，观者的情绪立即出现反响。当然在非语言传播的艺术符号中，也常出现同质符号回应的情况，如用音乐回应音乐、用绘画回应绘画等。一般说对于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回应的方式是多种的，有言语的、肢体的和表情的，或者是实物的、行为的和无声色的等等。

6. 知觉性

语言符号是通过声音来传导，用耳朵接收，大脑来思考的。语言被文字化后，

虽然通过文字形体来传导，用眼睛替代了耳朵，但是声音仍然在大脑内部发挥作用，文字被转化为心理的声音印迹而形成意义。但是非言语符号除音乐以外几乎都是通过形体的变化来传导的，都是用眼睛来接收的。如果说言语是思想的现实，那么眼睛是心灵的通道。非语言符号往往更多的是人类知觉的产物，它们通过眼睛的通道直接形成心灵的感受，因此非语言符号总是以知觉的真实现实于人，正如许多非语言符号作为语言符号的辅助符号一样，如果你的讲话同你的目光和面部表情不一致，聪明的听者总是依据非语言符号迅速对你的言语的真实性作出准确的判断。甚至连孩子也会听到父母严厉批评的词语之后，从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中将批评的分量降到适当程度。因为非语言符号显得更加直觉地真实。正因为这样，有时非语言符号成为语言符号传播中极其重要的辅助手段。

二、语言与言语的不同

在了解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性质和不同特征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弄清语言和言语的不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对两者不加区分，但是在符号学中它们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有人说“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和有人说“《史记》的语言表达非常精炼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两句话里都出现“语言”这个词语符号，但是它们实际表达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语言”，后者指的则是“言语”。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这套系统经过祖祖辈辈的使用和传播，以非常规则的形式并通过约定的方式凝固而成，已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系统内部来看，由符号（语音和词汇）和符号的运作规则（语法）构成，系统的每个成分都有音义两个方面，每个成分又都以别的成分的存在而存在，构成一定的关系，谁也不能孤立地存在。而言语则是对语言符号的具体运用，包括话语及其行为和结果。

语言和言语的不同主要在这三个方面：

1. 一般语言与具体语言

一般语言是人类用来说话的全部心理和生理过程，而具体语言则代表这些过程的实际运用。一般语言就是符号学上的语言，巴尔特称之为“语言之语”；具体语言就是符号学上的言语，巴尔特称之为“语言之言”。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指出，“语言之语基本上是一个集体契约”，“它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价值系统。作为社会制度，它绝不是一种行为，它摆脱了任何的深思熟虑。它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人既不能创造也不能修改它”[①]。言语——每个人说（写）的话语都是具体的，通过听觉（或视觉）使人感知，而且都必然带有许多具体的特点，如地域、性别、年龄、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身体状况等。而语言则是对具体言语的抽象，撇开

①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

言语中的具体物质，从言语中抽象出一些具体的规律和规则。所以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言语具有个体差异，语言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语言源于言语而又作用于言语，它对言语有强制性的规范作用。每个人的言语可以千差万别，但必须遵守共同的语言规则，才能完成交际。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一般意义的符号和具体意义的符号，中国古代哲人名家公孙龙有句著名论断"白马非马"，就是强调区分一般意义的"马"和具体意义的"马"。同一语言符号通常集"一般"与"具体"于一身，在现实应用中经常会出现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分，比如有人抨击某人时往往说："这个人不是人！"前一个"人"就是具体意义的"人"，后者则是一般意义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具体的人物身上缺乏一般人的基本素质。

在一般语言里，所有符号的指称也都是"一般"的。但是进入言语，则永远是具体的。

"桌子"在一般语言里是指称一般的桌子，包括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形态、任何用途的所有桌子，而且事实上这种桌子是完全抽象的，在现实世界实际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当它一进入具体语言，就变得如此具体，它所存在的时空域立刻被限制，它的形态——大小、颜色和用途都顿时变得具体和生动。就像"我"这个指代第一人称的符号，在语言里没有任何确指的具体人物，但是在言语的符号系列里总是确定地表示某个具体的说话人在表述自己。这就是语言和言语的根本区别。

2. 有限集合与无限集合

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符号，是由一定数量的要素构成，其中每一个要素既是一个等价物，又是一个较大的功能项，在这一切功能项中相关的价值都不同程度地占有一个席位。所谓要素即是能指的符号，所谓等价物即是所指的意义，所谓功能项即是系统中的结构地位。因此符号相当于一枚钱币，它等价于它所能购买的某一商品，但其价值又可通过与其他含值或高或低的钱币相比较来获得[①]。在人类历史上，钱币的出现大大简化了物物交换的手续，它以商品交换的中介角色，使等价物商品化和功能化。这样通过钱币有限的可识别面值进行不同组合，成为无限被商品化的物件的等价符号，从而构成一个以等价符号——钱币和商品化物件为主体的市场。在某一钱币系统里，钱币总是有限的集合，比如人民币系统里目前只有"分、角、元"三级，其下位有"1 分、2 分、5 分；1 角、2 角、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共 13 类。但是在每个使用者手里，却有无数的"分、角、元"，而且能组合成各种可能有的钱币值，流通在市场上，足以换取它的无限等价物。语言的功能与此颇相似，语言也是一个符号的有限集合，就某一语言而言，所能资以

---

①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

辨别的语音是有限的，词语数量和构词规则是有限的，组词成句的规则也是有限的。而言语却是一个无限的集合，它通过相同符号的反复组合，经过个人的心理—物理机制的过滤表露出来，还有语音的高低及语速的快慢，造成变化无穷的话语，从而用来指称或表述万事万物，构成一个以语言符号和客体事象为主体的言语场。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说话会完全一样。因此，言语作为一个行为过程，人们所能说出的话语是无限的。总之有限的语言单位在言语场内按照一定规则组织成一个系统，一个音义结合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人们的一切言语活动都在语言这个系统中运行。利用有限的符号及其规则说出无限的话语，这是言语的特点。人类利用语言符号的等价替换和功能分析，能够说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能够听懂从来没有听过的话，原因就在这里。

3. 静态系统与动态系统

总的来说，语言是静态的，言语是动态的。在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的言语活动中，就人们运用的某一语言而言，其规则是现成的，早先约定的，不允许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这是言语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人类便无法交际，也无法组织社会。因而语言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处于静止状态。当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言语的发展，语言也会出现适应性变化。所以说语言这个静态系统是相对的，比较正确的说法，是静中有动，静中有变。

言语则不同，言语活动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展开，然而说话人和听话人又在话语交际中时刻进行角色转换，从说到听就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思想——→内部语言——→编码——→(通过说话人的口)——→语音形式——→(通过听话人的耳)——→解码——→语义还原。此外语言单位在具体运用中会形成许多变体，还有说不清的个体差异，具体的语音、具体的词及进入交际的句子，都是动态的。当然言语的动态也是相对的，因为构成言语的基本单位——音素、音位、音节、义素、义位、语素、词语、短语等——是静态单位，句子模式也是静态单位，而且言语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语言规则也是现成的、凝固的、静态的。

一静一动，互为静动，语言和言语存在于一种相互涵盖的关系中。一方面，语言是言语以变换无穷的方式去实现的一个完全抽象的实体，一个超乎个人的规范，一个基本类型的集合；另一方面，言语是语言符号在基本规约控制下以工具方式来完成的一个真正现实，一个纯粹属于个人的行为，一个充满个性和文化气息的生命。

2.5　语言与书写符号

语言包括声音符号与书写符号。书写符号——文字是与语言的声音符号并不

完全相同的符号系统。从发生学看，声音符号与人类一样古老，它既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又是实现交际、组织社会的工具；书写符号则是在语言的声音符号产生后经过非常漫长的阶段才发明出来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语言的声音符号，表现语音。从传播学看，语言的声音符号凭口耳传播，有时间和空间的极大局限性，而书写符号克服了这一局限，使一发即逝的有声符号不必依赖口耳而“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从符号学看，语言符号通过“音”来达“义”，而书写符号则用“形”通过“音”来达“义”，所以书写符号——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一个系统，单个的“字”是“文字”系统的一个个成员。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由字素符(笔画和部件)、字符(总数超过5万)、书写规则(笔顺和字序)及辅助标记(标点符号)等组成。文字虽然是通过视觉感知的书写形式来标记语言的，但是有着与语音不可分离的联系；没有读音的书写符号就不是文字。社会上有许许多多规约性符号，如交通符号、产品符号、商标符号等，因为不具有可读的表音特征，所以都不是语言符号。即使像汉字这种历来被认为表意功能很强的文字，本质上说还是表音的：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文字表音的心理印迹使它具有了替代口说的词语的作用，文字可称为语言符号的第二系统。语言的物化形式是“听”的，其内容是“想”的；那么文字的物化形式是“看”的，但其内容是“读”的。盲文是触觉文字，其物化形式是“摸”的，但其内容也是“读”的。实验证明，即使我们看书不出声，声带却仍处于动作状态。这就是文字表音的心理印迹效应。正是这种文字的可读性及其读音的心理印迹，文字才具有了记录语言的可能。

尽管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但是单个的字不是语言，文字本身也不是语言，只有在他们用于记录言语——在线性序列上进行有规则组合时才是言语的实现。书面语言是对口头言语(也称自然语言的符号序列)的文字包装。因此，文字能使语言更加形式化。语言经过文字包装(或者说是听觉符号的视觉化)，语言符号的生成特征和线性特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它使语言表现世界方面的有限性得到了补充，口头言语因为赶不上思维而可能出现的凌乱也得到了修正。言语用书写形式表达时，瞬间生成的思想获得充裕时间来锤炼，使语言表达更成熟，更完整。所以文字是语言系统的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辅助符号，具有扩大和完善语言的作用，以及超越时空的交际作用。

文字符号虽然表示语言符号，但文字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这好比商品的包装不等于商品本身，语言的“替身”文字与语言的声音符号之间的非直接对应表现为如下情况(以汉字为例)：

(1) 一形多义。某一文字符号在固定能指形式下的所指，可以与若干个语言符号单位相对应。例如“气”的所指可以是多项，分别表示“生气”、“空气”、“大气”、

“天气”、“火气”和“元气”等。这与语言符号往往指向多个现实事象的道理是一样的，文字的这一意指特征能够大大减少符号的数量。

（2）一义多形。多个文字符号的能指可以与一个语言符号所指的基本蕴涵相联结。例如汉语联绵词“望洋”、“亡羊”、“望阳”等，都是表示抬头仰视而茫然的意思的不同能指。外来词转写成纯粹记录声音的文字符号时，如音译词表示激光的“莱塞”和“镭射”，表示冷冻乳制品的“冰激凌”和“冰淇淋”，表示伤口包扎布的“绷带”和“绑带”等，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更为多见。这是文字符号跟语言符号之间不和谐的一种特殊现象。

（3）一合二音。一个文字符号可以代表两个语言符号的语音组合。例如现代汉语“甭”是语言符号“不用”的语音组合，“别”是语言符号“不要”的语音组合，“啦”是语言符号“了啊”的语音组合；古代汉语“诸”是“之于”或“之乎”的合音，“盍”是“何不”的合音等。这是文字符号尽可能跟语言符号达到和谐状态的一种表现。

（4）一形多音。一个文字符号与多个语言符号的能指联结，表现为一字多音。例如“朴”字的读音有 pǔ(朴素)、pō(朴刀)、pò(朴硝)、piáo(姓氏) 四个。这一些现象不只在文字符号中存在，在各种传播符号中都普遍存在，正反映了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也反映了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离散性和统一性。

（5）部分代整。在多音节短语中，通过核心语符的提取来减少短语的语音，形成语符简缩的新组合，但并不改变语义的信息量。这样，用部分字符可以表示整个字符串，形成词语的简缩形式。例如用“中国”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式上是取头留尾，内容上一个“中”字符代表了“中华人民”多个字符。当我们在联合国庄严宣告“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时，这个“中国”和“中”具有特定的语符信息。其他如“美国”表示“美利坚合众国”，“公厕”表示“公共厕所”，“入世”表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安检”表示“安全检查”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体现，用尽可能少的符号来传播最大的信息量。

正是上述这种文字的特性及语言的书写符号与声音符号的非对应现象，提醒人们在辨认文字、解读书写符号时必须像辨认商品一样，要重视商品的包装，透过包装去了解商品的真实内涵，不能受商品包装的蒙骗。

语言符号包含一个既定的系统，又包含着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制度和过去的产物。语言符号的能指对它的所指来说，表面上是自由的，它们的结合具有任意性，但是语言的能指（语音形式）对于使用它的社会来说却是强制的，大众交际别无选择，因为语言是人类指称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语言不仅使世界符号化，也使思维符号化，正由于此，人类有可能使思维与客观世界对应起来。人类为了交际和传播，要求语言必须稳定，必须保守。然而事实是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表现为一个时间连续体，处在经常的变化中，有历史的变异，也有个体

使用者的变异。能指会变，所指也会变，甚至组合规则也会变。与语言相比，文字的保守性就强得多了。书写符号给人以永恒的、稳定的感觉，它更能构成符号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最大要求。尽管文字表现出来的“统一”是一种假象，但是它完全能满足人际传播的现实需要。

文字“包装”有声语言，这跟商品的“包装”几乎十分相似。人们在选择商品时，一般无法打开“包装”在里面的商品，去窥探商品的本质内涵，因此只能从包装上去辨认商品的内容和质量。人们确信被包装的商品跟“包装”是一致的，于是无形间人们与其说在选择商品不如说在选择“包装”。现代商品社会，“包装”之所以特别重要可见一斑。文字之“包装”有声语言，也给人以一种坚决的确信，因为文字的永恒性、凝固性和历史传承性，使文字的价值观往往高于有声语言。“口说无凭”、“白纸黑字”、“立字为据”等成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在人们心目中书写符号的权威性。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商品的“包装”无论在材质和形式上都是允许自由选择的，商品的“包装”有可能跟商品的内容未必完全统一，会造成某种假象。然而对文字而言，它也许有可能出现某种虚假的包装，例如乍见“蹦极”这个字符组合的时候，人们很难联想到这是起源于南太平洋岛瓦努阿图(Vanuatu)的一种成年仪式。几百年前瓦努阿图的男人们必须经受住高空悬跳的考验，才能算是成年。他们用藤条捆住双腿，从35米高的木塔上往下跳，在离地面几英寸时戛然停止，然后全村男女老少围着他载歌载舞，庆祝他成功通过了成年考验。这个来源于英语 Bungee 的词语被汉字“包装”后，彻底掩盖了原词符的文化蕴涵。尽管如此，从总体来说，文字符号显然是语言的声音符号唯一可靠有效的“包装”。

文字既然是一种符号，自然也有能指和所指的二重表现。能指是它的视觉形体，所指是它所代表的与语言意义有关联的语音。文字(能指和所指的音形结合体)用作语言的能指，语言的能指随着时间轴已经发生了历史变化，而文字仍然以其古老的形态包装变化了的语言，这样文字符号的结合体和语言符号就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矛盾。

矛盾之一：能指与语音的脱节。文字符号的能指背后联结着语音(少数汉字还直接与意义有联结)，现实语音已经有了变化，而文字符号固守不变。这时，一种情况是语言符号要求文字符号适应它的变化，如中世纪英语中有两个 e：开口的 e (sed“种子”)和闭口的 e(led“引导”)，原来的文字符号不能表示两个 e 的区分，于是将文字形式改造成 seed 和 lead 以示区别。汉字中的“臭”原来有两个基本义项：一表示名词类的气味，一表示动词类的闻气味，都读同一个音。后来两个字的读音产生了分化，前者读 chòu，后者读 xiù，文字形式为了适应这个变化，表示后一义项的“臭”就添加口旁成“嗅”。汉字形声字中起表音作用的声符，在不能确切表音时也会发生变化，要求表音的声符跟实际读音相适应，如繁体字“線”原有表音的

声符“泉”已不符合实际语音，于是改写成了“戋”；繁体字“籲”的声符已难以辨认，于是简化为跟实际读音比较一致的“吁”。另一情况是继续保持文字与语言的不协调，各自维持原有的系统，同时相互达到兼容，于是人们可以直接从文字符号的能指（跳过文字的表音联结）与语言联结，这在用字母书写的表音文字系统中不明显，但在汉字方面反映较突出。例如不少汉字出现表达同一意义的同一个字符往往有不同读音，最典型的就是文白异读，血液的“血”读作 xuè，但是口语血晕的“血”和单用场合就读 xiě。此外，不同方言的人在读不充分的表音的汉字时，各自以自己的方音来读取却不会影响对文字符号所指意义的理解，也正因为这一点使汉字具有了超方言的力量，在方音繁杂、相互难以沟通的汉民族中，使它成为通用的表达符号和交际符号。

矛盾之二：所指与语义的脱节。文字符号固有的所指与语言的现有意义发生了脱节，这时语言就强迫文字丢弃固有的所指，文字符号一般说都有它固有的所指，从历史语言学或语言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文字符号固有所指的意义对研究古老语言的语源意义和文化意义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再现它原始对应的语言内容。例如英文 pen 来自于拉丁文 penna，本来的所指是羽毛，暗示西方社会早期古印欧民族的书写工具是鹅毛笔。但现代英语早已丢失了它的本义，显然人们只管它指钢笔而不必去探究它与羽毛的关系。汉字中此类情况更多，几乎每个表意的字符都有它的来源，都能展示它的文化发展史。但事实上它们在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表意功能，丢失了原来所指的文化价值，变成了孤立表示声音的符号。例如字符“其”本来是簸箕的象形，字符“来”本来是麦子的象形，字符“止”本来是脚趾的象形，但是它们早已跟对应的客体事象失去了联系，变成纯粹孤立地表示声音的文字符号了。这说明人类社会中任何一种文字符号，尽管它们最初是象形的或表意的，在指称语言过程中它最终注定了要成为语音的符号。

矛盾之三：书面语与口语的脱节。文字符号不仅仅记录现有的语言，也记录历史上存在过的语言；文字不仅仅在线性上展开语言，还在整体上包装语言，于是出现书面语完全与口头语言脱节的局面。事实是，文字记录历史语言的部分虽然与现实语言已经脱节，但是由于口语中不说的许多词语（古词语、典雅语等）在书面语继续保留着历史面貌，具有很强生命力。这一事实，一方面促进了语言中凝固性组合的积累。也就是说，文字包装过的语言虽然与现实语言发生脱节的现象，而且书面语大多场合已不能直接转化为口语，但是它们所蕴涵的古老文化和特定信息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汉语许多成语或地名、人名中的字符仍然保留古读，例如“奇货待贾”中的“贾”不读 jiǎ 而要读 gǔ，广东省番禺市的“番”不读 fān 而要读 pān，姓氏“单”除读 dān 外还有读 shàn 的等。特别是一些古词语，因其优美典雅而推动了人们对语言的锤炼和整理，使书面语比口语更具有典型性和规范性，从而反过来也

推动了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字包装过的语言造成与现实语言的脱节，书面语在大多数场合不能直接转化为口语，这样书面语远离口语，往往造成阅读障碍而随之造成思维的障碍、大众传播的障碍。当一个符号系统不能被另一个符号系统所吸收和转换时，那么它就会失去传播功能，就会出现被淘汰的可能。因此符号的自身运动就自然而然地提出“革命”的要求：求同和规范、普及和约束。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出现的白话文运动，就是为了解决书面语与口头语言严重脱节的矛盾，而进行的一场革命。



第 3 章　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3.1　符号的类型

传播学的符号与语言学原型一样，也由形式（能指）和内容（所指）组成。但是传播符号学中符号的表现形式要比语言符号丰富和复杂得多，根据不同的使用范围，通常建立起性质不同的符号系统，比如在交通信号中有独立的系统，各个街口红绿黄三色灯光是有关通行的命令符号；各种路标是给车辆和行人行走的指令符号。比如五线谱中“蝌蚪”音符的各个样式和所处位置是给演奏者的提示符号；建筑物门口的标牌是显示建筑物使用性质的各种告知符号。但是不管哪一种符号系统，它们在意指层面上与语言学符号原理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实体层面上又与语言学符号有分别。而且我们发现不管哪一种符号都与人们心中已知的“类”认识有关，否则人们便无法在心理再现它。这一点，非语言类的传播符号要远比语言符号的通用度强得多。例如图 3-1 中的图示符号，几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能读懂它们。



① 不准停车；② 残疾人通道；③ 禁止吸烟；④ 男女性别；⑤ 播放器功能键盘

图 3-1

但是非语言的传播符号尽管也有社会的一定规约，还是常常会出现误读的可能，如果识读者没有经验的心理印迹的话。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学生记忆一个“无意义图像”（见图 3-2），结果一些学生根据记忆把它画成了“鹤嘴锄”，另一些学生把它看作了船舶用的“锚”。只有一个学生能准确记忆画出这个形状，并且他给自己的画取名为“史前战斧”。显然大多数学生没有能直接领会老师的意图，都是按着自己熟悉的分类训练给接触的事物展开符号性联想。那个画得比较准确的学生也许恰好发觉给出的图画与自己所熟悉的某个图式相合罢了。这一实验说明：心中缺乏预先存在的类目，就会产生对符号理解的歪曲。所以实际上非语言形式传播符号的分类，意味着符号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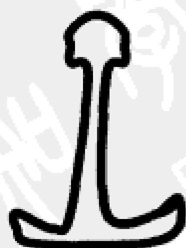


图 3-2

用者心理上的“类”的再认识[1]。

老师给出的图像作为视觉符号的意义是多元分歧的，它只有在唤起受播者心理预先准备的知识，才能找到图像符号的意义定位。一般说，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总伴随有一串浮动的意义隐藏在背后，受播者会选择其中一些而忽略另一些。所谓“浮动的意义”，是指传播符号特别是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存在的某种不确定性。因为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像语言符号那样具有全社会的约定规则，而且不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它们往往是一种行业约定，或者是受传双方的特别约定，或者是随着传播需要而出现的临时约定，所以作为能指和所指间的中介项意指很难被理性地确认，不能成为所有受播者的共识[2]从人类认知的角度考察，一个传播符号总是通过一种特定形式来进行表达，并通过一种规约的意义来传递内容。形式（能指）和意义（所指）之间的关系，一般都是符号创建之初就被规定的，所以通常不必特意加以阐释。但是相当一部分符号，尤其是艺术传播符号，作者的创新性思维不断给符号灌注创新的信息，如果没有“意指”介入助释，受播者是很难将形式与内容即能指与所指进行直接联结，那么他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通过经验在个体心理形成的客体事象的印迹来实现联结，从而发现意义或赋予意义。正是受播者基于经验的心理印迹才有可能使符号在多义分歧的“浮动的意义”得到确认。传播行为的大多数场合，由语言符号来充当助释，语言符号成为非语言形式传播符号的意指项。如果没有语言符号的意指提示，受播者只能通过心理印迹在众多可能联结的“浮动的意义”中选择那些通常是自己最熟悉的或早先接触过的，归入受播者心理印迹上足以定位的“类”。为了排除传播符号意义不确定性带来的某种困惑，语言文字符号起着固定那些“浮动的意义”的作用。

前面说到的那位给图像比较准确定位的学生，正是利用了文字符号的这种功能，给了图像以“史前战斧”的命名，从而凸显其原始特征和文物价值，使“浮动的意义”变得确定。任何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通过语言符号的文字命名，都能准确删除某些无价值的“浮动意义”，引导你趋向另一些有价值的“浮动意义”，使“浮动的意义”变得确定，显示符号应有的传播功能和应用范围。由此可见，非语言传播符号虽然通用度比较强，它具有跨民族、超文化的特点，但是它造成了“浮动的意义”，成为人们接受符号的拦路虎。不过另一方面，这种“浮动的意义”却又给传播者提供了丰富想象的空间和创造性思维的空间，与此同时也给受播者提供了接收符号“为我所用”的机会。特别是艺术符号的传播，有时出现受播者对艺术符号的助释超越传播者意义寄托的初衷，成为艺术符号的再创造。

---

① ［英］E. H.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

② ［英］E. H.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M］.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第二节.

不言而喻，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是一切传播符号实现传播的基础。语言符号可以分为有声符号和无声符号，有声符号包括言语和言语的载体——文字，无声符号主要是手势语、旗语等。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则比较丰富多样。按其传播功能和应用范围区别可以划分为生产性符号、生活性符号、科学技术符号、社会公共符号、文化艺术符号等；按其表达实体的物质形态区别可以划分为物品符号、手势符号、图像符号、声音符号、线条符号、颜色符号等。非语言形式传播符号的实体形式与符号的应用范围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无必然联系。例如音乐是以声音作为物质实体的符号系统，美术是以图像作为物质实体的符号系统，符号的类型与其所表达的系统有某种特定的联系。但是，社会公共场所使用的公众服务性符号则是一种综合类型，有线条型，也有图像型和文字型；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符号一般采取多种类型，有实物型的标本符号，有线条型的运算符号，有图像型的区别性符号，有文字型的表述符号等，选用的符号类型与所指系统无本质的必然联系。

不论何种符号类型，都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它包含着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二重成分：可感知的符号形式和可分析的符号内容。符号形式的能指和符号内容的所指是人们设法指称世界的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实体和意义，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于传播符号之中。人们从具有双重性格的符号中感知到的是能指的形式，理解的则是符号的内容，形式与内容的凝固结合是一种社会约定和由心理印迹决定的认知约定。在你没有熟悉和了解这种约定并在心理形成一种特定印迹时，你便无法掌控这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对于你将只是没有意义的实体。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符号中作为形式的实体并不表示实体本身，符号中作为内容的意义也不是意义直接指向的事物，而是事物的概念。这就是传播符号的又一层二重性。

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在言语符号的传播活动中，当我们听到 yú（鱼）这个声音时，我们感知的是非功能性的、发音的声音实体，但作为符号形式它已经不再仅仅表示这个声音实体，而是表示“鱼”；然而这个“鱼”又不是指游动于江河的某一条具体的鱼，而是指称被高度抽象的概念形态的“鱼”，是人们心理中存在的某一个“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接触到的是一条条真实的鱼，而作为符号形式出现的 yú（鱼）则根本看不到，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心理上，是一个经过打包加工后高度抽象状态的概念鱼。但正是这个概念鱼作为传播符号进入传播活动，便构成了特定的意义。例如每逢新年，中国人常常在宴席上放一条鱼，当它仅仅作为宴席上的食物时，这条具体形象的鱼具有果腹下饭的作用，人们关注的只是它的实体功能。但是，作为民俗习惯的符号化食物，这条鱼被赋予了意义，成为非语言形式的实物性传播符号——它通过人们的心理声响与追求富裕的愿望联系起来，产生特殊的意义。于是人们在酒足饭饱之余，终于能满意地看到宴席上仍然完整地摆放着那条被赋予了意义的“鱼”——吃剩有鱼（谐声“余”：剩余）！实体的符号化功能

经过语言符号的谐声联想，使实体的使用功能转化为指称功能，具有了特定的意义。宴席上实体事物“鱼”被符号化，它的食物功能完全被忽视，只有它的谐声符号 yú 在发挥传播功能。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传播符号的能指层面构成表达层，宴席上的“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表达符号，其表达的内容“余”隐含在所指层面里。表达层又有两个层面：实体（鱼）和形式（放在宴席上）。内容层也有两个层面：实体（余）和形式（跟吃的动作组合）。

能指层面表达的实体，指所有那些不借助于语言之外的前提就不能被描述的语言现象。比如要表达一个语言单位“火”，我们也许可以用语言进行表述：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焰，或是枪炮弹药，或是中医学上的热病症状，或是象征急躁、紧急，或是比喻红色……事实上即使用语言，仍然难以充分表达它的全部蕴涵。于是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能指的实体——声音实体或线条实体。huo 和“火”，便是声音实体和线条实体的形式。即使在运动会上传递的火把，熊熊燃烧的火一旦成为符号，也立即进入语言系统——实体性事物的语符化。不能被语言表述和描写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充当符号实体。所以能指层面表达的形式可定义为：无需借助任何语言之外的前提便可被语言学加以简明而详尽描述的东西。

同样，内容层也有两个层面：实体和形式。所指层面内容的实体，是所指在情感上、心理上、意识上或仅仅是概念上的形态，它与客观事物的实体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却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和概括，是概念的内涵。内容的形式，则是所指在符号系统内部按语义标记进行的分类、组合及其存在方式，相对于所指事物则指称概念的外延。例如前举的实体存在或非实体存在的符号化的“火”，其所指内容的实体假定为“红”，这个“红”不是实体存在的红色（火把有“红”的意义蕴涵但不是真正的红色），也不表示这个声音或文字符号是红色的（声音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也并非把字写成红色），它只跟使用者情感、心理、意识有关，并与红的概念发生联系。“火”所蕴涵的“红”，只有在进入符号系统的一定方式的组合时才显示出内容层面的实体意义形式，比如“火鸡”、“火腿”中的“火”就是所指内容的存在形式。

传播符号的两个层面的下位组成是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又各自分别包含着两个互为依存的层面，即实体和形式。能指的实体包括语言符号的声音实体和非语言符号的其他物质实体，所有物质性实体都有一定的存在形式；所指的实体包括概念和意义，概念通常以词语的形式来体现，任何意义都有它特定组合中的存在形式。由于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如同哲学概念上的内容和形式一样，互为表里，共成一体，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但是为了更加便于理解，我们不妨试着就以指称红色的“火”为例，将传播符号的各个层面逐一分解，用图表方式显示如图 3-3。当然这种分解具有很强的人为意识，

它并不代表传播符号的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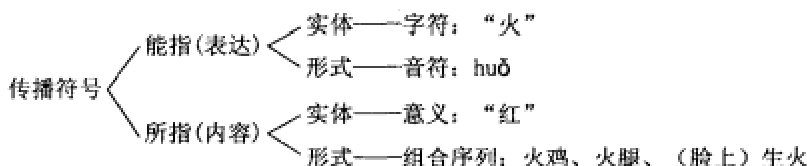


图 3-3

在传播符号系统中，我们确实很难在语言符号系统中将所指和能指彻底分开，也很难把握对内容和形式进行再切分，但是在我们分析非语言的传播符号时，这种再切分是十分有用的。在相对依赖物质载体的传播活动中，比如分析现代舞蹈、欣赏交响音乐等表现性艺术的复杂符号时，在分析出土的陶器、欣赏敦煌的壁画等再现性历史艺术时，必须把实体的符号与符号的实体分开，必须把从物质化要素中获得的艺术感悟与构成艺术机制的物质基础作不同的处理，必须把艺术的心理形象和艺术的实体形象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这就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各自的实体和形式方面再切分的要求。

不同类型的传播符号，虽然表达层面的实体和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切分原理是共通的。然而现实传播中将传播符号的实体和形式妄加切分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新型的综合性符号传播——电视广告传播。本来电视广告传播——文字符号传播与平面符号传播相结合的形式，它通过视听系统，形成多维传播，完全有可能在传承性文字传播和平面性形象传播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具有市场引导性的精彩创意。但是由于传播者没有真正把握传播符号综合运用的类型特征，出现了违背传播符号学原理的谬误。一是忽视了电视广告在传播过程中的符号化特征。"符号必须具有能被人类感知的性质……通过某种其他方式可以比画、可以再现。"①而现在许多电视广告的传播将它的言语、声音和图像符号当成了电视节目的一部分，使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不自觉地把广告也当作节目的一部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传播符号产生混杂，于是无法比画，也无法再现，造成受播者不知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看广告。二是许多电视广告连篇累牍地念叨广告词，造成中介的意指完全取代非语言形式的广告符号的传播效应，本来广告词只是广告符号的意指提示，结果喧宾夺主，简单的一维传播的自我夸张破坏了广告符号多维性传播的客观性。三是传播符号的形式"包装"掩盖了符号所传播的内容的真实性，"某些人直接把媒体当作自己的后花园，专注于策划跟炒作自己的知名度和与广告有关的新闻，或者直接把广告炒作成新闻，有些媒体有自己参与的企业，反复在自己的媒体上发

① 余志鸿.游戏——传播的游戏规则[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60.

软广告——以新闻的形式发布广告……”[①]这样便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传播符号。

3.2 能指的性质和划分

能指有一个突出的性质，即物质在于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它是传播符号系统中的中介体。能指的物质性，是由符号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为符号必须具有能被人类感知的性质，或者可以看得见，或者可以听得出，或者可以触摸得到，或通过某种其他方式可以比画、可以再现。为了准确理解能指的物质性，应该对传播符号能指的“实体”做具体分解，它包括“物质实体”和“形式实体”，两者应该有所区分。能指的“物质实体”就是指构成符号的具体物质材料或物质的运动状态，包括声音、动作、图像、物品等。能指的“形式实体”则是用作符号的物质实体的抽象形式和存在方式，例如前文所述宴席上的鱼（注意这是“宴席上的鱼”，而不是任何一条以其他方式存在的鱼）和鱼的概念性符号——鱼的有声语言符号 yú 及书写语言符号“鱼”。

承担符号能指的实体由各种不同形态的物质材料构成，在一个传播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同物质形态的符号的混合系统，但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按照能指实体的不同分成口语符号、书写符号、形象符号、物品符号和动作符号等几类典型的符号。假如我们要表示“树”，可以用现实世界里的本体植物树，可以用图片画一棵树，可以写一个汉字的“树”或拉丁文的 arbor，也可以用其他材料模拟树的样子或用文字序列描写树的形象，但是当它们作为传播符号出现时，我们接受的信息已经不是直观上的某一具体的树，或听读上感知的具体声音，符号所认定的联结抛开了我们所感觉到的一切（包括树的枝叶和所有外观的特征），而通向非物质性的、理性的概念。

能指还是一个中介体，它横亘在人与所指之间；所指始终是某种程度上以特定方式隐在能指的背后，人类只有通过能指才能通达所指。也就是说，人们总是从形式着手去掌握所指的内容的。然而一般说能指背后的意义是多元分歧的，是浮动的，不确定的。而且能指的中介不是一条直接联结所指的通道，我们常常要借助意指的阐释。“意指”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以具体形式出现，它凭借社会的公众约定或文化传承而得以成立。但由于不少传播符号都有内在的“浮动的意义”，使我们不得不在能指和所指的通道间设置一个“过滤器”。那么，语言和文字是非语言形式传播符号的最佳“过滤器”，它可以遏止意义的浮动，排除“浮动的意义”中的赘余信

① 金陵客.“新闻炒作”里面有些什么“学”[N].南方周末，2004-1-8(B14).

息，给受播者以一种“优先解读”的确切提示。

任何传播符号都有可能在内部存在多种解读，但任何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个天然的“优先解读”器，那就是任何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解读一般传播符号的经验性心理印迹，人们凭借它来识读各种符号。比如我们在公用的厕所标上特定的标志：烟斗或高跟鞋，短发头像或长发头像，西装革履的直立人或紧身短裙的直立人等，只要生活在文明社会环境里的人，一看便知何者为男性厕所，何者为女性厕所。这是社会文化传承性心理印迹形成的“优先解读”在助释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又如在公共场合的封闭空间标上一支香烟却又打上叉，人们便知这是告知不准抽烟；在交通要道的街口标上一辆汽车却打上叉，人们便知此路禁止汽车通行；在某类衣服内侧标上一只熨斗却也打上叉，人们便知此类衣服不能熨烫。如此等等，某一事物上打叉就含有“否定”的意义，这就是公众约定造成的心理印迹在帮助解读。大脑中对传播符号辨识的心理印迹就是内在的“优先解读”器，语言文字在传播符号系统中所特有的意指功能就是外在的“优先解读”器。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语言文字标注在传播符号系统中所具有的意指功能——独特的“优先解读”功能，说明文字符号在强化能指和所指间凝固意义的作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图 3-4 的一则绘画语言和书写语言结合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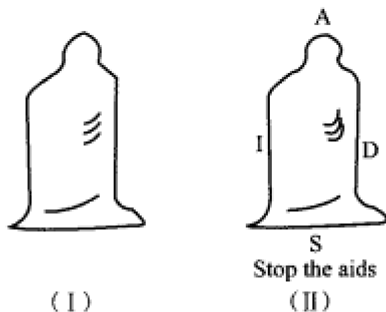


图 3-4

（Ⅰ）中没有文字标注的帮助，人们无法“优先解读”，因为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是多元分歧的，人们只能在“浮动的意义”中根据自己的经验心理进行揣摩，有人认为这是一顶高帽子或者是高翻的防寒过冬的罗宋帽，有人认为这是英国皇家礼仪帽，有人认为这是定制的立钟，有人认为这是一只特殊的玻璃罩，也有人假想这是恐怖分子制造的液体炸弹，等等，众说纷纭，总之解读的方向沿着受播者的心理经验和心理期待，进行种种换码测验。换码测验借助受播者内在的知识信息库和丰富想象力展开，不断换算，不断修正和重新评估。但是，（Ⅱ）的情况就不同了，凭借字符的意指功能进行助释，从而给这个广告符号有了心理定位，Aids 使避孕套这一形象凸显了出来，而离散分布在避孕套外侧的四个字母象征着艾滋病病毒被隔离，广告图片的符号意义也因此显现而转换符号编码为：“使用避孕套，防止艾滋病”。当然，语言文字的标注不是唯一的“优先解读”方法。（Ⅱ）所以能够实现传播价值，使能指跟潜在的所指得以联结，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20 世纪 50～60 年代艾滋病的发现和迅速播散蔓延，避孕套的重视和应用，成为（Ⅱ）“优先解读”的社会文化基础。

在没有语言文字的“优先解读”提示时，传播符号的能指和能指背后的所指意

义之间的联结一般说是多元多歧的，但是也并不是说因此传播符号的意义是不可预测不可解读的。传播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可能的情况：

1. 纵向蕴涵关系

当符号被明确表示为一种深层状态的纵向蕴涵关系，那么传播符号的结构式定义为 E/C 关系。即所指(C)隐在能指(E)的背后，能指(E)虽然并不能直接显示所指(C)的意义，但它们凝固在一起，犹如一张纸的两个面，它们无法剥离。这种符号的封闭性，只有对语言和文字这样纯粹的非连续系统才适用。每个语言文字符号，通常都有明确的所指。这种 E/C 关系的意义联结成为所有人运用语言传播或书写文字传播的前提，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现实世界的人，在他一出生时，语言符号已经存在，其能指(E)和所指(C)已经凝固地确立了社会的约定关系，形成了 E/C 这种纵向蕴涵的密切关系。在全社会约定下，大量现成的符号群有着明确而固定的意义联结，并且有着一整套任何人不能去改动或推翻它的严格的符号操作规则。但是语言和文字的符号系统一般说不可能自动获得，即使蒙童牙牙学语是在现成的语言环境里自然习得，但事实仍然有一个潜在的传授和学习过程。因此语言传播的符号是依靠传承建立起来的。

在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系统里，往往并非如此。因为在物质传播或文化传播中，符号的多功能形态和多内容分布完全打破能指(E)与所指(C)之间像语言文字符号这种固定对应的关系。当然非语言传播的符号也需要传授和学习，但相当一部分却需要传播者去创造，需要受传者从经验中探求。刚学开车的人都必须进行专门的交通符号辨认训练，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不知道路口红绿灯的符号意义而往往会乱穿马路。以前有个笑话，说一个刚从乡下到城市探亲的农民，亲戚事先告诫他说见到红灯别乱走。那天，他到城市已是深夜，路上他远远看到有一盏红灯亮着，他记起亲戚的告诫，于是他只得停住。结果他在街头站了一个通宵，直至天亮那盏红灯关闭为止才起步赶往亲戚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亲戚，他的亲戚哗然大笑他的愚傻。告诉他说："哎呀，那可是报警灯呀，表示有红灯的地方是警所！"其实这不是那个农民傻，而是因为他还没有掌握传播符号多义的性质，没有学会从传播符号的存在方式和传播范围去判别该符号的所指意义罢了。

2. 非同构等值关系

有时能指与所指具有某种非同构性，这样便出现"E ≡ C"的情况。也就是说，表达层面的能指(E)与内容层面的所指(C)共处于一种游离的关系中，它们分别由一条多层的隐喻链链接组成。例如小说《阿 Q 正传》里有个"小 D"，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注释："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 Q 一样。"这样，小说人物符号的能指"阿 D"与所指"小同"构成同义异构关系，它们又共同象征旧中国国民的灵魂。我们把

能指形式的“小D”设定为A，把“小同”设定为B，把“阿Q”的所指意义“旧中国国民的灵魂”设定为C，那么用符号公式可以表述如下：（设R表示能指和所指间的蕴涵关系，∧表示共存、并且）

$$ARC$$

$$BRC$$

$$ARC \wedge BRC \rightarrow A \equiv B$$

再以前引的避孕套广告图片为例。避孕套图画符号和AIDS文字符号相结合：文字“AIDS”不仅作为对图片的“优先解读”出现，而且进入图片：四个字母分散失序地布列在避孕套之外围，它们就像艾滋病毒般被阻隔在避孕套之外一样，使人们避免了可怕的艾滋病灾难。这样，“避孕套”（A）与“失序的AIDS”（B）形成了非同构的符号，但是符号背后的所指意义却具有等值关系：防止“艾滋病（C）”。用符号公式描写如下：

$$AR(-C) \wedge BR(-C) \rightarrow A \equiv B$$

公式中（－C）表示“非艾滋病”，即防止艾滋病。

3. 内在蕴涵关系

有时能指与所指具有某种内在的关系，这样便出现“ERC”情况。也就是说当出现若干个具有传递性的符号系统时，如果第一系统中的符号构成了第二系统中的能指，于是能指带着第一系统中获得的意义进入第二系统，它成为第二系统所指的内涵的一部分；或者相反，第一系统中的符号构成第二系统中的所指。在语言学符号系统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语言符号能指E在第一系统里具有所指的意义A，当它进入第二系统时与所指C发生联结，其原先获得的意义A转化为所指C的内涵的一部分，于是构成如下关系：

$$(E\ RA \wedge CRA) \rightarrow E\ R\ C$$

这种情况在语言和文字符号里更为普遍。例如汉字字符“青”是一个线条性实体构成的能指，其意指在颜色符号系统里表示青色，包括黑色（如指妇女的一缕青丝）、蓝色（如指晴空的青天在上）和绿色（如指园林绿地的一片青草），除此以外，还含有“纯澈、美好”等人文意义（A）。具有所指意义的“青”在另一类意义的符号系统里，它作为能指形式（E）出现在文字符号系列的所指（C）如“鲭、清、晴、情、精、睛、靖、菁、婧、靓”等符号中，这些字符都具有共同的“青”意义内涵（A）。这样，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简单的任意关系，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具有了共同的理据性意义关系。这一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为“同源字”关系，在传播符号学上称为“内在蕴涵”关系。

为了有助于对传播符号系统的分析和处理，有必要从传播符号系统的结构化角度给能指进行划分。能指的划分主要基于切分的需要，因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

形成的是一个系列的传播符号链，我们只有把表达层面上发送的、由全部信息构成的混沌、模糊的信息分割为最小的意义单位；再将这些单位联结过程中的组合关系进行分类，并划分为聚合等级。传播符号的实体形式按着线条性或平面性分布展开，它们只能一个挨一个地排列。传播符号的这种非连续性特点，使它们只能逐个地进行组合。符号的组合与单个符号内部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很不相同的，它们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条件的；它们不是像传播符号内部的约定或理据那样来实现，而是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达成。所以传播符号的组合是可以论证和解释的，可以从它们的组合中了解组合的条件和规律。传播符号的排列随着表达的需要会发生各种变化，根据排列的情况，符号进行有序的组合。有的先组合，有的后组合；有的组合以后进行再组合，有的组合成为为新符号准备了形式的部分。这样，符号组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层级装置。

以语言符号系统为例，它是一种线条性的组合。言语可以定义为符号的排列组合（允许符号重复出现），口语中的句子就是典型的组合。我们按照语言符号的能指（语音）的性质，可以划分到最小单位：音位。我们不说“音素”，因为音素是一个按照音色切分出来的物理单位，它没有装入“意义”，所以不属于语言符号。但是，音位也仅仅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本身不具有意义，它只是语言的底层。一种语言的音位数目是有限的，但却能构成众多的具有意义的组合，从而为语言符号准备了形式部分。语言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符号的序列。当符号的能指装入“意义”时音位组合跃迁到上层，成为语言的第一层级符号——语素。第二级是语素组合成的词，第三级是词组合成的句子，句子进入语言的传播范畴。音素→音位⇨语素→词或短语⇨句子，这就是语言符号能指层面的层级装置。

以绘画符号系统而言，它则是一种平面方式的组合。绘画符号必须依托于另一平面系统的物质符号（如纸、布帛、木版、墙面等）而存在。但就绘画本身而言，其基本要素是点和线条，以及色彩和块面，它们便是绘画符号的最小能指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画素”。它们相当于语言符号底层的音位。画素组合成为具有画家构思即意义寄托的“画形”时，形成绘画的第一层级符号，相当于语言符号组合中的词或短语；然后画形再组合成“画面”，这是绘画的第二层级符号，相当于语言组合序列的句子。画面与绘画的其他要素（诸如笔触、颜色、布局、意境等符号）进行组合，才达到第三层级——完成“作品”，相当于语言组合序列的篇章。绘画在能指层面的层级装置：画素→画形⇨画面⇨绘画作品，最后进入传播范畴，绘画符号在传播中实现全部价值。我们把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的关系，称为组合关系。符号的组合关系都是有条件的。

我们可以把传播符号的集合制定一个坐标，横向线性的毗邻轴和纵向可替换的类属轴。传播符号沿着线性毗邻轴进行二元联结，称为组合关系。传播符号沿

着类属轴进行替换，称为聚合关系。首先，我们要寻找出毗邻轴和类属轴交接的各个位置的显著特点和属性，由此发现组合的条件。然后，再考虑符号系统的各个层级，在组合条件和组合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毗邻轴上的单个传播符号进行替换，这种替换必须不改变整个毗邻轴的意义。我们凡是可替换而不改变组合规则的所有符号构成一个相同功能的集合，或叫聚合集。经过替换后的，呈现新的组合，构成新的意义链（或意义体）。传播行为中的所有符号都处于毗邻轴和类属轴的某个节点上，每个符号都必然具有二重关系，都具有组合和聚合的双重特征：既可以跟别的传播符号组合，又可以被别的传播符号替换。在一定组合关系中所有能够替换某一位置符号的符号，形成一个集，在功能上应该具有某种相同的功能，所以聚合集又可称之为功能集。处于同一聚合的符号都属于相同类属、相同功能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元素既能扩展形成新符号，也能与别的符号元素组合形成高一级符号单位。

聚合也有层级，也有规则。比如“红”和“花”是两个处于不同“集”的符号，它们能组合成新符号“红花”和“花红”。“红花”和“花红”虽然内部字符相同，但组合的序列不同，组合中的关系就不同，整个组合的性质也不同，构成的符号所指也完全不同。当“红”和“花”进入新的组合单位时，它们就离开确定的分布地位，不再属于原来的“集”，也不再具有可替换性质。在高一级的语言符号组合序列里，如“我吃饭”，这是跟“红花”或“花红”完全不同性质的一种组合，符号“我”和“饭”都可以分别被其他同功能的类属符号替换，形成新的符号组合序列，例如“他吃肉”、“小王吃鱼”或“老虎吃人”等。在毗邻轴上进行线性组合的各个传播符号分别属于同功能的“集”。语言学把同功能的“集”叫词类。上引线性序列中属于动词类的“吃”也能被替换，如替换成“买”或“怕”，那么也能形成新的符号序列“他买肉”、“他买鱼”，或“他怕肉”、“他怕鱼”、“老虎怕人”等，但是却不能说“老虎买人”！这是为什么呢？很值得深思。原来每个“集”内的符号还有不同的组合要求，也有层级配置。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传播符号的各个层级进行细分，以充分揭示符号的内部规则。内部规则通常是由传播符号的所指来决定的，即聚合集的替换必须符合组合关系的某些条件如意义规则。比如我们把“吃”和“买”作为两个动词功能集下的支集来处理，各个支集虽然处在整个功能“集”的下位，但是由于其所指确认的意义不同，具体功能也就不相同，例如“吃”的组合要求是：生物体，食物；“买”的组合要求是：人，商品。不能进行“老虎买人”这样的组合，道理便不说自明了。

能出现在符号序列相同位置上的符号，构成聚合关系。平面序列的绘画符号也一样，组合类和聚合类的内部都存在着由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自身特征的制约——意义规则。例如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画龙点睛”和“画蛇添足”，就很形象地说明了绘画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以及它们内部意义规则的制约因素。

符号“点”在毗邻轴和类属轴的节点上，准确进入替换角色，于是发挥符合意义规则的组合功能，才呈现出“睛”的传播价值，使“作品”中的龙栩栩如生，腾飞而起；相反，蛇的“足”在毗邻轴和类属轴的节点上，违背了组合关系的意义规则，在“画面”中替换了不该替换的部位，终于成为败笔。

3.3　所指的性质和划分

一张纸有两个面，谁也不可能把其中的一个面剥离开来。能指和所指，就好比一张纸的两个面。能指的背后一面是所指，能指的关键在于“实体性”，所指的关键在于“现实性”。能指必须以某种物质材料为依托，前文把它的实体性已经说清楚了。所指的“现实性”主要指它代表的始终是现实世界中的某一存在物，但是它又不是直接指向现实世界中的某一具体事物，而是指向该“事物”的全部和存在于人脑中的心理再现。语言符号“牛”的所指并非实指牛这个动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它在人们心中形成的概念——心理形象。有意思的是一个传播符号孤立存在时，其所指是十分模糊的，甚至是难以表述的，它只有在进入符号序列时才变得清晰可辨，才有明确的意义。因为我们能感知和接触到的乃是能指形态的物质实体，它本身无意义可言，它背后的意义也较难捉摸。例如我们听到一个音 lù，我们作为听话人不能确定它是行走的“路”还是动物“鹿”，或者是自然现象“露”还是飞鸟“鹭”等，当然说话人应该是明白无误的。所以所指的定义不妨这样写：所指是符号使用者通过符号所指的心中的“某物”。

在传播符号学中，情况并无根本不同。用作传播活动的实物、图像、动作等等，只要在表意，就指称着“某种东西”，而这个“某种东西”只有通过它们（被用作符号的实物、图像、动作等等）才可被言说。只不过传播符号学的所指更多用语言符号来承担意指，来进行解释或助释。几乎可以这么说，不能被言说的任何形式就不是传播符号，同理不能被言说的任何符号就不能传播。例如，中秋节电视上播放一个画面，出现一盒“金帝巧克力”而不是按中秋节的传统风俗出现常规的月饼，作为广告传播的符号其意指很明白，它是在推销，希望人们能购买它。这时，人们无法从广告画面上精致包装的巧克力盒这一能指直接进行解读，难以获得广告传播所指的信息。也就是说广告传播的能指不能以中介项身份来显示所指的意义。因此广告又用一个言语片段插入，作为广告传播的中介：（画面外的声音）噢！今年我要换口味。由语言符号承当传播符号能指背后所指项的中介——意指，这是人类传播行为的基本特点。动物没有语言，所以动物的传播活动没有“意义”成分，只是本能的驱动。用语言符号来阐释一切非语言的传播符号，这就使语言以这种不易察觉、不可分离的方式将能指和所指“粘贴”在一起。语言符号起着揭示非语言传播符号

内蕴的作用，内蕴意义固定或冻结了所指意义的多样性。内蕴意义并不显现在符号的表层，符号中介的语言所承担的意指功能，也不是直白地对能指和所指进行解释。所以符号学家巴尔特说，符号的内蕴意义是一种隐喻，传播符号的意指总是隐蕴的，含蓄的，暗示性的。巧克力广告的时间域是“今年”、“中秋”，其背景信息是中秋吃月饼的风俗，通过语言符号的意指提示是“换口味”，从而暗示广大受众“今年中秋”不妨“换”个国家传统节日的风俗，不吃月饼“换”吃巧克力！

所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介，是能指与客观事象的中介。能指的符号形式到所指的意义内容，是意指充当中介；能指的符号形式到符号指称的客体事象，是所指充当中介。所指的概念意义到客体事象，也有个中介，那就是存在于人们大脑的心理印迹。而意指作为符号的隐含意义以独特的符号方式出现，当它指向客体事象时，又以所指的内容为中介。试以图 3-5 标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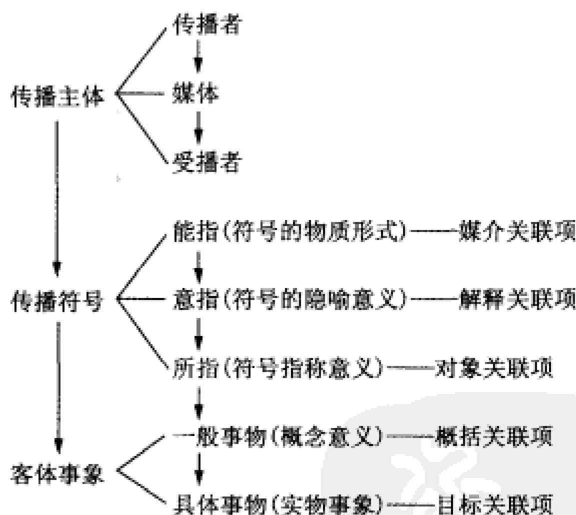


图 3-5

传播符号的使用者是人——传播者和受播者，传播符号是人与客体事象的中介，在表象上其中介是由传播符号的能指承担的。从图表我们发现符号的各个层级都是互为形式、互为内容、互为补充、互为中介的。传播符号的所指既是意指到概念的中介，又是能指到客体事象的中介。既然是中介，也就必然有“形式”，从所指的内容中提取“形式”就是对所指的一种划分。语言符号学根据所指的划分曾试图建立起义素分析法，如把“父亲”分解成若干个更小的意义单位：[＋人]＋[＋男性]＋[＋直系]＋[＋长辈]。这里首先设想所有所指的蕴涵都有两项可对比替换的特征，如果是“女儿”就描写为：[＋人]＋[－男性]＋[＋直系]＋[－长辈]。这是语言学家利用已有的语言符号改制成的一种“元语言”，是用来描写语言符号所指的一套符号。其中用 ＋和－ 的符号来代表所指内容的两项可对比特征，这一做

法大大节省了许多其他符号的使用和冗赘的文字说明。比如：

“单身汉”——[＋人]＋[＋男性]＋[＋成年]＋[－婚姻]

“叔叔”——[＋男性]＋[－直系]＋[＋长辈]＋[＋父系]

[ ]内表示的是所指的最小意义单位——义素，后一个义素划分都以前一个义素划分为前提。由于我们无法把具有开放性的义素给出一个定量的规定，因此对语言符号的所指所进行的理想化划分的下限，就无法控制。故而至今没有人能将此项研究坚持下去，结构语言学仍然未能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化的语义学。于是一般的语义划分不得不借助于已知的概念涵义去进行，至于传播符号学范畴的所指的划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还不能提出有效的方法和规则。但是，这并不是说传播符号学在所指领域方面的分析无能为力，至少有几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点，在传播符号系统里，语言文字符号始终起着使意义有所限定和导向的作用。传播符号“所指”的意义分析与“所指”的实现方式有关。传播符号在传播流里，有的非语言传播和语言传播同现，两者形成同构的方式，也可能以不同构的方式出现。例如一幅乡村画：有高大银杏，郁郁葱葱；又有小桥流水，淙淙潺潺；有水天一色，日清倒影的青水碧湖，又有夕阳映照，古朴典雅的明清古屋。一条清幽的乡间小路，穿越金灿灿的稻田；还有那落日余晖，袅袅炊烟……浓郁的民俗尽显其中。标题是“乡间小路”。因为“作品”的能指与语言符号表达的所指“粘贴”在一起，形成“同构”现象，那么我们能根据语言符号的所指(包括“言内意外”的所指部分)再现“作品”的意义(只要它没有其他特别隐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指除其典型能指(充满诗意和蕴涵的乡村画)外别无其他物化形式可以帮助解释，因而我们必须通过元语言强加的方式去掌握它，即用语言符号去阐释唯一的物化符号“作品”。在这幅作为物化传播的图画符号里出现的文字符号，已经不再是语言表述系统中的一个短语或句子，而转化为具有意指功能的“中介项”，它在提示我们：立足于受播者拥有的空间，踏上画面能指提供的通道——“小路”，穿过画面能指展示的空间——“乡间”，将通达另一个在能指层面没有出现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正是所指蕴涵的“意义”。文字符号意指的“优先解读”给了受众深刻的心理导向，于是转而注释画面能指背后的所指：远离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城市，走向古朴、清幽的自然美。这就是图画所指的意义。

但是，另一种情况，在非同构系统中，非语言传播的能指不一定同语言所指一样被同步传播。假如能指仍是一个非语言传播的乡间图画，而所指却是由一个词“周末”或一个词组“假日旅游”来承当，画面能提供的空间概念跟文字符号提供的时间概念不具有同构性，那么，传播符号所指的意义就变得模糊和浮动，如果受播者不将元语言强加给它们，就显然会陷入一个用语言阐释语言的自我循环中，出现

"同语反复"的无意义行为，传播符号顿时陷入无从解读的困境。更为复杂情况，如"时装"广告的所指，即使其意义以报纸言语的所指作为意指性中介，也不一定能准确传送，我们也许非得将"时装"进行元语言分解不可，从它本身的符号系统包括功能、价值、配列和相应的组合成分做整体分析，才能切入非语言形式的传播符号——"时装"的语义所指。

随着媒介的发展，图像的制作日益精美、便捷，图像在传播文本中越来越占据重要位置。于是，许多学者宣称：当今社会是一个"读图时代"，认为社会正进入"图画文明"，媒介在发生"视觉转型"。这是比较片面的观点，罗兰·巴尔特早就指出："图像文明的说法不太准确不太精确——我们的文字文明依然如故并且甚于过去，文字和言语继续是完全意义上的信息结构。"①他用"锚"来比喻图片说明里的文字功能，"锚"就是用来限定视觉图像在所指意义上的多元分歧可能性，以"解除符号的不确定的疑惧"。符号之船在传播之海漂泊泛荡，靠着语言之"锚"得以定位停泊。传播符号系统中的语言文字直接告诉我们非语言形式传播中的意义是什么，既"限定"视觉图像的多义性，又"导向"受众在自己的经验范围里为图像符号正确定位。语言文字符号介入非语言形式传播的最简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给予命名，命名其实就在删除某些意义，而引导观者趋向另一些意义。不管现代社会的传播样式如何的多姿多彩，它最终都受到文字的限定和导向，语言和文字的传播是第一位的，其他形式的传播都受其制约，因此是第二位。

第二点，所指的意义分析与传播符号学所指的延伸范围有关。通常一个被形式化后的系统，其全部所指会构成一个重要功能；而在传播该系统全部所指的功能时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将在可能范围内与其他系统产生交流和渗透，还会部分地相互包容。这样，我们有必要在传播符号学范围内，对符号的全部所指进行共时联结和比较。所谓共时联结和比较，就是将对象系统的所指所涉及的延伸范围与类型上相关的其他系统进行联结，例如"服装"的形式化符号系统与"膳食"的形式化符号系统联结，发现"服装"和"膳食"在工作和节日、上班和休闲、享受和自足、礼仪和生活的截然对立上得以联结。因为"服装"和"膳食"不仅仅作为日常生活的简单需要出现时，就被赋予了文化意义，也被物化为文化符号。"服装"和"膳食"以其独立的存在方式和适用范围进行组合和替换，各自构成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系列，因而可以在所指的原意外考虑一个完全的意识形态的比较和描写。进一步我们就发现，传播符号从文化含义方面的联结，适用于共时平面上的所有系统。传播符号由此生成的文化含义使无论何种形式的传播，在传受双方都能从所指的共时联结中获得最成功的心理效应。

---

① 罗兰·巴尔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8-224.

因此，一般地说，符号设计者优先考虑的就是如何使传播符号具有广泛的联结功能，也就是普遍性。从本质上认定，任何符号，不管它以什么方式存在，不管它适用于何种领域，不管它表达的意义如何专门化，不管它具有哪类功能，都是通过传播来实现符号价值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符号都可称为传播符号。即使少数作家、艺术家，制作一些“孤芳自赏”的符号作品，虽然不进入大众传播的范围，但仍然是一种传播，一种独特形式的自我传播，所以依旧归属于传播符号。凡是传播符号都有所指意义的分析，都要考察它的延伸范围。如果说哲学思考的深度模式是“现象—本质”，那么传播符号学则把这一模式转型为“能指—所指”，所以传播学里的“所指”不仅仅是能指的深层内涵，而且有着揭示客体事象本质属性及其延伸范围的任务。所指的意义分析和延伸范围也许可以跟逻辑学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相比拟，但所指跟能指的联结是多元，需要依靠受众的约定和心理效应来认定，不像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那样具有纯客观的必然性。符号学家莫里斯继皮尔士符号三元之后，补充了解释者和关联域，他对符号过程作了这样的描述[①]：指号过程被看作是五项关系——V(指号)、W(解释者)、X(解释)、Y(意谓)、Z(关联域)。V在某种条件之下，在W中造成以某种方式X对某种对象Y作出反应的倾向。在莫里斯的符号理论里，V相当于能指，Y相当于所指，X是意指，W是有传受双方构成的传播过程，Z是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点，我们必须承认每个能指系统在所指层面上都有一个历史积淀和社会约定。任何能指在所指层面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历史的实践和技术的结合体，即一方面是传播符号在应用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所指的内容，使原来比较模糊的意义变得日益清晰；另一方面是传播符号经过技术操作和处理，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越来越可以检验。因为这种随着历史过程而形成的结合，又经过传播和接受双方共同约定，对系统的消费者(或者说接受者、购买者、读者、欣赏者)而言，将有利于对所指的解读。从语言符号的全部所指来说，每个符号几乎都是历史的产物，所指的历史蕴涵往往超过所指的自身意义。比如“梅、竹、松”三个语言符号，其所指的现实事象——三种耐寒植物——是再明确不过了，各自的隐含意义也大致可以分析，但它们的历史文化蕴涵则非常丰实，非一言一语所能概括。若三者作为一组聚合，在各自的组合关系中呈现的所指内容，那就更深刻了。例如“竹”在成语“胸有成竹”和“竹报平安”里已经不是自然界耐寒植物竹子的简单形象，而以艺术事象和吉祥象征的意义出现，这跟中国人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关联。一般来说，受播者的知识层次是不划一的，所以对所指的解读也会因人而异；使用同一母语的人在听取或阅读同一大单位语言符号时，也会出现多样解读。这就是所谓阅读程度或知识

① 威廉·莫里斯.意谓和意义[G].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底蕴的深浅。即使传播者约定的受播者，面对传播符号也可能没有很好利用所指层面上的历史积淀——实践和技术的结合体，因而造成传播信息的失控和出现不对应的反馈。至于那些公共性质的传播符号，其约定性则要求更加高，比如公共卫生间门口形式略有差别的男女标志，相信不论男女老幼，文化高低，言语不同，都能接受社会约定去解读而不会产生误读或疑义。

至今许多人还奇怪，上世纪的前苏联书记赫鲁晓夫为什么把中国人餐桌上习以为常的“土豆加牛肉”比作共产主义生活？只有知道了“土豆”对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文化意义，才能对“土豆”情结有所解读。因此所指的意义分析，还必须把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乃至政治、经济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3.4　符号的心理再现

传播符号是携带传播信息的物质载体，但符号本身并不显示信息。符号是音响、视像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正面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能指，背面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所指。将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一体的行为即一个被理解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符号化过程或获得解释的过程。在能指和所指符号化过程中，实现中介的是“意指”。

在传播符号中，一个能指可以有多个所指的内容，一个所指也可以有多个能指的实体与之对应。所以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不会使语义穷尽。实际上一个传播符号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的意义指向客体事象，存在于以能指为形式的所指中；第二层次的意义指向所指概念意义的内蕴，巴尔特称之为“隐喻”。具有隐喻性的内蕴意义固定或冻结了所指意义的浮动和多样性。传播符号的第一层所指意义受环境的制约和历史的分配。它通常是显现的，而且被约定的，因此它更具常识性。但是，在透过能指的表象形式通达所指的意义内容时，人的思维或分析（对符号切分），或综合（将符号组合），或抽象（撇开符号的实体印象），或概括（形成意义的心理形象），无疑就是实现意指的过程。因此意指不是单方面的存在物，它并不是简单地将若干个符号的所指聚拢相加而已。意指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根本能力。所以具有科学性，是深层次的。只要稍微接触符号，立刻会明白这些十分普通而易懂的道理：“电脑”≠“电”＋“脑”；“白菜” ≠“白”＋“菜”。人类在大脑中对接收到的外部世界的刺激（信息）加工处理，并符号化，形成单个的“意指”或完整的“意指”。

这里涉及语言符号转化为概念和思想的心理过程，也涉及概念和思想转化为语言符号——扩展性话语的心理过程。对于其中心理操作的分析，至今仍未深入。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这个心理操作过程或叫转化过程中，联想观念一直

占支配地位。

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我们必须借用“内部语言”的概念。客观世界是一个混沌的连续体，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将它进行划分，比方说颜色的光谱本来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续体，人类却根据自己感知的事象和经验进行有序的划分，形成各种表示颜色的语言符号(词)——光谱的“意指”；不同的语言因使用者的经验和习惯会有不同的划分样式。因此，从某种意义说，我们大脑中的世界实际上是已经被语言符号包装过的世界。被包装过的世界虽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但它比感知的世界更概括、更真实、更具光彩，因为它已经经过人类大脑的加工，并融入了人类的愿望和联想。大脑中的语言符号构成内部语言，大脑中的加工形成自我传播。经过加工的世界，是一个符号世界，有序世界，规则世界。人类正是借助语言符号完成对世界的认识。

大脑中的每个“意指”单位都规定着相应的表象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例如将“煤”的表象归属于[有机物]+[黑色]+[可燃性]等等，并与其他相关“意指”单位联结，或因具有共同意义特征而放在共同的背景中，属于同一范畴)，位置决定着“意指”的心理价值，即一个传播符号引发不只是它在大脑中的表象的归属，将牵动它的多项性“意指”网。这就是传播符号产生联想的心理基础，不管传播的能指形式如何多样，它们进入人的大脑后都被全部转写为“内部语言”，它远远比符号本身对现实事象的指称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会使人彻夜不眠，一件精巧的艺术品会令人爱不释手，一幅广告画面会激起消费者购买的欲望，甚至一个十分简单的词可以刺激起生理上强烈的反应。说明符号的“意指”在大脑中能产生多项性联结，具有心理再现的能力。

传播符号学中关于符号存在“意指项”的理论原本来自于哲学的现象学的研究，传播符号学概念中的“意指”及其“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就是从研究现象学得到的启发，吸收了其中有关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内容。“意义显现”表达方式，在感觉的范围之内于感觉主体与被感觉对象之间互为基础的关系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确定为可感觉的与可理解的、想象与现实理据之间的一种关系空间。法国叙事语法学家格雷玛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明确地写到：“我们建议把感知确定为非语言学的场所，而对于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这个场所内”[①]。显然，格雷玛斯主张把“意指”列入人类认知的范围，而不是简单地看作语言学现象。因为在传播符号系统里，“能指”是可感知的、直观的符号形式，它本身不具有意义，只是意义的一种“包装”；其背后的“所指”代表某一客体事象，但它代表的又不是具体的某客体事象本身，而是被抽象化、符号化的某事象的概念。而“意指”是能指联结

① [法]格雷玛斯.结构语义学[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9：8.

所指并使之获得意义的一个中介项，它在符号系统里没有具体的存在形式，但存在于实现传播活动的过程之中，存在于传播者和受播者的互通理解中，存在于非语言学的心理场。比如语言符号中有许多动物名词（能指），它们代表现实世界里的众多动物的“类”（所指），但是当它们进入传播活动时，常常通过隐喻联想（意指）而呈现特定的喻意。其喻意因传播者和受播者的语言、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英语 dog 代表现实动物世界里的“狗”，它给人总体形象是不坏的，有时它也可以指人，如谚语 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日），又如 a gay dog（快活的人、好玩的人）。但 dog 也有形象不好之比喻，如 dog eat dog（狗咬狗。注意 eat 为原形），意指“人们自相残害”；a dog in the manger 比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在汉语里，尽管狗在时尚人物眼里也为宠物，但“狗”的总体形象不雅，因而意指人时多含贬义，如“狗咬狗”、“哈巴狗”、“走狗”、“狗仗人势”、“癞皮狗”等等。英语 rabbit（兔子）的形象并不美。用来指人时，所取喻意跟汉语大相径庭，a rabbit 意为 a person who plays a game badly（蹩脚的运动员），一出场显得很窝囊。中国兔子的意指形象不同，比较中性，大体喻意是“快捷”（快如脱兔）、“狡猾”（狡兔三窟）和“缺乏信任度”（兔子尾巴长不了）。按现实事象来说，东西方的狗或兔并没有本质属性上的差异，能指符号“狗”和 dog、“兔”和 rabbit 所指的概念意义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传播条件和范围不同，符号意指的心理联想和定位不同，心理再现的方式和内容就不同，于是形成的喻意就很不相同了。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受试者在接收某一个词时，同时做出运动性反应（如按钮）；或者在给出这个词的同时，进行疼痛刺激，那么就发现，这个词的出现会引起定向血管反应（手部血管收缩、头部血管扩张），或者引起特异的疼痛性反应（手与头部血管收缩）。如果继而出现其他的词，与试验词在意思上有关联或者与试验词发音相似，也各有反应。正常成年（或正常知识人）受试者对发音相似试验词，则不引起任何反应①。实验表明，每个语言符号的“意指”单位周围在大脑皮层确实形成一个多项联结的网，并且在正常情况下，构成“意指”的所指层面联结的作用占优势，可以抑制因能指的近似而发生的联结；当“意指”是一个符号链时，多项联结网就会调动每个符号“潜在的搭配能力”及与其他符号的各种搭配关系，使每个符号有可能纳入完整的传播体系中。例如受播者接受了第一级传播者的语符“借给”，立即会调动一切潜在的搭配能力，引发一连串的问题：借给谁？向谁借？怎样借（什么方式）？何地借？借什么？借多久？借了做什么用？等等，并且自然可以引出许多可能的“意指”联结，组织各种可能应对的话语。人们在既定社会的文化环境里进行传播活动，不断受到传播符号的反复刺激，受到符号约定性的反复

① ［苏联］卢利亚.神经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启示，不知不觉在能指和所指间形成了固定的概念性意义联结，同时也形成了受文化氛围、知识背景和历史积淀影响的“意指”，“意指”使每个传播行为下的受众获得认读符号的心理导向。它们作为传播信息储存在大脑内部语言的信息库里，随时提取，随时传输，随时调动“潜在的搭配能力”和具有一定规则的搭配关系，进行“接受”或“发送”。所有这些都在瞬间完成。受播者经过内部语言的理解和反馈，形成完整的表达——口头话语；接着，受播者转变为第二级传播者。如此循环反复，这样单向传播变成双向传播，话语进入话轮。

整个符号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外在化的传播，在传播者和受播者之间进行；另一个是内在化的传播，是传播者或受播者自身的心理阶段。内在化的内部传播又有两个过程：从言语经过“意指”到思想，是一个符号化心理再现过程；从思想经过“意指”到言语，是一个符号化现实表现过程。前者也可以称为“解码”，后者也可以称为“编码”。两个过程在组成环节上是相同的：“意指”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这个行为使“意指”的两个既互相包含又彼此分离的成分——表达层面的能指和内容层面的所指分别产生两个对立的整体，同时指向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延伸。内涵的所指则同时具有一般性、全面性和分散性，它是意识的一部分。比如一部作品就可以指向“文学”，一尊雕塑可以指向“艺术”，这些所指又与人类的全部文化、知识、历史密切交融。因此可以说，正是通过它们，世界进入符号系统。

由此可见，“意指”活动主要是意识形态的。所以符号在传播意识形态的信息时，意指的功能表现得尤其充分，因为意识形态传递的主要途径就是符号“隐喻”形式的内蕴意义。我们把前面曾提及能指和所指直接联结的意义称为第一层面符号意义，意指联结的意义是第二层面符号意义。大众传媒传递意识形态信息时，意指的任务就是使第一层面符号意义减弱。所谓“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坐落地面以支撑桌子、椅子、床铺等平面物的杆子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因为“意指”的隐喻意义通常在符号传播中不显现，而且不似所指意义那样具有社会的通识和约定，对缺乏“意指”知识的人而言是很陌生的，所以巴尔特称它为“神话”。巴尔特在关于“神话”的著名例证(取材于 1955 年一本法文杂志《Paris Match》的封面)中描述[①]：

> 当时我正在一家理发店里，伙计递给我一本《Paris Match》。封面上有一位身穿法国军服的年轻黑人士兵正在敬礼，双眼仰望，可能正目不转

① 罗兰·巴尔特.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68-224.

睛地盯着一面法国三色旗。这就是这幅画的全部意义。但是,不知是因为天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从我的角度看到了这幅图画所要表达的意思: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所有的子民,不论肤色如何,都在她的旗帜下忠心耿耿、恪尽职守,而且这个黑人士兵在效命于所谓他的压迫者时所表现出来的热诚,是对于那些诋毁殖民主义的人的最好的回答。我因而面对着一个更大的符号学系统:这里有一个能指,它本身早已与一个先前就已存在的系统(一位黑人士兵正在敬法国式的军礼)合在一起了;这里有一个所指(有意将法兰西主义和军事扩张混合在一起);最后,通过能指而呈现所指。……除了黑人敬礼之外,我可以赋予法国帝国主义许多其他的能指:一位法国将军给一个独臂的塞内加尔人佩带勋章,一位修女将一杯茶递给一个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

巴尔特这样定义传播符号的"神话":"神话肩负的任务就是让历史意图披上自然的合理的外衣,并让偶然事件以永恒的面目出现。"这样,"传播符号+神话"就构成第二层符号意义,即所指的某种意识形态。

1964年10月16日各大新闻媒体作了头版报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登载了蘑菇云的宣传照片(如图3-6所示),作为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图片(能指)完全突破了"原子弹爆炸"这一固定的所指意义,背后的内蕴意义却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除了表示"战争"和"战争威慑力量"之外,包括"中国的强大"、"科学进步"、"打破核垄断"、"反对称霸"等蕴涵意义。由于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文字信息使新闻图片的隐喻意义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要知道当时的历史背景:面对苏美英三个大国的核垄断,以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封锁,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必须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有着特定的意指含义。如果没有文字的意指,没有历史背景的烘托,光是这张图片,那么完全恢复了"原子弹爆炸"这一符号的第一层次的意义(所指意义)。这就是视觉符号在传播中拥有的再现客体事象最自然的所指意义。



图 3-6

3.5 符号的意指与客体事象

所有意指都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表达层面，表达层面由物质形态的实体能指体现；一个是内容层面，内容层面是所指，即以意义方式表现的思维形态——概念。在符号学里，前者用 E(plan d'expression 的缩写)表示，后者用 C(plan de contenu 的缩写)表示；意指行为则相当于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R)：ERC。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意指符号本身都可以从自身系统进入另一个系统，在另一系统里充当能指或所指。

比方一家皮鞋店用物质实体皮鞋做广告，皮鞋被切开，切开的剖面对准公众，旁边标注文字："绝对真皮"。广告的意指很明显，它的表达层面 (E)是切开的皮鞋(以示明制作材料)，其内容层面(C)是想告诉人们：皮鞋是真的皮做的。这里我们马上发现，广告的所指(C)用另一个意指系统来表示。另一个意指系统属于语言范畴：由表达层面(e)"绝-对-真-皮"这一文字形式和内容层面(c)"绝对是真正的(牛)皮"(所指将排除能指的歧义，真皮≠真正的皮)这一语言意义组成。实际上广告展示的符号，不仅仅是实物符号和文本符号，还有商店的橱窗、橱窗空间的布局等也进入了符号系统，而且成为符号解读的背景条件。因为正是"橱窗"，使切开的皮鞋在符号一般意义的基础上获得了商品符号的特定"价值"。价值和意义是不同的概念，意义存在于一个个独立存在的符号中，价值则必须在符号的组合和替换中得到体现。在系统内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作用下出现。"橱窗"使已经被切开的皮鞋仍然以"商品"的价值呈现于受播者面前，为实现广告的目标效应进行烘托，成为受众接受这一广告传播符号的预备知识。再考察广告的实质：一方面通过实物作能指，人为地把皮制的鞋切开，分解为"皮"和"鞋"；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的提示，显示其质量的可靠性。广告符号传达的意义重点虽然在"皮"，但是背景附加符号——作为"预备知识的"橱窗告知它传播的目标效应在"鞋"。这样，通过附加符号的"预备知识"和文字符号的"意指"功能，有效地排除了所指可能出现的歧义：这里展示的皮鞋的皮是真正的皮，而不是真皮。[①]

可见非语言传播的广告符号是有层次的。传播符号的能指(E)，它也用另一个意指系统来体现：人为地把皮制的鞋切分为"皮"和"鞋"，意指重点在"皮"(e)，所指的客体事象是"鞋"(c)。于是出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即一个 ERC 系统

---

① 广告符号中的文字诠释是一个歧义短语："绝对真/皮"和"绝对/真皮"。"真皮"有三个含义：一是相对于假皮的皮，即天然皮革；二是生理解剖上的概念，指表皮下面由结缔组织构成的一层皮；三是仿真皮，即人造革。如果不将橱窗里的皮鞋切开皮，就容易引起受众的误解.

可以延伸出第二个系统，前者变成了后者的一个简单要素。为了更形象说明问题，我们示意如图 3-7 所示。意指系统Ⅰ里的两个符号序列 e_1Rc_1 和 e_2Rc_2，分别成为意指系统Ⅱ里的一个成分——能指 E 和所指 C。我们也可以用表 3-1 来表述。



图 3-7

表 3-1

能指 E_1	所指 C_1	
能指 E_2		所指 C_2

根据第一系统（Ⅰ）对第二系统（Ⅱ）切入点的不同，两系统意指的“分离”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两个对立的整体。第一种情况：第一系统的意指（ERC）（例如用切开的皮鞋来表示皮鞋是用天然皮革——牛皮做的）变成第二系统的表达层即能指。这可用公式表示为（E_1RC_1）RC。第一系统的意指构成外延层：广告所陈列的皮鞋是多种样式皮鞋的一种，是无数皮鞋中的一只，但是它代表了本店内所经营的所有皮鞋。由第一系统延伸来的第二系统的所指构成内涵层：广告所展示的不是能指——实体事物的表象，而是符号的功能（可穿的鞋）和质地（真皮——天然皮革）。为此我们把表达层本身是由一个意指的系统组合的系统，定义为传播符号的“内涵系统”。第二种情况：第一系统（ERC）不进入内涵意指中的表达层面，而是第二系统的内容层或所指。用公式表示为 ER（E_2RC_2）。在这种情况下，第二系统的内容层本身就也由一个意指系统组成，也就是说第一系统成为第二系统的“阐释系统”。元语言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研究符号学的符号系统。

因此所有的符号系统都可以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获得解释，所有符号系统的所指都可以用语言符号的意指性来担当。第一符号系统的意指因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在充当第二符号系统的内容层面时就容纳了第二系统的全部外延信息，诚如广告无言的提示：本店供应的“所有”皮鞋绝对地“全部”是真皮——天然皮革。

我们发现，当我们进入使用符号的实践过程后，大量符号实际上早在使用之前就建立了固定的对应关系（能指 E_1＋所指 C_1＝能指 C_2），例如各种字典或者词典就为语言文字传播活动准备了一个字或者词语所具有的基本意思（本义、引申义等）。在进入第二层表意活动后，传播符号学要研究的不是对这些已经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采取分析和解释工作。原始对应关系建立的一些规则虽然还有待于我们去继续挖掘和发现，但是已有的规则告诉我们今天在使用的符号大部分已离开原始对应关系的中心，而且离开得那么远。有些词还保留着回去的路，有些传播符号（能指 E_2＋所指 C_2）已经对过去的样子模糊不认了。不论它们现在是哪一种，它们

又都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随着人类认知领域的扩大，传播符号依次继续，不断传递，不断延伸，不会完结。我们还发现，传播符号逻辑关系上的内涵和外延现象是一个非常具有能产性的生成过程，因为社会已经从人类语言为其提供的第一符号系统，不断地发展出第二符号系统的意义。这样每个符号的演化过程就显得非常接近真正的历史人类学，每个第一系统的符号都真实记录下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历史过程。有的符号当它作为第一系统意指的客观事象已经消失，却在第二系统里作为能指或作为所指获得意义而被保存下来。这时，我们甚至可能从第二系统的意指去探求它的初始意义。比方说，“洞房”这个符号形式在第一系统里意指远古时代以山洞为家的原始婚姻情况，但在第二系统里以能指形式出现在表达层面，则内涵为“现代人结婚的新房”，而且它们不必是“新”的，可能是客栈、宾馆或居家。第一系统的“洞房”成为历史词，或者叫“化石”词；第二系统的“洞房”成为内涵的能指（外延系统的符号构成），它与原来的符号单位在外延上不具有同样的大小规格，不仅在质上有了新的意蕴，而且在所指范围上也发生变化，例如旅行结婚的旅馆客房也属于“洞房”。在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中，第一系统的符号构成第二系统的所指，也就是说语言符号被用来描述传播符号系统中的能指，它起着元语言的作用。如果一对新婚夫妇在旅行途中租借了某旅馆的客房，度过他们新婚的第一夜，那么“客房”作为文化性符号存在于第二系统的能指，其所指如果是一个外延符号——“洞房”，那么“洞房”又是作为元语言对“客房”进行了重新定义（即被意指）。在一般场合，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客房”定义为“洞房”！

在传播符号的具体操作和运用中，由多个外延系统的符号结合的所指，可以构成唯一的内涵能指。说“这间客房是洞房”远远没有“这间客房是这对新婚夫妇旅行结婚的洞房”来得明确。当然，不管内涵意指用什么方式或用多少个符号来“装饰”（限制）外延信息，都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做到使“内涵”成为“唯一”，并使“外延”没有余地，否则就无话可说了。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内涵的能指，归根结底是一个不具有连续性的符号，它们本身属于第一系统的意指而又被承担的外延信息所分解。而内涵的所指，则同时具有概括性、一般性、全面性和内在规定性。可以说它是意识的一部分，是内部语言的组合系列，是自我传播的成果。例如一部作品可以指向“文学”这个所指，也可以指向作者“世界观”这个所指。这些所指与文化、知识、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形态密切交融，正是通过它们，现实世界（客观事象）才进入符号系统，才被人们感知。总之，传播是内涵所指的形式，语符是内涵能指的形式；符号的意指和意指指向的现实事象，从两个不同层面把人类与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

传播符号的两大基本类型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是互相配置互相依存的，符号的两大元素能指和所指也是互相配置互相依存的。第一符号系统的能

指是形式，进入第二符号系统是意义。但是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处于第一系统时既是形式也是意义，因为在人们实践它们时，它们的意义都已经被历史地规定，并以凝固的形式储存在一些经典的字典或词典中，我们现成地拿来使用。由于语言符号的意义比较明确，也就最适合充当意指的角色。当然用非语言符号构成第二系统意指时，最终也要依靠语言符号来进行描写和阐释。总的来说，意指的表现方式有三种：

1. 直接意指

能指在形式方面是空洞的，在意义方面又是充实的。因为空洞，所以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有任意性，是约定俗成的。因为充实，所以它跟所指结合能提供一种阅读方式和感觉方面的现实。特别是语言和文字符号，当我们念出一个词语或识读一个字符的时候，它在我们的认知中一直是充实的，有意义的。因为在我们认识它之前，所指已经把意义移植到能指上。或者说外延的关系已经确立。至于非语言形式的平面传播如照片、绘画，通过把所指的外在形象移植到纸上，照片与被摄者、画纸与绘画作品的基本关系就确立了。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语言文字符号的意义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照片和绘画的意义也由于平面的物质材料上的作品内容来显现而合理化。其次，已被受众认可的符号便为受众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和相对秩序等。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比如在看图识字卡上有字有图，当人们对字的意义已经掌握，图便失去意义。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被操作的可能，需要意指发生作用，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形成新的能指，即 E_2＋所指 C_2。

2. 含蓄意指

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物化形式的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比如看图识字卡，儿童先有对事物指称的预备知识而后识读文字，所以图片（能指）足以直接引导儿童掌握所指意义。当符号（看图识字卡）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起意义时，图片在第二个层次（文字）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那移植的部分在第二符号系统里经过隐喻作用成为含蓄意指。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在第一系统的关系转移到第二系统，当第二符号系统的意义被确定后，又转移到新的符号系统。每次转移都以前一系统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后一系统的意义附加其上，构成新的能指或所指。这种含蓄意指的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止的。

3. 互动意指

我们必须认识到符号存在于传播互动，所以意指虽然客观地存在于符号之中，但却由传播主体的双方互动而生。传播主体传播方和受播方的互动实现着符号运动，我们不得不承认符号所指某物或某意义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或某意义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认知，从而在不同心灵间共识某物或某意义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共同特征构成符号的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透过符号的意指，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物或某意义的存在，也能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符号的共同特征和共享性，是使用符号的双方——编码者和解码者之间互动的前提，传受双方知识背景、文化背景越接近，符号的共享性越高，其互动互通度就越强。所以，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指的揭示，都必须在互动中实现。这种在传播双方互动中实现的意指，称为互动意指。

任何一个符号的形式必须能够经常移植，再度生根于意义之中，使含蓄意指不断"增值"，符号的生命力才不断加强。含蓄意指藏在互动的现象中，当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义被完全吸纳后，逐渐地退到远处，经过移植获得新生，新生的意义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解释。它一旦被移植，就具有了新的意义，不过这个新的意义已不是自然形成的。例如 2003 年世界艾滋病义演晚会的名字叫"466/64"，这个数字是南非前总统著名的世界人权领袖曼德拉被关在狱中牢房时的号码。这个号码(能指)的背后是指曼德拉狱中的生活，但它又有象征意义，曼德拉的监狱生活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这个数字出现在艾滋病义演会，数字的直接意义跟选取这个数字的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固有的直接意指被淡化了。反对种族歧视又是平等、和平的过程，于是"466/64"又具有了新的象征。因为关爱艾滋病人体现的正是人类世界的和平、仁爱的主题。"466/64"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不断被移植，新的所指的不断渗透，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义淡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意指进入到"466/64"这个特别的数字符号中。在"466/64"这个数字中也就不断造成新的传播互动，形成新的心理再现①。

① 李岩. 符号学 VS 新闻学[J]. 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5(2).

第4章　功能符号与符号功能

4.1 “实用”性功能符号

物质文化传播的符号特征与精神文化传播的符号，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物质文化的符号与精神文化的符号，它们的所指性质都可以归结为“事物”的心理再现，但是精神文化的心理再现更着重在“价值”上，物质文化的心理再现更着重在“实用”上，但也有很强的两重性。比如服装，对贫穷而衣不蔽体的人来说，只是保暖或者遮羞的实用物品；对富裕而锦衣裘袍的人来说，其实用功能大大减弱，而装饰功能大大上升。反之，一幅画，一般地说它作为艺术品被人们所收藏或欣赏，其意指的价值不在画本身，而在作者的身价及其作品的艺术性；但是，对一个初学绘画而把它当作临摹物，它的艺术价值大大减弱，实用功能大大加强。这里只想说明的是，一个由社会出于意指目的而加以衍义化的实用实体，即本体不在意指的表达实体被用作能指符号时，也能被用来传播意义。其意义往往因受播者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其符号性质是相同的。

我们把传播符号系统中本体具有实用功能的实体性符号，称为功能符号。它与语言学符号一样，也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但它们在实体的层面又与语言学符号有分别。功能符号显示一种双重品格，因此应予以双重运动的分析。从理论上说，任何“功能”都能吸收意义，都能被元语言描写，并被语义化。只要有社会，就有实用的存在，而凡是实用都能转化为实用的符号。“实用”符号化后就必然与某些符号联结成一个系统。例如一件防雨的衣服，它的实用功能是防风挡雨；实体性防风挡雨的衣服符号化为“雨衣”的能指形式，并与雨伞、雨鞋、雨帽、雨披、雨篷等实体符号构成聚合关系；雨衣的实用又与某种自然现象符号（包括天气、天象、季节等）联结，形成组合关系。由于我们的社会在规模生产上的标准化、规范化，使这些物品成为某一模式的不同实现，个体物品的个性在这里不是重要的特征。它们好比一种语言的不同言语，是一个意指形式的不同实体，每个符号都处在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双轴上。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个物品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现成的模式，几乎是幻想。想设制一个毫无意义的物品，而且与一切现成的都无关，实在是无法实现的假设。因为人类把数千年文明的经验积累充分实现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任何想象临时拼凑制造出的物品都一定可以纳入既定的符号范畴；除非是某个人类

所无法想象的物品，那因为人类对它的不可想象而不被认知，它对于人类也就没有意义，也就不能体现它的存在！

物品的"实用"本身就是对物品的语义概括。物品被赋予的普遍语义，表明实物被理喻的存在。当我们面对一个物品，用语言符号"雨衣"来指称它时，就是第一系统的所指充当了第二系统的能指，经过心理再现构成了"雨衣"的内涵系统；当我们指出雨衣的社会功能——"用途"，并用一连串不具有连续性的语言符号组合成连续性的话语时，就在用第一系统的能指构成第二系统的所指，经过逻辑归类揭示了雨衣的外延系统。这样，"实用"性功能符号集社会学和逻辑学于一身，最终实现为远离物质实体的纯粹心理的印迹。也可以这样通俗地叙述：一件可以起防风挡雨作用的衣服放在人们面前，如果人们拿起它来穿用，它就发挥了实用性功能；为表示对它的实用功能的认识，人们给予它意义，给它一个概括意义的符号叫"雨衣"，这就成功地把第一符号系统的所指（雨衣的实用功能）转化为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雨衣的语音形式或文字形式）。在人们面前即使不出现具体的雨衣而说起"雨衣"这个词，人们也会与实体的雨衣联系起来，并且会说："雨衣（yǔyī）是用油布、胶布或塑料等制成的防雨外衣。"这一连串用语言文字符号的能指形式组成的话语，构成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雨衣"的所指，这就是利用第一符号系统的能指转化为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当防风挡雨的外衣用"雨衣"这个词语来指称时，这个"雨衣"不再有实用性具体功能，"雨衣"既不能穿用，更不能防风挡雨，但是它会使人感知雨衣的实用意义。功能符号就像童话里"皇帝的新装"，看不见，摸不着，却包裹着皇帝的身躯。

所以，心理印迹的功能符号一旦形成，社会也完全可以把它还原，使之再功能化——人们不需要看到物品实体，也不需要拿它来实用，只要接触到它（指功能符号）就会将它视为实用物品。例如人们读到"雨衣"就自然会说到它穿在身上用于防风挡雨；人们读到"沙发"就联想到安放在休闲空间里的有弹簧或软垫的坐椅。这一再功能化过程，有赖于第二符号系统的存在，实际上是第一符号系统指向了第二符号系统。如果说由物品实体获得"实用"性功能符号，是第二符号系统借助第一符号系统表达，即第二符号系统依靠第一符号系统来指说和解释；那么，由符号获得再现功能是第一符号系统回归于第二符号系统，与第二符号系统的语义制度相关联，即语言符号构成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的内容层面或意指。功能符号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文符号，特别是意识形态符号，因为它是物质技术与能指的结合，是物品的社会功能与符号的社会功能的双重结合。同时我们看到，实体的规范性和符号的"伪实性"巧妙地复合在一起，在视觉系统里我们接触的是一个规范个体（如一件雨衣，或一只沙发），但我们推导出来的却是一个被理念包装的"元语言"符号；说它"伪实性"是因为符号的意指高于实体、超越实体，它指向的实体（雨衣或沙发）

没有固定的形体，没有规定的质料，也没有时空的限制，只有“实用”功能。

在功能符号的意指移植过程中，我们把隐喻看作是认知历程和构思方式，这种隐喻有系统性和融贯性。例如现实生活中有一事物，它是豆浆过滤后剩下的渣滓，人们用一个语言符号指称它，命名为“豆腐渣”。于是，“豆腐渣”的直接意指是豆浆过滤后的渣滓，当它进入第二符号系统，组合成“豆腐渣工程”新的符号序列时，符号已有概念的直接意指被淡化，其隐喻意指凸显出来，“豆腐渣”含蓄意指为无法成形、不堪一击的无用之物。现实社会中有许多工程，人们用一系列“XX 工程”的功能符号来指称，其中有的呈现直接意指，有的呈现含蓄意指，有的呈现互动意指。例如：

直接意指类——水利工程、防汛工程、桥梁工程等。

含蓄意指类——阳光工程、希望工程、豆腐渣工程等。

互动意指类——211 工程、823 工程等。

其中“豆腐渣工程”所隐喻的主要是属于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的不合格建设项目，但是隐含的内蕴意义则要比符号本身体现的意义丰富复杂得多。

语言文字符号在功能符号传播中起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所有功能符号几乎都能转化为语言文字符号，语言文字以意指的承担者面貌出现。比如在照片时装（或实体模特。为更有典型性，假设不附加任何文字说明）系统中，语言完全以“专制君王”的命令，把时装编制成一个“方阵”。方阵不再以抽象示人，而是各种穿着的女人，她们构成一个立体的对比系列，尽管照片提供的是半系统化状态（因为照片只能是平面的）。一方面，“方阵”构成时装“语言”，这完全是由“伪实性”服装推导出来的系统；另一方面，照片中的着装者可以设定为一个规范的个体，因具备一般性而被选用，因此设想它在没有进入“方阵”前是一个不具任何组合的自由的“言语”（或称为言语符号）。“方阵”在“专制君王”的命令下动作了，产生各种变化，那个本来自由的“言语”开始进入组合，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时装“语言”中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第一符号系统与第二符号系统的变换。时装“语言”由以下成分构成：(1)各衣服的款式、附件或时装“细部”的对立，其变化会引起意义的改变；对应于系统内部的服饰，其外部附件礼帽、领带等，也有同样的附加意义。(2)支配衣服间组合方式的规则，或是身长，或是体形，或是性别等。构成时装“言语”的，包括所有不规则制作的特殊衣服，或纯属个人行为的穿着。这样时装系列的功能符号系统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成衣”（相当于“语言”）和具有个性特点的“衣着”（相当于“言语”）统一起来，但其作为传播符号系统的辩证关系与语言学符号中的情况略有不同。在语言学符号系统里，“言语”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语言是言语的抽象和概括，言语是语言的应用和实现。然而衣着永远不能先自成衣，衣着的变化永远由成衣决定；奇装异服自然例外，但奇装异服也有自身的功能符号。于是，我们需要对功能符号有一个新的认识，它总是规则先于实践，即物品在成为功能符号之前社

会生活“实用”的观念已经形成。或者换一句话说，正是“实用”的观念推动第一系统作用于物品，并使之符号化。

由上述分析，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符号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包装”，并通过其被包装的事物的符号意义来指称特定的对象。皇帝穿的“新装”不在乎什么材质和什么存在方式，而在乎它代表着的“文化价值”，正是这一心理，皇帝被成衣匠骗了，但是皇帝被骗得很舒坦。我们不妨看一下现代经济社会，何处不存在“皇帝的新装”？以至于可以说“我们不是在吸烟，而是在塑造吸烟的形象”，“妇女们也不是在购买，而是在寻找青春、美丽、成功和爱情的形象”。功能符号的实用价值正在日益转化为文化象征价值。符号的这种变值功能，成为增加时代精神财富、影响人们心理、修正人生素养、改造社会品味、提升商品内在价值、“制造”商品增值价格等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的弊端，符号的变值功能正给社会带来极其可怕的负面效应：符号的虚指功能给制造假币、生产伪劣商品、发表剽窃作品、设计虚假广告、骗取虚假文凭、编造虚假履历等等，提供了可能！而且，随着因为功能符号操作简便而得到广泛应用，为非法牟取财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沽名钓誉等丑陋行为提供了方便！

功能符号——“皇帝的新装”，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社会充分符号化时代，我们不得不提醒一个事实，并惊呼一声：谨防“符号陷阱”！

十分有意思的是，功能符号所指映射的客体是具有使用功能的事物，客体事物的功能又回指地映射到符号的所指，并转化为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当一个概念——客体事物功能的抽象化意义被赋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式——意义上时，它并不使已有的意义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扩张原有的意义。当意指赋予在第一个符号系统的时候，意指掏取第一符号系统中的概念意义，移植到第二符号系统的形式——能指，便构成了表达新的意义的符号。第一符号系统的概念意义被掏取的越空，第二符号系统的意义离开原先所指的客体事物的功能就越远，新符号的意义就越丰富，越充实。所以“实用”性功能符号的运动实际是一个不断远离“实用”，不断给符号赋予新意义的过程。下面三张照片很能解释符号赋予意义的过程。

图 4-1 是“9·11”事件的经典镜头，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向美国世贸大楼的双子塔，它是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拍摄的，其新闻价值最突出，照片能指背后的所指也最直接。作为新闻照片能指层面的符号元素有：时间——2001 年 9 月 11 日；地点——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事件——大楼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飞机冲撞后双子大楼失火冒烟。图 4-2 是 2005 年 9 月 11 日的一幅宣传画，耸立的双子塔的中央正被飞机冲撞而起火，跟图 4-1 相似，但整个画面用遇难者的人头组成。宣传画用“人头”组成的双子塔（能指 E），象征倒塌的高 427 米有 110 层的世贸中心大楼，表示对“9·11”死难者的纪念（所指 C）。这已经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真实，意

味着它是一个符号(ERC)。以图 4-1 为基础,构成新的能指符号,意指"'9·11'+恐怖+千余生命"。图 4-3 是"9·11"反恐纪念碑,它是由俄罗斯设计师祖拉布·蔡列特利所构思,由俄国民众赠送给美国友人的,于 2006 年 9 月 11 日,"9·11"事件五周年纪念日在美国新泽西州贝永市(Bayonne)举行正式揭碑典礼。纪念碑高 30 米,碑体中央作断裂状,断裂的缝隙垂着一颗象征泪珠的钢球。纪念碑被命名为"悲伤的泪滴"。纪念碑用雕塑"语言"和语言符号为能指,意指"9·11"事件是人类的灾难,是悲痛的纪念。如果说图 4-1 的双子塔起火这一视觉符号传播的是新闻真实,意指是"'9·11'事件";那么在图 4-2"起火的双子塔"已是图 4-1 意指的移植,"'9·11'事件"成为了"反恐斗争"的永远的象征;这一象征又成为图 4-3 立体雕塑"语言"中的所指意义,那下垂的钢球通过意指的文字符号"悲伤的泪滴"得到揭示,使雕塑"语言"中"浮动的意义"确定下来,主题得到了深刻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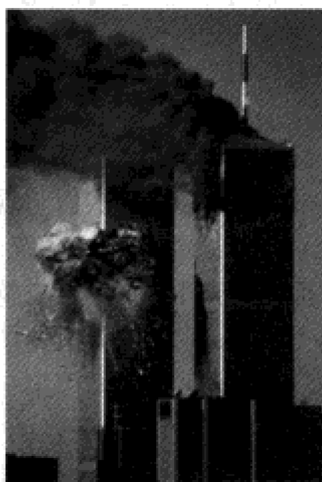


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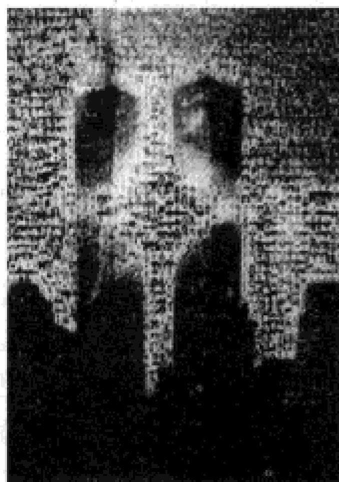


图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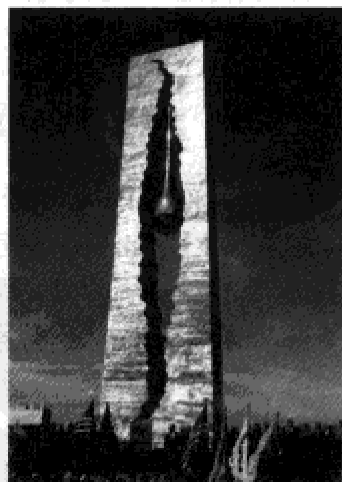


图 4-3

图 4-1 是再现性符号的照片,具有实时新闻意义;图 4-2 是表现跟表现结合的绘画符号,既有直接意指又有含蓄意指;图 4-3 是表现性雕塑符号,具有隐喻下的象征意义。我们从这三件非语言形式的传播形象中,可以看到符号形成的原始对应关系不断离开中心,在新的符号传播中有些还保留过去的痕迹(如图 4-2 还可以看见图 4-1 的原型),有些跟原符号的联系已经非常模糊了(如图 4-3 没有文字提示的话几乎看不出跟图 4-1 的关联)。新符号确立的对应关系又可能成为新的对应关系建立的原始基础。依次继续,不断传递,不断产生意指的新的内涵意义。图 4-1 里的新闻事件可以视为第一符号系统的实例,它的能指和所指分别被"移植"到图 4-2 和图 4-3 里,以隐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方式出现,那么图 4-2 和图 4-3 可以看作是第二符号系统。图 4-3 中起着提示作用的文字,可以看作是承担"解释项"的元符号系统。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们归纳成表 4-1。

表 4-1

	能指	所指	意指
图 4-1	照片:起火的双子塔	新闻事件:"9·11"事件	直接意指:"9·11"恐怖事件
图 4-2	图画:人头的双子塔	灾难:"9·11"恐怖事件	含蓄意指:反恐斗争
图 4-3	雕塑:钢铸的泪珠	纪念碑:悲伤的泪滴	互动意指:"9·11"纪念

图 4-2 尽管不是 9·11 事件的真实画面,但是根据相似性原理,它仍然可以被认定为是图 4-1 能指的心理再现,其意指已不是新闻意义,而是无数悲惨的"人头"为代价的事实。特别是图 4-3 已是新一层面上的符号系统,它看似与"9·11"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由于文字符号的意指提示,根据与使用者的文化需要的契合程度,以及靠我们对雕塑语言的熟知能力和一种概念的认可程度给予支持,并实现图 4-1 和图 4-2 的意指移植。这种契合决定了新的意指是否能够与外在真实("9·11"事件)相沟通,并且同时给"真实"以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这正是符号概念自然化为神话的基本功能。这一过程基本上能显示符号不断生成的情况。

4.2 符号的双重性功能

传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形式和内容,两者的结合构成意指,从而与现实事象发生联结,这是符号的主要功能。在第二符号系统(包括非语言符号系统)里,其形式或内容由第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担当,分别构成了第二符号系统的内涵和外延,符号充分显示了它的表意功能。符号作为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具有任意性的高度抽象。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用第一符号系统去表达或替换第二符号系统时,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将不是任意的,它存在着语义学上的理据性。在时装照片"语言"的单个符号里,照片是形式,时装是内容,它们的结合是任意的,人们也可以用绘画、人体来表现时装,并不必然要用照片。但是用"照片"这个语言符号的意指作为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用"时装"这个语言符号的意指作为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就不允许任意的。"时装"符号源于实体事物时装的概括,现在用它来指照片形式的时装,可以说是语义的回归或衍生。符号学中这种理据性在派生(如合成词)和合成(如形声字)的范围内,尤其是第二符号系统内普遍存在。这样传播符号的第一功能——表意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使我们有可能在符号学研究中确立类比性和非连续性原则。

类比性是符号理据的前提,也是使传播符号能广泛意指的根据。在语言之外的符号系统中到处可以发现其广泛意义,"图片"可以成为图片中实物的符号,"服装"可以成为穿某一服装的风度的符号,"装潢"可以成为任何所指事物身份的符号,等等。虽然我们还没有做到归纳出多少个抽象的类比项,以确立其聚合系列。同时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一些符号系统的理据性非常松散,或者非常模糊,或者掺

杂着无理据性。甚至在最为“理据化”的形声造字部分的汉字系统，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使声音符号与意义符号失去了理据性联系。广告符号也有类似情况，有的厂家的商标用十分“抽象”(无类比性)的图像组成，却能引发出某种与所指接近的印象(如给人以“力量”的感觉)，照样达到广告效果。其实表层的无类比性并不能掩盖内在的可类比性，“力量”是无法用图像模拟的，但“力量”可以存在于意指的内在可类比性中(某种图像或某类线条)。在一幅反腐倡廉主题的海报画中，作者选择了一个木偶作为主题形象，它正被操纵着倒向未知的黑暗。木偶，又叫傀儡，是一种被背后力量操纵的做戏的道具或游戏的玩具。当木偶作为海报组成的特定符号时，其类比性具有社会共识是十分明白可喻的，“被操纵者”成为它的隐喻意指。倒向黑暗的动感符号，象征着“被操纵者”——国家的蛀虫正走向毁灭。至于背后的“操纵者”很难用图画直接描绘，出现的几根牵线其表层形式也无可类比性，但是与“被操纵者”的形象仍然具有内在的可类比性，仍然能引发受播者的联想，仍然足以达到海报宣传的目的。符号的内在可类比特征为符号的表意提供了理据。

在形声字系统的声符里，这种可类比性特征常常得到复现，不过这种复现并不在符号的表层显现，例如“红”颜色，在文字符号系统里根本无法“模拟”，但它可以通过内在的类比性的含蓄意指来实现复现，“霞、瑕、虾、瘕、騢、葭、暇”[①]等字便是个例子，它们虽然指示的客体事象各不相同，但是代表各个事物的能指符号的部件里都包含一个共有意义的基本成分“叚”。“叚”即“瑕”的本字，本义是红色的山石，包含着内在的可类比性，成为这一组字符所指意义成立的理据。我国古代有篇谈到类比性的文章：“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②]说明传播符号如无类比，受播者便无从索解；如果像鬼魅等无可类比之物进入符号，势必难以诠释。传播符号学中类比性构成的符号理据，是符号表意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心理认知条件。

非连续性是符号具有独立意指的前提，也是使传播符号具有很强组合能力的基础。我们已经知道，每个符号都有能指的部分和所指的部分，两部分既对立又统一；能指也可以由另一个层面的意指(包括能指和所指)来担当，所指也可以如此。任何一种具有符号(广义范围)性质的行为或物质手段，都有非连续性特征。蜜蜂暗示采集物或采集物方位、距离的各种形式舞姿，看似是一个连续性的动作，实际上也是非连续性的；圆圈舞表示食物方位，摇尾舞表示食物距离，镰刀舞表示食物

---

① 霞是天上的红云，瑕是白玉上的红斑，虾是烧煮后能变红的水生动物，瘕是皮肤上出现红点的病征，騢是毛色红的马，葭是烧煮后能泛红的植物，暇是日之红色光华。上述字都一个“红”的意义要素，它是字符“叚”的意指在后造字里的意指复现.

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质量，此外舞蹈的频率、方向和姿势等都有不同暗示。说明蜜蜂的舞蹈作为传递信息的符号是非连续性的，是可以分解的[①]。语言符号也是如此，无论从音位学角度还是从语义学角度。人类对颜色的认识很早，但是谁也说不清颜色是怎么回事。后来人们发现了有各种颜色的虹，甲骨文里把它描写成“日”加“水”，表示我们的祖先认识到虹的颜色跟日光有关，也跟水有关，但仍然无法解释它。到唐代，张志和在《玄员子》里进一步描写：“昔日喷乎，水成虹霓之状。”后来牛顿利用三棱镜观察日光，才发现了颜色的秘密，从此发现了颜色是光的分解。恩格斯说：“牛顿由于进行光的分解，而创立了光的科学。”[②]连续性光谱的颜色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它被人类认知之后，便进入人类认知世界的语言系统，它们被符号化地表达为一系列非连续性的词——赤、橙、黄、绿、青、蓝、紫。所以，任何一个言语链可以按语素或词进行切分，总之语言符号中的“意义”只能通过分节（语素、词、短语、句子、语段）产生。符号的非连续性特征，使符号的组合成为可切分的实体，才为系统提供聚合单位具有了可能，才完成符号系统的表意功能。

符号的第二个功能是价值功能。如果说在传播学上符号的第一功能——表意是最重要的，那么在符号学上符号的第二功能——价值才是更重要的。价值不等于意义，索绪尔说，价值来自于“语言各片断的相互位置”，“一个符号包含的观念或声音物质，并没有比该符号周围的其他符号中的东西更重要”[③]。符号的“价值”不在其“构成”，也不在其“意指”，而在其“环境”。符号的价值跟货币的价值很相似，货币自身不具有任何“价值”，货币是印上某种标志性图画和数字的纸，放置一旁时无法体现它的价值，但是当它进入交换——用它来交换等值商品的时候，它的“价值”立刻呈现出来。符号的“价值”也如此，单个符号没有任何价值，它只有指称性意义，但是当它在组合序列里被某些同类型（相同功能的聚合集）的符号所替换时，这个符号的“价值”立刻显现出来。“价值”概念的形成使符号学不再附属于一般心理学，虽然符号的本质是心理实现，但它的系统结构和应用却是人文的和社会的。对于价值的“环境”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符号的组合和聚合序列，一是符号所处的历时和共时的环境。符号在使用中的“价值”通常超出本意，更体现符号的象征性。

每一个符号都有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表达和意义，它们都可双重切分。当符号以能指和所指结合体——意指单位出现，与相邻的符号进行组合，形成符号链（线性的）或符号图（非线性的构架）时，意指单位就是组合单位。符号的组合可以只在能指层面进行，也可以在所指层面进行，但所指的组合总与能指组合混沌为

---

① 王士元. 语言与人类交际[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

②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③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4.

一体。能指组合的是形式，例如书写符号里的字符或言语符号里的音位组合成词，两个无意义的字——构成字符的字素“蜻”和“蜓”，构成“蜻蜓”这个词。所指组合的是意义，例如言语链里语素组成复合词，或词与词组成语义团的短语。例如“鱼”在言语链“我想吃鱼”中，它处于宾语位置。根据“鱼”(c)与“吃”(b)的组合规定限制了它动物性的意指内容，而突显出食物性的意指内容；于是“鱼”进入潜在的聚合——“食物”系列，任何食物性符号都可以替换它。又例如实物实体鱼在宴席上，它与其他食物构成一个组合平面(如果它与食客或餐具组合，则形成另外的平面)——膳食文化，它的食物性意指内容在膳食平面上被压抑，而突显其文化性意指内容；于是实物实体的鱼进入潜在的聚合——珍异性食品(如山珍海味)或象征性食品(如鱼头对着的一方表示贵宾等)系列。

各个组合单位(a、b、c 等等)在符号的组合系统中，又都属于一个潜在的，但可以通过替换显现其“价值”的聚合系统(如图 4-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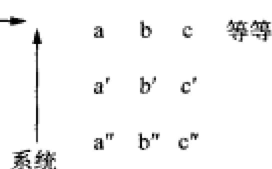


图 4-4

a、b、c 便是一个组合序列，a、a′、a″便是一个聚合集。如果“鱼”进入施事角色的地位(a)，那么在“鱼吃小虾”的符号组合序列中，“鱼”(a)和“吃”(b)的组合规则限制了它食物性的意指内容，而凸显它动物的吞噬性意指内容，于是“鱼”进入到潜在的聚合——“吞噬性动物”系列，任何吞噬性动物符号都可以替换它。可见语言符号“鱼”和实物实体的鱼分别进入符号的传播系统，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意义，而在于不同物化形式的“鱼”在组合和聚合中的地位。化学家用符号原理实践着他们的化学运算，在化学分子式中进行等价替换的化合或分解。现代语言学由此将符号学的和化学分子式运算的“价值”方法引进到语法研究中，通过认知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分析，对语言符号的形式进行分析和计算处理，这种新形成的所谓“配价语法”[①]分析就是某种程度上从这里得到的启发。

---

① 配价语法，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法国语言学家特思尼耶尔(Lucien Tesniere)提出来的。他于 1953 年出版的《结构句法概要》(Esquisse dune syntaxe structu-rale)，就使用了“配价”这一概念。1959 年问世的《结构句法基础》(Elements de syntaxestructurale)则标志着配价语法论的形成。“价”(valence/valency)这一术语借自化学。化学中提出的“价”(亦称“原子化合价”)表示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数目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如水分子式(H_2O)中一个氧原子总是跟两个氢原子化合，所以氧是二价。配价语法学中“价”，表示一个动词能支配多少个名词单位(也称“动作元”)。动词的价就决定于它所支配的动作元的数目。动词可跟多少个动作元(名词)组合，那么它就是几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不能支配任何动作元(名词)，那它就是零价动词(如汉语中的“地震、刮风”就是零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一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一价动词(汉语中的“病、醉、死、咳嗽、游泳”等就是一价动词)；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行动元，那它就是二价动词(汉语中的“爱、吃、参观、讨论”等就是二价动词)，以次类推.

多数科学不会同时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发生联系。天文学基本上属于一门共时性科学，虽然也有斗转星移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实在漫长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地质学基本上属于一门历时性科学，尽管它也相当重视地层的目前状态，但这大多服从于研究其动态变化的需要；历史学无疑是历时性的研究，自然它也有研究断代史的，也关注共时的历史事件；地理学无疑是共时性的研究，自然它也有研究历史地理的，也重视地理的历史变迁。然而只有符号学才可能把历时的和共时的形成如此密切的关联，进入传播的每个符号几乎都存在着历时性和共时性的二重性质。传播符号的这种二重性就是符号的另一“环境”，使传播符号既因为历时的符号比较而获得所指意义，又因为共时的比较而获得能指的替代形式。符号学家巴尔特说：“有一门科学被平等地配置上了共时与历时的二重性，这就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就有别于经济史）。”[①]符号学和经济学都涉及不同事类间的等价关系：符号学上定义的能指和所指，相当于经济学上的劳动与工资。劳动和工资分别指向商品化的产品和产品形式的商品，实现中介的就是“价值”——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能指和所指分别指向意义和现实事象，实现中介的也是“价值”——指称（或叫配比）价值和替换价值。工资形式到手的一张张 100 元的人民币可以“交换”别人的劳动价值（已转化为商品形式）——面包、肥皂或书籍、足球票（足球运动的等价替代物）等，也可与别人的交换价值 10 元、50 元或不同面值的人民币进行等价“比较”。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也有同样的功能，比如一个“词”可以“交换”一个观念（二者不同类），也可以与其他的“词”进行“比较”（二者同类），语言符号“书籍”只有在指称书的群体和与“书”比较的共存关系中才获得价值。

从哲学的维度来研究传播符号，无论是符号的表意还是符号的价值，都处于一个系统的坐标之中。从传播符号的序列性和序列中传播符号的可替换性角度看，符号系统的坐标由横向的毗邻轴和纵向的类属轴组成；从传播符号的组织结构和结构内部各个单位的相互关系看，符号系统由横向的组合关系和纵向的聚合关系构成；从传播符号的发生和它的生命运动角度看，任何符号都存在于横向共时比较的空间轴和纵向历时比较的时间轴构成的系统中；从传播符号在传播活动中的效应角度看，符号系统由横向的实用价值表层面和纵向的功能价值深层面组成一个价值坐标；从传播符号传递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看，符号系统存在于显性的单维线性联结和隐性的多维立体联结两重复合状态中。总之，传播符号系统是一个时间范畴，也是一个空间范畴，是借助于人类的变量思维把握物质世界的一个精神世界存在。

由此可见，任何传播符号都具有双重性功能，而且也只有在这双重性功能中体

---

①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8：46.

现与现实联结的意义和价值。

4.3 符号的接合性功能

传播符号的组合情况与语言符号的组合不完全相同。语言符号的组合只能在一个层面进行，它表现为一种排列，具有空间上的延展性，而且在语言符号被分节处理的同时只允许沿着线性延展；若干个要素的发音不能同时进行，只能分级组合，不可逆转。试看下面的一段话语中语言符号组合处理的模式：

(1) 分节处理　　他|们|两|个|每|天|晚|上|看|一|部|新|出|的|电|影。
(2)线性组合—1　　他们 |两个 |每天 |晚上 |看|一部 |新出的 |电影。
—2　　他们两个 |每天晚上 |看|一部 |新出的电影。
—3　　他们两个 |每天晚上 |看|一部新出的电影。

言语链的组合必须以人们大脑中已有的心理印迹和储存的符号联结(属于记忆系列的词库知识)为基础，实际上只根据要素在场的关系相联结，并与符号的接收同步进行。尽管在意指联结上可能会跨越线性序列，但这已经属于内部语言的过程了。有时也会出现组合与接收不同步的情况，即语言符号在按时间轴出现时，临近符号的组合与意指要求不相合，便进行反馈组合。例如：

(1)分节处理　　他|住|进|了|新|的|学|生|的|宿|舍。
(2)线性组合—1　　他|住进 |了|新的 |学生的 |宿舍。
—2　　他|住进了 |新的学生的 |宿舍。
(3)反馈组合—2′　　他|住进了 |新的 |学生的宿舍。

原先的组合(—2)是“新(的)学生的宿舍”，经过反馈以符合现实事象，组合成“新的学生(的)宿舍”。反馈组合是以“环境”为比较的，根据意指与现实事象的关联性来决定；同时也牵涉到内部语言的操作。这就是符号的接合功能。把涉及语义的组合称为接合，是考虑到在场要素的组合，不一定直接地按时间轴表现的先后进行，它常常有层级地在意指参与下展开，因为“时间”在这里可以忽略不计，几乎不起关键影响作用，大脑对符号的分析是瞬间完成的事，根本不容人去深思熟虑。

我们把传播符号在能指层面两个毗邻符号间的联结叫组合，在意指层面两个毗邻的或跨越的符号间的联结叫接合。传播符号的接合功能，特别是一般非语言传播符号的接合功能更表现在联想层面。联想则是各要素以不在场的要素的关系

相联结，与组合层面的联结不同，它实际上是对符号进行意指的分类。例如汉语的“终生”一词，从意义上可以与“一生”和“一辈子”、“毕生”等相联系，从声音上(zhōngshēng)则可与“钟声”、“中声”和“中生”等相联系，甚至因为语音的模糊与“终身”、“众生”、“众神”等也有了联系。例如一个言语链“他吃了我的象”，由于“象”的意指(动物大象)很难与“我”及与“吃”发生接合，于是引发组合联想——“象”从声音和意义与象棋中的一个子“象”进行二重联结。可见每个集合构成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大脑中的词库)，与组合层面相反，各要素以不在场的关系相联结。如果是非语言符号的传播活动，其联想层面将更其活跃。比如一个实物实体的广告符号“床”(其能指性层面是一个各种形态和风格的床的集)，“床”的直接意指是卧具，布置于某一相对封闭空间时，可以供人睡眠使用。而在含蓄意指或互动意指过程中，由隐喻和主体“环境”引发的联想层面，则可以唤起许多的联系：物质性的有多样式床上用品的布置，生活性的有不同家具在同一空间的格局，行为性的有床与人的各种可能形成的关系。联想层面可以产生许多“非自然化”的组合环境，比如实体事物的床担当能指，放在家具店里它显示的是商品功能，放在家庭中显示的是实用功能；而且不同组合也会引发“非自然化”联想，比如床跟病人组合便是“病床”，跟死人组合便是“灵床”，跟产妇组合便是“产床”，跟新婚的男女组合便是“婚床”等等。隐喻性联想还能产生新的组合，构成不是床的“床”符号序列，如“牙床、车床、河床、矿床、苗床”等。各种联想层面还可以产生一系列潜在的交换符号。联想层面的替换关系在语言符号中更合适的术语叫“聚合”，在传播符号中也可称之为“系统”，它通常带有“隐喻”的性质。

有的传播符号产生的联想经常反复出现，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联结，例如镰刀和锤子的组合，最初的第一联结就是不同生产工具的结合，经过隐喻联想联结到该工具的使用者——工人和农民的组合，再次出现在旗子上作为某一特定标志性符号时，就有了工农联盟政治制度的联想，接着不断反复使用，反复呈现，它终于成为一种政党的标志和信仰的象征。至少在现代中国人的意念里谁也不会产生其他联想。有的符号骤然出现，其隐喻性存在很大变量，如何把握传播符号的变量思维，深化传播符号的隐喻意义(即含蓄意指)，既是符号设计者的任务，也是符号解读者的任务，这往往牵涉到社会习俗、生活理念和民族情感，以及跨学科的综合知识、传受双方的共同认知和综合文化素养等。

为了掌握联想的规律，我们从传播符号学分析的操作过程把“联想”分为两类：一类是组合联想，一类是交换联想。前者相当于修辞学的借代或换喻(包括谐音双关)，后者相当于修辞学中的隐喻。组合和联想的关系十分密切，索绪尔把组合单位比喻作古建筑的柱子，这根柱子与该建筑其他部分(如横梁等)有着真实的毗邻关系(组合关系)；但如果这根柱子是多利安式的，它会唤起同其他式样(如爱奥尼

亚式或考林辛式)的柱子的比较,这就产生潜在的替代关系(联想关系)。比如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60余米的塔楼后面是一座高达90米的尖塔,高高的尖顶直刺云霄,这种组合给人以凌驾一切的感觉,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广袤的苍天,引发人们对上帝的敬畏、崇拜和对天堂的憧憬。在组合关系的联想中,组合单位可以实行替换(只要不跨越自身的同类)而不会产生新的语义。讲堂的尖顶可以有高有低,不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价值。但是如果把尖顶替换成圆顶或方顶,天主教堂就会“变”成伊斯兰教堂或佛教神殿。组合联想和交换联想的变化,造成意义和价值的变化。交换关系的联想中,将充分调动大脑中潜在的记忆库,使符号的意指联结越过在场要素的制约。一些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的文学作品、超现实作品和意识流诗、抽象派绘画、淡入淡出的电影迭合镜头、弗洛伊德式的梦解、非实体的线条广告,等等,都属于此。在交换关系的联想中,交换单位常常要借助元语言进行分析,而研究者所用元语言本身就具有隐喻性质,故而元语言在这里与对象的隐喻性质相同,运用时要比分析借代或换喻更“理直气壮”,也因此更具有联想性、艺术性和人文性。

我们还必须承认,社会文化对传播符号组合联想和交换联想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有着历史的、持久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著名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其中“冰”和“心”的组合以及与“玉壶”的再组合所引发的联想,传达出真诚朴实的情感和纯净的思想。但是在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西方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把一颗“冰”冷的“心”放进冰冷的“玉壶”里,怎么能产生如此热烈的激情呢?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红楼梦》由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翻译成英文版,由于语码转换上的困惑,他故意回避了“红楼”,取了《红楼梦》的另一个名称《石头记》而翻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的故事),还把“怡红公子”贾宝玉译写成Green boy(绿色公子)。英文和中文是非同构的语言符号,语码非同构转换往往会出现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或误解,例如在霍克斯的翻译里就明显反映出中西文化对语符“红”的不同联想。

我们知道,现代的年轻人非常热衷于玩网络情爱的符号游戏,煞费苦心地进行情书的编织、网络聊天的符号设计、浪漫玫瑰的符号身价、钻戒在手指上的魔术变形、绵绵情话和被吻的非自然符号替代、婚礼上烦琐细节的极度形式化,等等,都充满着深层文化的联想。传播符号意指的接合功能在非语言形式的体态“语言”,如目视行为、面部表情、衣着装饰、礼仪姿势和空间处理方面的联想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两个交谈者或合作行动的共事者,由于社会习俗的文化约定,也会因空间距离的细微变化引起多种可能的特定联想:谈话双方的距离如果在18英寸至4英尺是“个人距离”,从直面接触(包括身体接触)至18英寸左右可称为“亲密距离”;一个家庭主妇与请来的修理工谈话大致在4英尺左右,较为正式的社交或商

务洽谈为10英尺左右，而12英尺以上的交谈则可称为“公众距离”①。一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言语交谈的空间距离比较小，同性接触要比异性接触的空间距离近。当两个人的交谈距离为零时，可称为“性爱距离”。说明在人际传播活动中，空间距离也是一种符号，一种作为传播情景的符号，一种表示双方关系亲密度的符号，它们也具有意指功能，也会参加到传播符号其他形式的意指接合中。

在某些传播过程中，包括服饰在内的非语言符号（系统）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的话语体系来传达信息。但是在更多情况下，非语言符号跟交谈距离的空间符号类似是作为传播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补充、替代、强调、否定、重复和调节语言符号的意义②。其实所有的传播都是语言传播和非语言传播结合的复合符号文本，根据有关调查发现，在人际传播中人们获取的信息只有35%是语言符号传播的，而其余的65%的信息是非语言符号传播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单一符号文本还是复合符号文本，所有传播符号系统——包括服饰符号系统、身势符号系统、橱窗符号系统、膳食符号系统、艺术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等——都必须符合统一的编码规则、服务于统一的传播目标，否则传播工具就会蜕变为干扰因素。特别是服饰符号，罗兰·巴尔特曾说：“时装是系统，这个系统通过变化服装，赋予细节以意义，以及建立在服装的某些方面和尘世的活动之间的纽带而创造出意义。”③罗兰·巴尔特率先把元语言符号引入非语言符号领域进行阐释，为传播符号学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元语言符号阐释，实际就是对传播符号意指接合功能的开发，它不仅适用于研究非语言符号（包括服饰符号等）之间的内在关系，还特别关注非语言传播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在传播情景中的意义显现。

因此，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在意指接合时，一切传播符号文本都是一个多维空间，我们必须走出狭小的个人意图小天地，而从复杂的文化网络中去把握各种文本（单一的或复合的）的意义。在能指—所指的意义接合是符号表意的第一层次的意义，是传播符号直接意指的接合，它属于“所指意义”。而这个层次的意义又转化为第二符号系统的能指时，就会产生新的所指。新的所指跟新符号的能指没有直接的意义上的联系，而产生由隐喻引出的第二层次意义——“内涵意义”，它是意识形态运作创造的意义，是意指接合的产物。比如前例举到的“床”，当它以实体事物的符号出现时，其所指意义是直接获得的，表示生活用品的卧具；作为符号形态的床本身并没有完全失去使用功能。当它以语言或文字的符号形式进入传播时，“床”这个符号只是一种语音或字形，失去实体事物的意义和价值，但是

① 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② 杨洁.服饰符号的传播学阐释[J]海南：海南电大学报，2005(1).

③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它仍然充分地代表现实生活中的实体事物——床，却已排除涉及床这一实体的所有外形特征，再也不是某一只具体的床，而是一只抽象意义上的不能使用、不能睡卧的“概念床”。说到更远，床在中国古代不用“床”这个语符来表示，而叫“榻”。“床”的真正含义是指椅子，《世说新语·容止》中有一段记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文中的“床”便是指椅子。古代皇帝坐的宽大有扶手的椅子被称为“龙床”。现在人们已经读不懂“床”的第一意义了，因为符号在传播随着意指的逐层接合，意指意义跟原始意义的距离越来越远，从第一符号系统移植进第二符号系统，如此不断，意指的内涵也就越来越丰富。随着传播符号的意指接合，在隐喻作用下，“概念床”进一步被符号化，又附加了许多实体床所没有的属性。于是，引申出新的意指，形成新的意指接合，呈现新的所指意义，并进入新的组合序列，构成“牙床”、“河床”、“矿床”、“苗床”、“车床”等跟本来的床全然没有联系的“床”，于是“床”的意义越来越远离功能符号的直接意指。即使是实体事物的床也有它的传播意义，它跟一些有配列组合关系的非语言符号共现时，床的样式和存在方式构成中国床文化的能指，其所指反映出中国床文化的内涵。

4.4 符号的替换性功能

类似于“服装”这种功能符号的概念在非语言形式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再仅仅是语言或言语的语词符号，在它所表达的实体层面上与语言学符号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这种源于实用的实体被用来作为意指的非语言符号有很强的衍义性：衣服用于蔽体或装饰，食物用于果腹或营养，牛马用于耕作或战事或娱乐，它们被实用也被用来表达意义。广义地说，语言符号也有实用和表意的双重作用，实用表现在它可以“制造”作品，表意表现在可以指称事物、实现交际。实用是一种文化传播符号，意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它们只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面的表现。这犹如经济学上分析生产形态一样，人类的生产行为包含着二重属性：人类投身生产劳动，一是生产出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产品，既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使用价值）；一是生产出可以进入社会交换系统的商品，也同时获得归属于自己的等价物（价值）。传播符号一旦进入信息传播系统，也同样具有二重属性的价值：一是由符号的“实用”转化而来的替换价值，一是由符号的“意义”转化而来的指称价值。

这里着重分析功能符号（即产生于实用并被实用合理化了的符号）的替换性功能。我们通常所见的传播符号往往是一个复合符号系统：一个实物传播的符号系

统，前引用的一只被切开了皮的皮鞋的广告体，同时被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系统的替换）所替换，如标注上"绝对真皮"。在这情况下，我们既面对一个书写组合（言语链）又面对一个该书写符号系统所指称的实物组合（属于皮鞋实体的真正的牛皮），两类组合的单位不一定完全吻合，实物组合的单位在书写系统的组合中部分地可因环境因素而隐去（如"皮鞋"和"被切开"，在言语链里不再出现），部分可由书写单位的集合来承载（如"真皮"是"真的皮"的缩略，与"切开的皮"等值，可以在意指层面替换）。这个"绝对真皮"广告传播的实体符号，——由于皮鞋已被切开，且有橱窗的环境配合，其实用性的其他意义被排除，单一地指称皮质，以激发受播者——即消费者的感情认同和购买欲望，提高商品的价值。这一实例的"替换"操作比较容易。但是，大多数功能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其组合情况较复杂，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各个组合单位是混合式的，至少包括一个意义载体的变体，或者某种程度上还有"不规则"系统的掺和，那时"替换"操作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知道传播符号的组合有一定的排列和配置规则，语言中的语符，书写中的字符，绘画中的线条，菜单里的菜肴，服饰里的衣服，公路边的交通信号等等，都与某种限定的条件相关联。符号的组合一方面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是被规定的。凡是能引发联想的自由组合，必须服从逻辑的监视，并遵守如下的规则：

（1）二元性。传播符号的组合总是沿着毗邻轴展开，在邻近的两个要素间进行，并互为限定关系。每个符号都必须属于一定的聚合集，在组合的功能上具有相对应的一致性。比如实体事物符号的床的空间组合必须限定为跟相对封闭的空间组合，如果把床放在露天场合，那么它的睡卧功能就大大减弱，因为开放空间跟床之间是一种不良组合。又如语言符号"鱼"的空间组合，必须是与客体事象鱼有关的生存空间"江、河、海、塘"等，组合成"塘鱼"或"鱼塘"等；或者是它作为食物出现的限定场所"厨房、盆盘"等，组合成"鱼盆"或"一盆鱼"等。也就是说，传播符号组合的二元之间是相互限定，有条件的。

（2）蕴涵性。组合的二元必有一个以另一个为存在条件；或互为存在条件。所谓蕴涵，就是在组合关系的 AB 两符号的所指意义中，A 符号的内涵意义中包含有 B 符号的部分内涵意义，或 B 符号的内涵意义中包含 A 符号的部分内涵意义，即 $A \cup B$ 或 $B \cup A$（$\cup$表示蕴涵）。例如动作符号"睡"就蕴涵着组合对象符号"床"的卧具（可供睡眠）特征；客体名物符号"窗"就蕴涵着组合的动作符号具有可开启和闭合的特征，组合成"开窗"或"关窗"等。

（3）联想性。当组合的二元没有任何蕴涵关系，联想起主导作用。这里的联想作用是指符号在进入组合关系时，并不是以它的直接意指进入符号角色，而是通过隐喻将它的含蓄意指移植到新符号的组合关系中，即 $E_1RC_1 \rightarrow E_2RC_2$。例如在

一幅宣传画出现数字符号“9·11”和美国纽约世贸废墟的非理据组合，高耸的“9·11”象征双子塔形象，这时数字符号具有了联想性意义。

(4) 重复性。符号允许在一定间距内重复，保证有限符号发挥最大的信息传递作用。如果一组传播符号串全部是不相同的符号，必然会增加受播者解读中记忆上的难度；如果所有客体事象都用不同的符号来标记，那么数以亿万计的事物将不得不采用无穷尽的符号，必然造成信息传播的赘余和纷扰。因此，符号组合不仅允许一段话语链出现一定量的有间隔的重复，有时符号紧挨重复，成为符号复叠组合以传递新信息的手段，例如现代汉语里就大量存在数词重叠（一一、万万等）、量词重叠（个个、层层等）、动词重叠（看看、试试等）、形容词重叠（好好、高高兴兴等）使用的情况，它们起着加深意义内涵、丰富表达、活泼节律的作用。

在没有连续的符号间也适合上述规则，例如在交通符号系统里，两项要素（红绿灯）表面上被无意义的惰性空间长距离（街道或路段）隔开。这时惰性空间便临时充当中介项，它的长度和宽度辅助两项要素的组合；言语段中经常会出现停顿，停顿也可以承担语义信息并进人组合中介（如言语中的话题停顿，书写中的破折号等）。这些规则使功能符号的“替换”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每次替换都只能在组合层面进行。

符号的替换功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同义替换，一类是对比替换。“替换”就是在符号的表达层面人为地造成一种改变，将组合关系中的一项或两项用另一种形式的符号来替代。这种只是两种能指的互相替换，以创建一种不改变原先组合的任意的同构关系。例如：

	首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① 原组合序列：	李丽	装扮	得	很美丽
被替换序列：	小李	化装	得	十分漂亮
	阿丽	装饰	得	极其靓丽
	小丽	打扮	得	非常好看
② 原组合序列：	她	离开	我	走了
被替换序列：	我	送	她	离开了
	你	带	他	走了
	他	向	你	靠近了

虽然上述言语符号序列的替换并没有引起结构的变化，都属于同构替换，但是符号序列的内部关系是不同的。①序列在替换后，新的组合在能指层面的某些改变不引起所指层面在严格意义上的相应变化，就叫“同义替换”。②序列在能指层面的

替换引起了所指层面的变化，就叫“对比替换”。

“同义替换”不引发新的语义，但是它能使符号在能指层面的表达形式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通过视听刺激人的感官。它虽然仅仅改变了表达形式，并没有改变内容，创建了一个原符列的镜像，但在传播中也能发挥“言外信息”的作用。这在语言学上称“话语换说”，在文艺学上称“主题同现”。

“对比替换”则不同，它可以造成符号意义的变化。对比替换首先针对能指层面，因为它的直接行为是在原符列的能指层面进行组合切分，然后对组合成分——某项要素进行替换。例如上引②言语符号序列中，首项和第三项用人称代词进行替换，使传播者和受播者的话语角色发生了变化；第二项和第四项用传递不同方向的动作符号进行替换，就使话语空间的“向”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第四项替换里，尽管“走”跟“离开”近义，但是动作的参照点改变了；尽管“来”跟“靠近”的方向感一样，但是距离感产生了改变。

所以任何替换即使多项意义有相同之处，但还是会在表达中得到一种改变。这种概念表层体现为能指符号的形式改变，实际上意指的蕴涵意义也会发生改变。这一方面，非语言形式的传播中更明显。如功能符号的“家具”序列，要是把书桌放到餐厅中替换餐桌，书桌或餐厅的实用功能便发生改变，或者书桌成了餐桌，或者餐厅成了书房。对比替换也有针对所指层面的情况，但通常也只是纯形式的。因为在功能符号系统中，所指本身没有被“实物实体”直接涉及，它是被能指的指示者(或传播者，或受播者)所指示，所以它只是给能指定位，并不给予能指以意义。“雨伞”(原来是与雨天组合的)在大太阳下很可能传递的所指就是“阳伞”(并不排除它的所指仍作“雨伞”，这是指示者为下雨而作的暗示)。谁能断定裙子与裤衩的替换就不是所指的一种改变？谁又确切地肯定把木床替换成水床就是一种所指转换成另一种呢？在功能符号的替换中，常常可能接触到一些意义不确定或意义未知的系统，传播者对该符号组合功能的使用和表达，与受播者对该符号的分析和理解，不一定相符合；操作时进行的替换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造成所指的分化。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传播，因此传播学家利用符号学上的成就往往为受播者提供中介机制(例如广告杂志或服饰专著等)，或者用元语言系统(书写说明或口语解释)提供进行替换所需的所指。

传播符号的原型一般说它的所指意义是显性的，是通过直接意指来实现的。例如本章4.1节图4-1所引“9·11”新闻照片，其实时效果特别强，直接所指的意义也特别明显，但是，当耸立的世界贸易中心大楼被绘画方式的能指所替换，它的实时新闻价值就消失了，所指的直接意义也改变了。正在起火的大楼跟无数遇难者头像的组合，便产生极其深刻的隐喻意义。非语言传播的能指替换已构成所指的彻底变化。新的符号组合必须用新的解读方式来阐释，其中随着能指替换而产

生的多义变得完全意识形态化，在解读中将融入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其新闻价值转化为政治价值，图 4-1 不明原因的“9・11”事件，在图 4-2 里“9・11”成为震撼世界的严重的恐怖事件，符号的意指转化为对恐怖主义的控诉，转化成反恐斗争的呼唤。图片只能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形势下强调解读方案。这说明，传播符号的替换，将造成解读方案的重新思考和选择。

所以，“替换”既是传播符号的功能，也是传播符号学的方法论研究，是一种传播符号的操作技术。“替换”能显示出符号在组合序列中的所指，并使之有明确的定位。“替换”帮助我们逐步划分构成组合的意义单位，实际上在对符号进行基本切分，把线性的或平面的或立体的组合分解成每两项组合的离散单位，这样在替换过程中也就为聚合单位的分类做了操作上的准备。“替换”必须在符号的同构关系中进行，就是说替换在结构上并不破坏原组合符号的结构，以此保证替换的成分与被替换的成分属于聚合关系的集。另外，对于传播符号系统中一些特殊的组合——零组合或空寂组合，即由一个符号构成的独立意义单位，如汉语话语里的“独词句”、广告语言里的单一实物实体等；或中间出现长距离间隔的交通符号、言语中有较长停顿的语符等，我们应把它们放在“环境”里进行考察，并把它们看作是对一个“零”(无声的，或无实体的)的组合(语言学中称为“空语类”组合)，于是“替换”操作实际上成了“填空”操作。



第5章　传播符号的结构系统

5.1　传播符号结构的系统性

现代传播符号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虽然我们着重分析和研究符号的结构形式，但其内涵几乎涉及人类的所有知识领域。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是传播符号：当客体E通过一种假设联系来表示另一个对象C时，E就成为能指的符号。C就是符号的所指。符号的所指可以是具体的客观事象（事物或事态），也可以是具体的心理状态，也可以是另一个表达系统的符号。语言中的词语符号，形式上是一个声音单位（或声音单位的组合），但在使用者心目中却存在着现实的对应，无论对应着它们的内涵还是外延，是实物事象还是抽象物印象，都有所指。因而语言中的词语是典型的传播符号。自然界的生物现象和非生物现象，从人和动物的表意行为（说话、发声和行动）到各种自然现象（天体现象和地理现象），都可以从符号现象即此物有意或无意涉及彼物的角度去观察，去描述和解释；这就构成了传播符号学的广大研究领域。

以传播符号作为对象研究的学科都有某种基本相似点。传播符号学与语言学有十分相似之处，传播符号学研究一切跟传播符号及传播符号的关系和功能有关的现象，语言学研究言语传播中一切跟语言单位（语素、词、短语、句子等）及语言单位的关系和功能有关的现象。传播符号学与数学也十分相似，数学研究一切跟运算的基本单位（点、线、形、数，运算和规则等，仿佛就是传播符号学的"算子"和关系——符号元素和组合聚合）及其关系和功能有关的现象。语言学、数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研究对象——语言中音位、语素、词、句、语法等，数学中的点、线、形、数、运算及规则等，从客体中离析出来，加以抽象研究。语言学和数学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传播符号学也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手段。有人这样从传播符号与人的关系来定义"人"："人所特有的、能将人和别的事物截然分开的独特的行为，就是在思想和语言中创造符号宇宙的能力。除了直接满足生物需要之外，人不是生活在事物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①]足见传播符号学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是一个系统，它不管个别符号的具体所指，就像语言学不管单个语言单位的形式和意义，数学不管单条线或单个形的存在方式。任何个体符

① [奥]冯·贝塔朗菲，[美] A·拉威奥莱特. 人的系统观[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号只有在系统（组合和聚合）中才具有存在的价值，才获得意义。传播符号作为一个系统，它的第一个任务是把对对象——连续体形式的现实世界的一切本体——的成分离析成离散符号，即把客体事象从混沌的自然界和社会中切分出来，进行符号化，研究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同一关系，以及它们可能采取的组合方式。由于传播符号学的对象并不都似言语那样具有现成的离散符号，而是包含着多维的构形，例如立体构形的雕塑品、建筑物等，平面构形的绘画、书法等，以及离散符号的扩展构形——小说、戏剧、电影、舞蹈等文学和艺术作品，还有跟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装饰、广告传媒、人体造型、服装设计等，那么传播符号学就要通过变换的方式使多维的传播形态进行切分，逐步降低它们的维度，最终使它们变成线性排列方式，再用第一符号系统——语言学的、数学的或元语言的方式给以描写和处理。这就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任务，传播符号学深入到广大的研究领域时，由于具体对象本身性质的差异和能指形式的多样，除了必须将对象符号化外，还必须采用把对象语言化或数学化的方法。

传播符号系统有几个基本构成和基本规则。传播符号的元素物质是构成符号的符素，符素在语言符号系统里是音素（包括音位和音节），在书写符号系统里是字素（笔画、部件和记号），在非语言符号里是物质实体的形素（点、线、面、形、体和质、量），这已经是被高度抽象化的“元语言”符号单位。所有传播符号都有形式和内容、能指和所指两重性，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象，所指是符号的心理意象——构成意义。符号和符号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非连续系列中的邻近二元的搭配是组合关系，组合关系二元中的某一项可以被替换的集是聚合关系。传播符号系统有符素、符号和关系三大要素；符素构成符号，符号形成关系，关系实现功能。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构成统一体的意指系统，意指系统可以移植和延伸到另一系统的符号——成为符号的符号；我们把符号的符号称为元语言，因为它与自然语言非常接近，也称为符号的第二系统。初始的符号系统（E/C）称为第一系统。第一系统的意指充当第二系统的能指时，构成符号的外延系统；第一系统的意指充当第二系统的所指时，构成符号的内涵系统，这时第二系统就成为元语言。符号与符号的组合在涉及意义时称为“接合”，当组合关系越过能指形式而跃迁到所指，则根据符号组合要素在场还是不在场，分为组合联想和交换联想，前者相当于修辞学的换喻，后者相当于修辞学的隐喻。这些都是符号学需要分析和研究的内容。

分节符号的组合联想层和交换联想层存在于各种类型的意指系统中，因切分操作产生的组合单位和分类产生的对应系列，虽然不能先验地被界定，但是依据对比替换的检验规则，我们毕竟可以指出某些符号系统的组合层面和聚合层面。在组合层面处于组合关系的组合单位，以及聚合层面处于聚合关系的聚合单位，我们在接受携带信息的传播符号时几乎就能利用大脑中的记忆库在分析前加以预先规

定，但是我们不必心急。只要沿着传播符号的两轴——毗邻轴和类属轴（对于多维的符号结构体可以先进行降维处理）一边按组合关系切分，一边按替换成分分类。正是组合切分提供了在聚合中需要分类的单位，因此当我们在分析传播符号结构的时候就不难列出任何符号系统的组合和聚合表，如同下面举例的表一样（见表5-1）。对于传播系统中一些未知的符号系列，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记忆库知识和经验，从识别聚合的要素出发，在组合之前先分析聚合关系。我们必须承认，传播符号学研究的立足点不能仅仅依靠现实世界实象的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更重要的是符号自身发展中的历史过程，以及传播者和受播者心理过程的经验积累。记忆库的容量越大，对系统的掌握能力就越强。这里并无贬低"实践"的意思，只是想强调传播符号学从本质上说是历史的经验成果和现时心智的训练产物，从而也能够说明为什么语言、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形式常超越它们的每个创造者个人的品格和寿命，而获得相对独立的永恒的存在。

传播符号学的系统研究不是为研究符号而研究符号，传播符号学不仅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方法和理论，同时要研究符号所传播的意义和信息，从而为整个人类的认知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总结和推导，以形成新的知识。单个传播符号出现时，其意义相对来说是贫乏的，不可能提供更多的内容。而众多传播符号的组合序列，则不是符号单个意义的简单相加的总和。常识也会提示我们，熊＋猫≠熊猫，小＋熊猫≠小熊猫；我国古代哲人提出的"白马非马"就告诉我们"白＋马≠白马"。古代名家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理论，看似是诡辩术，其实正符合传播符号学的一般原理。显然，符号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算法"；一个符合预先指定好规则的传播符号系统，就是一种高超的算法。于是每个传播符号不纯粹按自身狭隘的意象进人系统，在"算法"控制下构成系统的传播符号就能得出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至今尚未清楚的事实和关系，便能帮助人类去控制至今还不了解的组合之物、自然之力。正如语言（文字）符号在"语法"控制下像魔法一样，可以形成从未说过的话（写出超现实的作品）——使用思维符号的结果必将超出"实践"的结果而达到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

这里我们暂时借用中国诗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汉语里有相当精到的词语刻画了"意"和"象"的关系：寓情于景、以景托情、情景交融等。人类的语言利用传播符号的组合功能和内部规则，发动心灵的意念，引发无限丰富的联想，就是一个观察、感受、酝酿、表达的过程，是对生活的再现—表现的过程。文学传播者对外界的事物心有所感，便将之寄托给一个所选定的具象，使之融人自己的某种情感和愿望，并制造出一个特定的艺术符号序列。这个具有传播者"意象"的符号序列在受播者那里根据这个艺术符号

在内心进行解读，便是二次创作，在还原原符号所反映的现实事象和传播者的心灵意象的同时，渗透入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于是，在传播者一方是由“象”到“意”并转化为具有“意象”的艺术符号——作品。到了受播者手里，形象的艺术符号被还原成形象的“意象”——已融入受播者的心灵感受，形成新的“意象”。这样，意象的结果必将是结果的意象。如果把传播符号的能指称为“象”，那么传播符号的所指就是“意”，符号系统的中介项“意指”可以称之为“意象”。有意思的是，符号是人类的独特创造，而符号一经形成系统就不再受人类支配，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并在传播中不断演化，不断增值。人们通过符号寄托“意象”，创造“意象”，传播“意象”。“意象”的意义远远超出传播符号所指能够提供的直接意义，它更加含蓄，更加具有互动能力。所以符号学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研究符号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符号的意义和意义的表达方式，以及意义与现实事象联结的方式和联结规则，从而揭示符号的“意象”效应。

表 5-1 是符号系统组合单位和聚合单位举例表[1]，表中“聚合”原标作“系统”，为避免与符号整体的系统概念混淆，改用“聚合”。表中展示了传播符号的运作方式，揭示传播符号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方式，以及意指的作用和意指意义（意象）的形成过程。

表 5-1

<table>
<tr><th></th><th>聚合</th><th>组合</th></tr>
<tr><td>服装</td><td>在身体的同一部位不能同时穿用的衣服、附件与细部的集合，其变动选择对应于服饰意义的改变：如无边女帽、窄边女帽、宽边女帽等</td><td>同一套服装中不同部分的并列：如裙子、衬衫、外套</td></tr>
<tr><td rowspan="2">膳食</td><td>相似与不相似食物的集合，根据某种意义选择其中的一道菜，如各式各样的头盘、正菜或甜点</td><td>用餐时实际选择的菜肴搭配系列，即菜单</td></tr>
<tr><td colspan="2">餐馆中的“菜单”体现出两个层面：菜单的横向阅读（如选正菜）与系统相符，菜单的纵向阅读则与组合相符</td></tr>
<tr><td>家具</td><td>同一种家具（如一张床）的不同“风格”的集合</td><td>不同家具在同一空间的并置（如床、衣橱、桌子等）</td></tr>
<tr><td>建筑</td><td>一座建筑的同一组成部分的式样变化，如不同形式的屋顶、阳台、大门等</td><td>各局部在建筑物整体上的衔接</td></tr>
</table>

① 本表摘录自罗兰·巴尔特所著《符号学原理》第 55 页，作者略加改造.

表 5-1 中的"服装"、"膳食"、"家具"和"建筑"代表某一种实物事象的符号系统，它们内部配列分别通过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显示。例如"服装"符号系统中，"无边女帽、窄边女帽、宽边女帽"等是一个聚合集，它们之间允许互相替换；它们又与"裙子、衬衫、外套"等形成并列的符号群，两者之间可以跟任何一组构成组合关系。

这个表的表述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传播符号的"组合"并不只能在各自的"集"内组合，它们完全可能更多的是跨"集"的组合。所以，我们不妨把"系统"(聚合集)内的组合称为"配列"，把不同"系统"间的符号在意指上的接合称为"组合"。例如表 5-1 所列"家具"项的组合列"床、衣橱、桌子"等，不妨叫作"配列"。在传播符号的传播运动中，"配列"和"组合"的意义效果是很不相同的，"配列"一般不生成"言外之意"，其所指的内涵都是直接意指；"组合"通常产生在传播符号中隐含的意义，超越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直接意指而形成含蓄意指或互动意指。例如在房间里放上床、桌子和椅子等，形成一个室内的符号"配列"，显得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在床上、桌子上、椅子上都出现了服装的"组合"，就产生一种非直接的意指——表示房间杂乱，房间的主人生活很散漫。餐桌上或餐厅里出现菜单是很正常的"配列"，不会引起受播者别的联想，但是突然出现了裸体的食客，"裸体食客"跟"菜单"的组合，则很快会生成非常规的联想。据媒体报道，在美国纽约出现一家以"着装随意"为主题的餐厅，餐厅内的用餐者大多裸体用餐(如图 5-1 所示)。食物是人们共同的需要，它跟衣着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常生活经验中，用餐者在公共场合总有一定的穿着，"衣着"和"用餐"并无自然的符号学联系，但是穿着服装用餐却是常识。然而在这家餐厅里用餐的人们，似乎更注重用餐的地点而忽视衣着的必要性。于是，形成一个新的传播符号——裸餐。由于"裸体"和"用餐"之间的非同类功能集的"组合"，便生成了独特的具有隐喻性的意指，引发人们人文性的联想。这种"联想"又使"裸餐"出现新的意指，产生新的意义：在裸体处女身上安放"菜



图 5-1



图 5-2

单”，供食客用餐(如图 5-2 所示)。从裸体用餐的意义转化为用裸体处女身上的餐，是传播符号意指的再次移植。“裸餐”这一传播符号意义的分化和转移，也反映了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异化，它一方面显示人们在刻意追求人性的开放，表达回归自然的愿望；另一方面显示人们正在冲击现代文明，以破坏公共道德的行为来亵渎人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也更深刻说明，传播符号是社会文化面貌的最真实的写照，它是现实事象的最概括反映。

5.2 符号的非连续性

符号具有非连续性特征，这是符号组合的条件，也是符号切分操作的基础。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该特征表现为线性流程上的一个个声音。对于汉语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实，因为汉语的语音是以音节为单位的，音节与音节之间有明显的间歇，不能连读，一个能指背后有一个所指，即一个音节意味着有一个意义单位；只有极少数是由两个音节或多个音节来表示一个意义单位的，如联绵词、拟声词和外来译音词等。这些纯声音结合的词语几乎凭听觉就能识别。但是对于另一些语言就不那么容易识别了，例如英语的连音给人以语言符号之间致密不可分的感觉，言语的物质形式表现为一个“连续体”，听感上的分节只在一群“词”——短语、分句或整句末了。例如：

(1) I get ‿ up ‿ at ‿ eight ‿ o'clock.

(2) I gat ‿ in the front ‿ of ‿ a bus.

句(1)中只有两处停顿，句 (2) 的停顿还与语言的自然组合不一致。如果用仪器把它们转化为任何一种视觉图谱，这些图谱显示出言语是一个连续的语流。但事实上作为英语的每个语词符号是非连续的，人们可以依据英语的语法——一套事先选择好的术语和规则，对语流中的符号进行分解，切分出一个个离散的单位。这些单位在书写符号系统里得到了明确的暗示，英文采取的分节性书写方式，增加了书面文字符号的可识别性，也正是对言语符号的连续性的一种补偿。十分有意思的是，汉语正好与英语相反，言语层面具有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分节性，而书写层面则具有以字符为基本单位的连续性。汉语在书写系统中不采取分词连写的形式，而是一串话语混沌连写。在古代汉语的历史文献中更是没有作为附加性质的标点符号，通篇连写，人们不得不借助古汉语语法知识对它们进行解读(即符号切分)。但是在汉语口语里，每个语符(词符或短语符)后都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来显示

符号的界域，从而增加了口语符号的可识别性，跟英语口语中的语符连读、界域不清正好完全相反。这也是汉语在传播中对书面文字符号连续性的一种补偿。

从言语现象分析，我们已知组合体以"链接"的形式呈现，意义赖于传播符号的自然分节而显现，在切分能指团（一个组合单位）时同时切分出所指团。对能指的切分就是对所指的理解。从某种意义讲，对言语符号的分解就是对言语符号所反映的现实的分解。如何对传播符号的组合链进行切分，这一问题在一切符号系统的分析中都会出现。有的符号系统非连续性是显现的特征，如交通符号系统的每个符号（红绿灯或交通指示牌）间都有一个分隔区（街道或路段是空间分割，红绿灯闪亮的间隙是时间的分割），每二元的组合根据分隔区（时间的或空间的）的情况而发生变化，以保证符号的能够识别以绝对区分开来，才能充分实现其服务于安全的功能。我们可以把交通符号间的分隔区也当作某种特殊的符号（由于它们不是有形显示的符号，可以称为空寂符号），它与相邻两个交通符号分别形成"零组合"。对显现的非连续符号比较容易处理，有的系统的能指组合链表现为一个连续体，但又不像言语系统和书写系统，对它们的分解操作就有点复杂。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试着把它们先作一个粗略的分类。

（1）一维的动态连续体符号系统。这类系统的符号组合在运动中实现，它们看起来一点没有链接的痕迹，简单的切分简直不可能。例如语言、音乐、舞蹈、电影等就是。舞蹈和电影的符号能指是立体的，但是其组合方式是沿着时间轴展开运动性联结，所以也归为动态连续体符号系统。当然如果细分，那么舞蹈的每个造型又是三维空间的符号，电影的每个画面又是平面展开的二维空间符号。但是，从整个符号运动状态看，都是动态的连续符号按着时间为间隔来切分的。

（2）二维的静态连续体符号系统。这类系统的符号是一个平面的组合集，"集"内的每个组合是不清晰的，但下位的子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如绘画、平面几何图、地图等就是，它们的每个符号元分布在同一个平面的特定位置上，以凝固的静态方式跟相邻的其他符号元进行组合。

（3）多维的空间连续体符号系统。这类系统的符号是一个立体的架构体，每个构件都可能有多种灵活的组合，其表层组合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地二二组合，组合后的构件与整体不可分解。如建筑物、机器、计算机、思维模式等就是，它们的每个符号元就是整体符号系列的有机构件，它们分别以静态方式显现，一般又都具有可变化的特点（建筑物除外），而且各个符号元相邻符号元的组合通常具有不可变异的固定状态。

其实不管哪一种系统都存在着组合，既然有组合就有组合的要素，要素具体表现为连续体的"链"上的符号。有的组合比较紧密（非连续体里的连续成分），是粘合型的组合；有的组合比较松散（连续体里的非连续成分），是离合型组合。前面已

经叙述过“对比替换”这个操作性概念，它是在组合层面的一种检验，能帮助我们从组合中分解出聚合关系的单位。比方说音乐、舞蹈、电影等都能分解成一个个片段：乐音性音符、节奏性动作、情节性镜头；绘画、地图等也可能分解成区别性色彩、构形性线条；建筑物、机器等更能分解成有多维组合能力的构件、有风格或机能特点的形体。总之，符号经过对比替换的分解，将组合的“链”断析出两个属于内涵的部分：一个是原级部分（即意义的载体），一个是区别部分（即能指或所指的变体）。对比替换并不改变组合的关系和结构，但能显示聚合的关系和结构。而聚合总是抓住区别部分，比如服装系统的组合“裙子”具有原级价值，但“长 / 短”因素具有区别价值；家具系统的“桌子”具有原级价值，但“长 / 方 / 圆”因素有区别价值。由于传播符号组合的紧密和松散情况不一，会有某些特例。一般说，在变体中包含区别性，在载体中包含原级性。离合性符号的组合里到处可见，例如以言语传播符号“想”组合的“想念”为原级组合：“想念（望、象、见、通、开等）”，替换符号“念、望、象、见、通、开”等构成的新组合就显示了变体的区别性。但是在粘合性组合里就略有不同，例如用“醒”去替换“睡觉”中的“觉”，“醒”和“觉”的能指虽然不同但其所指本来是相同的，可是“睡醒”（变体）不仅丢失了原级组合（“睡觉”）的价值，还完全改变了原来组合的性质。这是因为原组合具有粘合性，它的组合结构十分紧密以至等同于一个非组合符号。我们在一些艺术作品里发现也有类似的组合，某些艺术符号根本不能替换，一替换就从本质上改变了整个艺术品。因此，即使对比替换是普遍适用的检验方法，也必须注意对系统作经验上和具体操作上的分析。

传播学家艾伦·塞特曾分析过替换规则使用中隐喻产生过程，他精彩地分析了“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天的报道[1]。在内涵的层面上，“航天飞机”作为一个能指，被用来表达一组意识形态的所指，其中包括“科学进步”、“显示人类在太空中的命运”，以及“冷战当中美国比苏联占优势”等。但是 1986 年 1 月 28 日航天飞机发生爆炸，“航天飞机”的内蕴意义被彻底置换了。原级组合中“航天飞机”这一符号原来的内蕴意义因“上天”被“爆炸”替换而使意义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于是内蕴意义处于许多不可预测的个别意义的浮动之中，或处于具有竞争力的意识形态上的解释的争夺之下。“航天飞机”本来的意指就是航天飞机，是一个潜在的非意识形态的内蕴意义。“爆炸”似乎恢复了这一符号的第一系统的意义（符号直接意指的意义），即它是一系列有关这架航天飞机自身问题（设计、材质、功能等）的解释，及其相关问题（地位、用途、生产目的、机组成员技术等）的解释。作为物质客体的符号，我们必须看到“航天飞机”和“上天”是一种自然联结的非语言符号组合，“航天飞机”和“爆炸”是一种非自然状态联结的非语言符号组合。而且“上天”和“爆

---

① 艾伦·塞特. 符号学、结构主义与电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炸”不处在同一个集合上。这架航天飞机因上天而爆炸，一些含蓄意指远超出原级组合的内涵，产生丰富的内蕴意义：把先前的“科学进步”置换为“科学官僚机构对人类的危害”，把“显示人类征服太空”置换为“浪费人的生命”，把“美国比苏联在科技上占优势”置换为“人的生存权利成了技术政治的牺牲品”等。这一新闻传播符号在组合层面的替换，凸显了对比替换操作如何影响着符号意义的生成。

我们需要认识清楚两点。第一点，传播符号只适用于已经被人们认知的客体事象，而且“符号意义只有在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适合于符号——‘符号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绝对意义，这就是说，主体在它之中并没有被抛弃’，主体总是直接存在物，符号在同其他存在物相联系时才有它的存在。”[①]第二点，传播符号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为制造而用于指称世界的标记，符号中渗透人们对客体事象表述和评价的思想。符号与符号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正是人类对世界的概括性分类，符号关系深刻反映着人类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的思想。所以正如卡西尔所言：“我们不能离开映像而思维，也不能离开概念(所指)去直观。‘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关系的思想依赖于符号的思想。”[②]基于这两点，人们运用符号系统去识别客体事物，并用符号去显形客体事物。因而我们要把握事物必先把握符号——尤其是对所指(概念)的把握，并把握符号替换中的意指转移。

对比替换操作中提取的聚合集上的符号，必须既相似又不相似，包含着与被替换单位相同的因素和不同的因素，即能指相同背后的所指不同，或所指相同显现的能指不同。前者如语言符号 xiàng(“象”和“像”)、功能符号“长桌”(办公桌或课桌、餐桌)，后者如言语符号“漂亮”和“美丽”、功能符号“方桌”和“圆桌”(餐桌)。这个操作过程本身体现着人对世界上一些具体事象和特征的注意，话语中词的使用和替换操作中对词的分解，就包含了人对于我们经历过的环境和接触过的事象的组织和切分。人们通过言语的内部符号首先把连续观察到的事象在大脑内部进行分类；一连串现象中看出持续反复出现的同一的东西，给了人们深刻印象，人们给这些纯粹属于感觉上的东西以某种程序，储存进大脑的记忆库。同时又从纯粹感觉的事象中抽象出不属于经验世界的更广泛的概念，形成词语化符号，如时间的“过去—现在—将来；先前—现时—未来”、空间的“上—中—下；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关系的“因—果；偶然—或然—必然”等。这类词语化符号，标志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分类和认知方式，也标志着我们已经给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加上了高度概括的程序和系统。当我们反过来接触外部的符号世界时，我们就调

---

① 转引自汉斯-格奥尔格·伽德默尔. 洪汉鼎译. 真理与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535.

② 恩斯特·卡西尔. 甘阳译.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66，99.

动大脑储存的记忆库中的所有现成单位，包括词、关系、程序和操作规则（有的是经验的，有的是学习来的）。对比替换正是这样从内部转向外部，并应用于传播符号系统。另一方面，传播符号的理解符合理解的传播符号时，人们就根据符号系统中的“环境”对每个符号单位的作用进行归纳：特定的项目、特征、过程和性质，再添加到自己的储存记忆库中。如此循环反复，人类为符号而活，符号为人类而活。符号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生产出无限的知识和财富。

5.3 传播符号的意义和关系

一个符号链的各个邻近组合关系上的要素，因其具有可替换性而分别形成一个与之对应的集合——聚合关系或叫联想场。同构关系下的所有符号的聚合，都在两个方面反映出参与组合的需要，同时在另两个方面体现聚合成分的对应。由于参与组合的需要，聚合成分必定得从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通常以意指的身份出现，发挥组合的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进行了详细阐述。关于“对应”，是指在“类”概念上被替换成相一致的符号。所谓“一致”，是无论在能指层面还是所指层面应有不同，而能够出现于相同位置上。这种“一致”就会造成“类”掩护下的聚合成分的千差万别，不单是指符号个性的差别，更是指与替换符号“对应”关系上的差别。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先以语言学符号的句法事实为例：

老王　　看　　书。
妹妹　　写　　作文。
农民　　种　　田。
革命队伍　　欢呼　　武装斗争胜利。

这些句子表达层面包含的词形不同，内容层面所指意义也不同，但在同样位置上出现的成分的句法功能都相同。如果按某种“一致”关系把它们分别归纳，就可以用“类”的概念来概括具体的词（符号），得出抽象的句子的一般结构式（符号的组合模式）。以现代汉语的言语符号序列最普通规则为例：

$S = N_1 + V + N_2$
句子　名词　动词　名词

这是人们从大量言语生活的经验积累和内部语言运用，归纳出来的规则。这样既发现了言语组合的概括格式，又发现了在相同位置上的可能替换成分（词，也可能

是词组)所具有的某种相同的作用。前者可叫“句法”(规则),后者则是“对应”,或者叫“位置”。在“对应”位置上的是“类”,即聚合。每个聚合下的“对应”大同小异,既有共性(“类”的基础)又有特性(“对应”的再分类)。比如原级动作符号“看、写、批评、欢呼……”等后面都要求带上一个名词成分的语符,我们把这一特性归纳为“及物动词”;反之不能带名词语符的归纳为“不及物动词”。于是在动作符号聚合下分出两个子类,又可以根据“及物动词”后所带名词的多少,再分出小类(如零价动词、一价动词、两价动词、三价动词等);另根据“及物动词”后所带成分的功能特性,再分出不同的小类(如心理动词、行为动词、言说动词等)。随着组合关系的要求,必要时在小类下还能分出细类(如行为动词中分出指令动词、祈使动作、认知动词、体验动词等)。组合研究的深入总是要求聚合方面进行更细密的分类,使符号由切分得出的组合“位置”有相应的“对应”。

在非语言的传播符号中,也存在双重切分,因此也必然有两类最基本的对应关系:能指层面的区别性对应,所指层面的意义性对应。“意义”和“关系”成为传播符号的两大基本属性。由于在一般符号系统中能指的变化也会引起所指的变化(如房子的外形改变,缩小到人无法居住时,直接意指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从能指和所指结合体的意指角度来综合研究。初看对一个意义单位的切分而出现的对应可能不计其数,因为每个能指几乎都可以与其他的能指对应,至于所指的对应更是难以计算。但是如果我们从前面说的每个对应下聚合的“大同小异”关系的类型出发,就能获得一条归类原则,将使“类”的数量大为减缩。例如汉语的词语符号数以千万计,但按其“意义”和“关系”的功能,只有几个有限可分之“类”: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介词、助词、连词、数词、量词、叹词、语气词和拟声词,共 13 类。如果作更大的概括,那么可以分为两大“类”:实词和虚词。

符号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双重指称性,它必须既指称自己的表述——心理印迹,同时指称客体事象,它既给人类思维的结果分类,也给客体事物分类,两者都以“词”的符号形式来表达。这里说的“词”不简单地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基本单位,而是传播符号学中用于指称的基本单位。这里有必要介绍法国心理学家米歇尔·福柯其人和他的代表著作《词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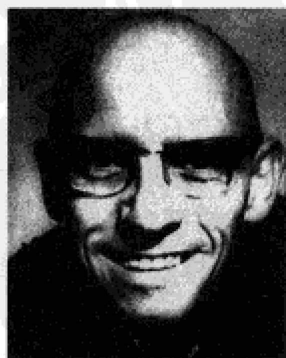


图 5-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法国维艾纳省省会普瓦捷,这是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宁静小城。他父亲是该城一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生,母亲是外科医生的女儿。福柯在普瓦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5 年,他离开家乡前往巴黎参加法国高等师范学校人学考试,并于 1946 年顺利进人高师学习哲学。

1951年通过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后，他在梯也尔基金会资助下做了一年研究工作，1952年受聘为里尔大学助教。早在高师期间，福柯即表现出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极大兴趣，之后在他父母的世交心理学家雅克琳娜·维尔道夫妇的影响下，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学习，并与雅克琳娜一道翻译了瑞士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梦与存在》。书成之后，为法文本草就一篇长度超过正文的序言。1954年，这本罕见的序言长过正文的译作正式出版。同年，福柯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专著《精神病与人格》。他当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法语教师，还兼任法国外交部设立的"法国之家"主任。1958年，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设在华沙大学内的法国文化中心主任，后代行参赞之职，因中了波兰情报部门的"美男计"而离开。1960年2月，福柯在德国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期的疯癫史》，论文长达943页。1961年5月福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也被评为当年哲学学科的最优秀论文，并颁发给作者一枚铜牌。在整个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随着他著作和评论文章的发表而急剧上升。1966年发表了《词与物》，引起极大反响。这本书"旨在测定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从何时开始，作为知识对象的人何时出现。"[①]福柯使用"知识图式"这一新术语指称特定时期知识产生、运动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个时期的知识图式之间存在深层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流淌于所有人文学科中语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学研究中，语言学都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透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图式从深藏之处显现出来。这本书一出版立刻畅销，据说到80年代为止，仅在法国就印刷了逾10万册。1976年福柯发表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志》。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福柯的死使法国上下震惊。共和国总理和教育部长称"福柯之死夺走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凡是想理解20世纪后期现代性的人，都需要考虑福柯。"

福柯《词与物》所研究的不单一是符号关系，而是秩序关系，探讨的是18至19世纪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上的变化。他在该书序言说："用朴素的眼光看，人类认识始于人。自苏格拉底以来，研究得最久的人原来竟是存在于事物秩序中的一块碎片，无论怎样，人的这一形象，是最新的知识布局产生的……人仅仅是最近的发明物，它的诞生还不足两个世纪，是我们知识里一个简单的褶皱，随着新的知识形式的出现，即将消亡。"[②]他认为语言是事物（生命、劳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告别方式，即告别事物域走向精神域。语言肯定了人的物质性死亡，肯定了人的

---

① 艾里蓬.谢强、马月译.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 于奇志.试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J].哲学研究，1998(3).

精神性诞生。语言与现实本就是两种物，一味求同是徒劳的。人在现实（物质域）里无法完成的事业，可求助于语言在精神界里继续工作。语言承受的是精神的重负。人类全部经验的三部分——生命、语言和劳动是有限的，也是人的“有限性”的根源，甚至成为有限性的代表，具体地说，死亡潜藏于生命中，口吃或失语存在于语言中，痛苦和疲劳产生于劳动中。福柯把逻辑学的“符号学意义”和历史学的“现象学意义”还原为“原级性”、“始基性”或“历史先天性”。他提出“人的双重形象”，双重人是劳动主体（劳动者）、生命主体（生存者）和语言主体（言说者）。在《词与物》中，“知识图式”是个相当关键的术语，不理解它，就不能澄清词与物之间的全部秘密关系。因为他的符号学创新观点，就是把“词”符号看成是“人”和“物”关系的历史本质。他提出的知识图式这样描述：是知识的一种特殊秩序或图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它具有局部性与深层性。知识图式不是一种隐蔽的伟大理论，而是一个分散性空间、开放的可描述的关系域；它不是与一切科学门类相一致的历史时期，而是同时进行的特殊的暂留性游戏；它不是对理性知识的总阶段的表示与把握，而是体现相继变化的复杂关系。一切现象或事物都处于知识图式的内部，构成科学的可能对象域①。《词与物》这一书名具有反讽风格，即分析的重点并不是题目所明言——词（mots）与物（choses）本身的问题（语义分析和物的分析），而是另一种任务——探讨论说本身即词与物之间的中间状态（pratique discursive 论说实践）——事物的“秩序”或词和物间的关系。福柯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再把论说当作符号集合（即内容或描写的意指要素），而是把它们当作系统地形成它们所谈论的对象的实践。当然，论说是由符号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指称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语言和言语。我们正是应当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②

福柯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符号也是一种生命，符号的生命运动是以“人”与“物”的存在为基础，并与之同命运。他一反结构主义传统符号学的观念，把“人”置于符号世界之中，“人”不再是“物”的主宰，而跟“物”对等地成为符号运动的一个对象物。福柯的理论促使我们对语言符号系统进行新的思考。显然，语言学中的词是以符号的作用来帮助人们识别事物的，但人本身也是被词识别的事物之一。因此，词在成为符号之前也只是物的属性存在，词本身并没有给出与世界的关系，它以事物表象的在场为基础，当它独立以符号形式存在而运动时，才不断给出不在场事物的表象。从此，人可以凭借“词符”来进行思维和认知事物。“词”作为传播符号才联结不同表象，并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福柯以动词符号“是”为例子这样说：

---

① 福柯．词和物[J]。转引自于奇志．试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J]．哲学研究，1998(3)．

② 于奇志．试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J]．哲学研究，1998(3)：66-67．

"动词'是'起断言作用。它既能断言存在,又能断言死亡。它能断言的唯一东西就是表象的存在:两个例子:树木和绿色的表象,或者人与生或死的表象,这就是为什么动词的时态并不表明物存在于绝对性的时间,而只是表明一个有关在不同的物之间存在的前后联结关系或同时关系的联系体系。因此,存在这个动词的基本功能就是把所有的语言与它们所指定的表象联系起来。"①

在所有现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前,语言就仿佛已先验地存在。词符给世界分"类",自己作为世界的对应物也被分"类"。同时,"词"以符号身份出现,便跟任何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表象发生关系,并在事物表象跟人之间发生关系。这时,人大脑中的"知识图式"与世界表象存在的"知识图式"对应,共同作为传播符号系统的共时"关系"及历史"本质"发挥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符号也就没有事物的表象,也就没有事物本身,甚至没有人。海德格尔说得更加透彻,他说:

"词语本身就是关系,因为词语把一切物保持并且留存于存在之中,倘没有如此这般的词语,那么物之整体,亦既"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包括"我",即那个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梦想带到他的疆域边缘,带向名称之源泉的"我",也会沉入一片暗冥之中。"②

显而易见,在没有词符的地方,无物可寻;词符缺失的地方也是物缺失的地方。因为没有词符也就失去人跟物的内在关系,即使"物"在,人将熟视无睹。传播符号既是一种事物表象的"类",又是事物表象与"人"沟通的"关系",同时更是一条"历史"的通道。

5.4 传播符号的"类"和"对应"

对符号的研究自然首先涉及对符号"类"概念的研究。关于"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古希腊罗马的语法学家已经从事所谓"类似现象"和"反常现象"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共性研究和个性研究。各种不同的符号都有相同的共性和不同的个性,从共性中寻找差异性和从差异性中寻找共性,是一项研究的两个方

① 米歇尔·福柯.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128.

②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语言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44.

面。而特别是后一项目标，“类”研究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符号意指在组合系统中的对应，与语言系统的语法分析有相似之处。我们从类型学角度考虑，首先解决三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1) 哪些个性是符号必需的；(2)哪些个性是传播所不可能出现的；(3)哪些个性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而非必需的。由此我们按如下原则对“对应”进行分类：

1. 根据系统整体的对应分类

(1) 双边对应和多边对应。当一次对比替换出现时，被替换项的符号与替换项的符号之间有着共同的对应因素，或比较基础，而且这一因素或比较基础在无条件情况下，不存在于其他符号的对应中，它们就构成“双边”类型的对应。例如汉语人称系统“第一人称”对比替换中存在排他式的“我”和包括式的“咱”，说话人用“咱”包括听话人在内和说话人用“我”只指自己而不包括听话人，构成双边对应。例如服饰系统的“领带”系列组合中，存在蝴蝶结式和条状结式的双边对应。但是，汉语的词符“我”在第一人称系统与“咱”对应，又在“人称代词”系统与第二人称“你”和第三人称“他”对应，所以“我”与“咱”同时又与“你、他”构成多边对应。

实体性符号的对应比较复杂。有一则广告：在一只可盛放食物的盘子里，盛着洒满阳光的麦田。根据常规的符号组合，在盘子毗邻轴上预期出现的符号应该是米饭、面条或精心烹调的菜肴。结果出现的却是非同一类的替换符号：食物的天然材料在和煦的阳光下生长。广告还有一串字符：“阳光早餐”。试用传播符号学原理分析：在盘子毗邻轴上允许出现的符号类属特性是——烹煮过的、可食用的、人工的、卫生的……但现在的替换符号在类属轴的特性是——自然的、温暖的、光明的、健康的……由广告词“早餐”的意指提示和非语言符号“麦田”的所指意义引起联想，传播的符号序列中应该有一个不在场的符号“面食”。“面食”具有多边对应，它既对应于其他食物，又对应于自身的区别要求如“××面食”。这个“××”按照隐喻原理，可以从文字符号“阳光”和它的同义复现画面符号阳光的共同意指来补出。不过它是多义的，必须在受播者心理印迹和预期目标指引下唤起某种联想，获得确切的解读。

(2) 比例对应和孤立对应。这类对应以是否构成区别为条件，其中一个符号项为原型，一个为变体，两者以同义衍生或功能分化为前提。如果两者是同中有异，则为比例对应；两者若无相同项可类比，即为孤立对应。例如汉语书写系统的“州”和“洲”(zhōu)构成了比例对应，“州”(古义)和“洲”(今义)都能表示水中陆地，但有差别；随着历史演变，“州”有了表示行政区划的意义，“洲”有了一块大陆与周围岛屿总称的意义。比例对应在语言的词符范畴中构成同义或反义关系。在服饰系统里“ 腰带”和“裤带”构成比例对应。非比例的对应就是孤立对应，它当然为数最多。语言学中语法的对应都是比例类型的，词汇对应大多数是孤立类型的。

在功能符号系统里也有这种对应类型，例如交通符号中的颜色变化而建立的对应就属于比例类型，学校上下课和课间预备铃声的长短变化而形成的对应也属于比例类型。但是，一些交通标牌的符号设置在针对具体道路状况和人流情况时，如Z符号表示道路曲折，▲符号表示行人密集等，是孤立类型的对应。学校体育课上体育教师的口哨声也属于孤立类型的对应。

2. 根据对应中符号间关系分类

（1）不等价对应。这类对应较为常见，当一个传播因表意需要而带上了某种标记，于是具有了新的意义，同时与不带标记的原级符号产生区别，形成“不等价”类型的对应。例如汉语拼音符号中，不带标记的 *a* 和带上声调标记ˉˊˇˋ的，就是不等价对应。假定有两幅画出自同一位著名画家的手笔而完全相同的作品，但是一幅有作者的署名，一幅却没有，在拍卖这两幅作品时就会出现明显的不等价。对“标记”的有无不能机械地看待，标记不一定是添加式的，删除也是一种标记（否定性标记），例如汉字的“角”和“角”便构成不等价对应。古代名讳，有时用缺笔的方法，如“孔丘”写成“孔丘”便构成不对应关系。无论添加还是删除，都是一种标记。标记即附加的符号，表示多出来的意义。有时“多出来的意义”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它没有具体的标记形式，但在符号组合之间出现能指的“缺席”，例如话语“王冕死了父亲”，在“王冕”和“死了父亲”之间有一个表层没有意义的停顿；这种语音停顿，在书写形式上有时用一个逗号的标记表示。这种标记形式，我们称它为“零标记”。在绘画中的画面空白、舞蹈中的静止造型、交通符号间隔的路段、建筑物留下的空地、电影中的定格，等等，都属于零标记范畴。所以外显能指的空缺，即没有标记的标记，本身也是一种能指。在相当程度上“空缺”反而比使之出现更提供想象空间，更具有表意性。列维·斯特劳斯将它与“神力”相比拟，足见“零标记”在不等价对应中的特殊地位①。

不等价对应能满足人们的“求异”心理，也推动符号的创新意识。它提示我们在符号替换时寻找尽可能多的表现形式，并创造更多的意义错位感和模糊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在符号“不等价对应”技巧运用上越来越出现“危险”，造成许多人“读不懂”的现象：传播者以别人“读不懂”为高明，受播者以不懂装懂自豪。较有代表性的是当前新型传媒中的网络语言，试看这样一段言语：

偶稀饭粗稀饭。
晕倒，楼主刚从火星归来？
偶8素米女，偶素恐龙的说。

①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介素虾米东东?

……

真可谓不知所云。这段网络语言的意思是:我喜欢吃稀饭,我不是美女,我是恐龙在说,这是什么东西? ……语言是一种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和公众约定性的符号,现在某些人正在用"语言"摧毁语言,使语言符号与现实事象联结、与人们心理印迹联结的功能遭到攻击,造成了符号系统"意义"的混乱和"关系"的无序。这种破坏符号以约定性为前提的任意创造,使语言符号的传播陷入了危机。

(2) 等价对应。这里的等价类型对应不能视为是不等价对应的肯定或否定,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的对应即不是标记的有或无,也不存在标记的缺席或添加,例如在英语的 foot/feet("脚"的单复数对立)和汉语的"图书/书籍"("书"的可计量一般概念与不可计量集合概念的对立),就是个例子。功能传播符号家具系统"圆桌"和"方桌"的对立、国画系统"写意画"和"工笔画"的对立,也是这种情况。但它们在能指层面的相似正是所指层面差异的原因,或者它们在所指层面的对立正是能指层面差异的理据。所谓"等价"是指对比替换符号在功能上的价值是等同的,不涉及它们的意指。这种对应,在传播系统里是最广泛的。尽管按照符号学的经济原则,在传播活动中应尽可能用不等价对应来代替等价对应,以减少符号的繁复和赘余。而且在不等价对应中,相似和相异是平衡的一对,又可建立起逻辑上比例式序列,如"雌/雄"、"牝/牡"、"阴/阳"、"上/下"等等价对应。在等价对应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一组传播符号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的对应甚至难以区分彼此,如"上/下"的等价对应有时是对立的,有时又是同一的:上馆子=下馆子、上车≠下车。至于"上船"和"下船",有时是等价的,上船=下船(当船位低于船码头时);有时却是对立的,上船≠下船(当船位高于船码头时)。

3. 根据对应的区别性价值分类

(1) 恒定对应。这类对应中的所指在各种场合总是存在不同的能指。例如汉语系统中表示性别的符号系列,指人和指动物用不同的能指,甚至在指不同动物时也使用不同的能指形式,其中相互依靠约定规则来确立。如指人用"男/女",绝对不能用"雌/雄";指称四蹄动物用"公/母",不用"雌/雄",更不能用"男/女"。这种恒定对应还起到能指的文体性作用,如表示性别的"牝/牡"只适用于文言。功能传播系统里的恒定对应,有时受符号的组合规则所规定,如汉语中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存在着约定规则的对应,大多数场合也是一种恒定对应,例如船只的"条/艘",如不出现形体大小的背景提示,一般是"条"指小船,"艘"指大船;同指方形物体的"张/块","张"只指平面,"块"指立体。功能符号传播系统里的恒定对应,有时还被文化因素所强制,板凳与沙发在组合配列的替换系统中几成定式,如适用木椅的厨房就

不适合沙发，适用沙发的会客厅就不适合板凳。此外，画卷的悬挂场所、佛像的安置部位、房屋建筑的朝向、红绿灯的装置高度、桌面的几何图形，等等，都似乎有恒定对应。

(2)“可删除”对应或“中和”对应。与恒定对应不同，相应位置上的所指不一定总是有不同的能指。对应的两个相同位置上的传播符号，有时不同所指用相同的能指，一家小型公司的办公桌可能就用书桌来代替，一户简陋的住家可能书桌就是电脑操作台，在新闻传播里报纸可能就是一张传单(如《烈火中永生》里的《挺进报》)。有时则相同所指的意义用不同的能指，如大众传播里常常用“我们”来表达“我”的意见，在广告传播里同一内容却经常变换形式以刺激受播者。由于书桌既是书桌又是办公桌和电脑操作台，复数人称的“我们”就是“我”，就造成信息传播上的中和，或者使原级符号的本来信息被删除，所以我们把这种对应称为“可删除”对应或“中和”对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谓“可删除”对应是指其所指即符号承载的信息可删除，但其能指形式仍出现在组合序列中，不可删除。以文具用品“墨水”为例，顾名思义，它本是一种黑色的书写用水，但是随着使用功能的变化出现了“蓝墨水”、“红墨水”等，语符“墨”承载的表示“黑色”的信息被删除了，然而我们在表层语符序列上仍然保留着这个语符，我们不能把“蓝墨水”“红墨水”改称为“蓝水”或“红水”。

5.5 符号三分范畴和二元组合

传播符号聚合系统中“对应”的类型，总是在二元模式中显现。这是按照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对符号分析处理的最基本方法。本来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一是他只注重符号的本体分析，根本不管符号的意指和符号深层意义，停留在符号能指层面的结构处理；二是他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根本不关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具体差异，拒绝把符号和符号产生的环境联系起来；三是他把符号系统看作是一种先验存在，把现实世界排除在符号意义的所指之外。他因此把符号不顾一切地二分，单一地进行形式上的处理，不关心符号的具体操作和代码的具体形成，从而导致了索绪尔符号学的危机。巴尔特竭力试图挖掘符号的深层结构，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在具体分析和处理时，仍然着重于符号内部的各个组成成分的相互关系，于是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这就大大约束了符号学发展的步伐。后来霍布斯甚至强调说：“大体说来，符号学的疆界(如果它有的话)和结构主义接壤：两个学科的兴趣基本上是相同的。”[①]这种

① 霍布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7.

观点限制了符号学的发展，也使符号学只能在自己的系统里自足地运行。

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缺陷，才能突破二元框架，把符号学引进传播学，建构传播符号学，使它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现实世界并不是一概地二分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和谐体。皮尔士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从逻辑学角度对符号学进行改造，他不同于索绪尔的先验结构，提出了符号的三个“普遍范畴”，这样就是把符号处理成三分，而且对传播符号的整个系统都采取三分的方法。他认为符号世界在三个“普遍范畴”下有三级存在：一级存在指自我独立的存在，例如颜色，不论它是否被人感知，都是存在的，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二级存在指个别时间和空间上的经验，它牵涉到主体和被感知事物的关系，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被某个生物所感知的某种颜色便属于二级存在。三级存在属于“中介”、“习惯”、“记忆”、“再现”、“交流”等抽象的范畴，它是具体的时空经验获得新的形态，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某类外部事物的感知效果并不完全一样，但人们仍然用同样的符号来表达、再现和传递这些效果。而且他指出，这三种“存在”之间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递进关系：二级存在中包含着一级存在，三级存在中又包含着二级存在。符号属于三级存在，所以符号系统同时包含着其他两种存在。在此基本思想指导下，皮尔士又将“三分法”运用到符号的形式、指称和意义上去①。

符号根据自身特征可以三分为：状态符号、个例符号和规则符号。

符号根据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三分为：类象符号、指示符号和抽象符号。

符号根据意义的不同性质三分为：可能符号、现实符号和证实符号。

而对符号的内部结构而言，皮尔士突出的贡献是他在索绪尔关于符号结构“能指”和“所指”的基础上提出了承担解释的第三项，我们命名它为“意指”。由于意指是符号意义的深层概念，并不在符号组合层面显现，所以我们在操作层面处理符号的时候，仍然采纳索绪尔的二元理论。这样，我们就在传播符号的三分范畴中考察符号的二元组合及其各项“对应”。

符号集合系统中“对应”的类型，在二元模式中显现。反之，任何一个系统中出现的二元模式都可能存在多种对应类型。以交通符号系统为例，根据灯光颜色的变化而建立的信息对应，是比例式的多边对应（红与绿的比例对应；同时绿与黄的比例对应）；在圆形标记中添加某一个符号（如加上红杠）就改变了圆形标记的含义（如禁止通行），就出现了不等价对应；涉及“警徽”的标记尽管可以有许多种能指形式，但始终是一种恒定对应。不过，交通符号系统中，没有等价对应和可删除对应，因为交通符号必须清晰明了、不允许有多义，否则会导致交通事故，这是可以理解

① 郭鸿. 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与皮尔士符号学两大理论系统的要点[J]. 外语研究，2004(4).

的。当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新的交通情况的出现，制定新的符号以指示交通，而新符号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解（包括执法过程中的贯彻），或者因为它们没有准确意义上的聚合（出现等价对应），或者因为要求在一个能指的两个所指中选择（出现可删除对应），但这种情况在符号的具体实施中很快被消除。我们再以服装符号系统为例，无论是款式、材质、搭配要求、形体风格和构件组合，都具有多义性倾向，它在二元模式中会出现多种类型的对应，但没有双边对应和恒定对应。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恒定对应的“刻板”和双边对应的“单一”，对服装系统的传播符号表现丰富多样的生活现实来说，必然是致命的弊端。

现在的问题是，符号系统的二元化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否属于符号世界的自然基础？符号系统组合和聚合关系中是否一切对应都能归入二元模式？事实将告诉我们，二元模式不仅仅是一种操作制度，而确实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真实模式中，符号操作只是真实世界的再现而已。用二元符号来传递人类的各种类型的信息，可以说是非常古老的传统。我们的祖先远在商周时期，就已经用“阴/阳”二元来规定世界万事万物，把自然界的天地、风雷、山水，生物界的龟蛇、龙凤、雌雄、牝牡，人事的男女、脏腑、腹背、正反、上下、冷热，等等，都一分为二。中国道家所谓太初之始天地合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从九反一，乃人道真”[①]。中国的中医学更是把二元理论的“阴阳”学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可以说，中医学就是一门运用二元模式理论的“医学符号学”。以二元符号传播信息，多少世纪以来始终是人们公认的原则。从中国古代用两个符号来表示世界的神秘的“八卦”，从刚果部落中用两个音来传递信息的“话鼓”，到莫尔斯电报、数学的二进制运算及现代的数码技术，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替换式编码，乃至现代计算机运算，都是二元的。但是这一切都说明人类在分析和理解世界时，传播符号学的二元理论和符号的二元操作技术是十分有用的，目前也是唯一的。

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设想内部语言是一个多元的、多维的联结，言语表层词序与事件顺序不相一致的结构也显示符号的组合不等同于现实事象的组合。然而这也只是设想，因为人类大脑结构和大脑活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大脑对于我们不说是“黑箱”也是“灰箱”。人类须臾也离不开传播，传播就离不开传播符号，而无论是传播的主体或客体，无论是传播的手段或中介，归根结底都是符号。将符号学建立在普遍二元制基础上，是基于我们相信大脑神经的感知活动是以有或无的方式进行的，并且相信人的视觉或听觉是以类似“扫描”方式来运作的。不管怎样说，二元模式适用于从自然到社会的人文研究，使我们能建立起一种可以分解、可以运算的“数字式”而不是“类比式”的世界图像。当哪一天科学发现符号学目前的分类原则

① 宋·张君房辑. 云笈七籤：卷二[M]. 山东：齐鲁书社，1988.

只是既必要又暂时的行为时，世界的多样性还有更复杂的组合，那么传播符号学将会出现一场革命，人类会有新的分类学来处理。

为此，我们仍然确定按原来的原则来规定世界。传播符号在两项之间进行组合，这两项在线性传播序列里是邻近的，在其他非线性传播的序列里可以是跨越的，都形成二元模式。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运用对比替换操作，并构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对应；对应尽管多种多样，但可以归纳为若干种类型，类型以某些特征的有或无、一或多为检测标准。如果不是“无”，而是“零”，那么“零”形式也是一种特殊的“有”。在二元模式分析时有一类情况比较特别，即所谓信息的“中和”，能指成为一种赘余性。如“蓝墨水”中“墨”的原级所指意义被删除，“红粉笔”中“粉”的原级所指意义被忽略，“玻璃黑板”中“板”的原级所指意义被转移，“大小姐”中“小”的原级所指意义已消失，如此等等。所谓原级所指意义，就是自然基础条件下能指所指间的直接意指，即皮尔士提出的“一级存在”。所谓“赘余性”，它既不是“无”，也不是“零”，而是能指背后的所指意义在组合中因对比替换而消失。或者说传播符号的“一级存在”被“二级存在”或“三级存在”所包含。当“墨水”、“粉笔”、“小姐”完全符号化时，参与“一级存在”的组合语符的原来意义就发生隐喻性转移或消失，或者说被组合成新符号所“中和”。

“中和”是从化学和物理学中借用来的术语。当 A 物质（或某要素）和 B 物质（或某要素）进行组合而生成新的物质，既不显示 A 的性质，也不显示 B 的性质，呈现一种仿佛 A 和 B 都消失的样子，如酸和碱反应形成既无酸性又无碱性的盐和水，物体等量的正电和负电接触后出现了物体不带电的现象。“中和”总是在所指层面发生，它造成意义上的消磨。在语言系统中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叠加词符（A）与一个原级词符（B）组合，组合过程中使原级词符（B）所指的全部意义或部分意义消失。例如“红”＋“墨水”构成能指形式“红墨水”，“红墨水”中语素符“墨”的黑色含义消失了；“红”＋“粉笔”构成能指形式“红粉笔”，“红粉笔”中语素符“粉”的白色含义消失了。有时能指层面进行对比替换，结果却造成所指失去自己相关的特征，如“大 / 小熊猫”、“大 / 小姐”，语符中出现的“大/小”不属于比例式的双边对应，“大熊猫”和“小熊猫”不是同类动物，“大姐”和“小姐”不是同类指称，所以“大”和“小”不能随意替换。传播符号组合中的“中和”现象客观上将会影响人们对符号快速的、准确的掌握和理解，所以一般不容许在组合中出现中和。但是功能符号通常是多义信息的交叉传播，甚至有泛义倾向，因此难以避免接受一些中和。例如某人在特定场合给自己的异性朋友送两件礼品，此时实物的文化符号——内衣表示贴心，袜子表示追随；而在另一普通场合给同一个对象赠送内衣和袜子就只表示礼仪，那么内衣和袜子间的相关性就丧失了。它们被归人“衣件”或“物品”中。假如广告画面中一个人冒着汗拿着饮料，表示饮料的解渴效果；而另一画面中是一

个人在游泳池里喝着饮料，那么饮料与解渴的相关性就被取消了。说明二元组合中一般地要求每个意指有相对稳定的能指和所指，如果出现一个所指可能有两个能指，或一个能指可能有两个所指，就会产生中和。

符号组合的"中和"虽然在二元模式中因为失去区别特征而不提倡，但是它往往又是造成新的二元的能动因素。由于中和的组合反而消磨去一些所指的特征，人们可以把它看作也是一个"元"，比如"红墨水"中可以不把"墨水"看作是两个元的组合而是一个"元"；这样"红"与"黑"形成新的对应关系。即使内衣和袜子的组合因为在其他场合出现的无意义而失去任何象征，但把它们看作一个实物符号"元"与另一个对象符号"元"（比如情人）进行组合，它们的象征意义又会出现。因此"中和"使二元模式有了多样式性，多样式性虽然不带来意义的改变，但为各种各样重新组合的实现创造了可能。这里我们还必须注意，所有的二元组合，其背后都存在着另一个在表层不参与的组合"元"，那就是"环境"。任何传播符号组合的背后都有决定着组合意义的"环境元"，它对能指层面"组合元"意义关系的呈现起着关键的作用。"环境元"是对组合元之间"关系"的隐含提示，虽然它不参与直接组合，却是一个重要的隐性组合元。它通常以时间和空间的特定形式出现。

因为"环境"对任何一个符号组合都是必须考虑的，所以我们没有刻意强调三元组合，仍然把传播符号的组合归为二元，把"环境"作为一种"关系"来处理。在非语言形式的传播活动中，"环境"对组合元的意义影响特别大，因为传播符号在组合中产生新的意义，但是新组合的意义常常是隐含的、不稳定的、多义的、模糊的。"环境"的参与，使组合意义变得清晰和稳定。例如一张儿童照片，儿童满脸笑容地出现在阳光下，照片被粘贴在家庭照相簿里，它以"家庭＋照相簿"为符号组合的"环境"，其组合意义便是一个真实的人——健康成长的儿童；如果这张照片被放到了"如何培养健康儿童"的主题展览中，那么"健康儿童＋展览会"成了符号组合的"环境"，其组合意义就表示该儿童是"健康儿童的典型"；如果照片出现在有关儿童营养米粉的广告中，那么"米粉＋广告"成了符号组合的"环境"，于是照片显示的组合意义成为：他/她是吃了营养米粉的儿童代表。"环境"参与组合，只是它在背后隐含而已。"环境"包括话语背景、媒体性质、传播的介质、传播领域等。符号自身的特征和组合条件等，也可称"语境"，在传播符号学概念范畴里定名为"关系"。

5.6 符号所指的多元联结

符号能指层面的组合方式具有二元性，但两个组合元存在的时间过程、空间距离与它们的组合能力密切有关，也跟符号的系统表达方式（编码方式）有关。但是，所指的组合方式与能指的组合方式是不等同的，能指的组合不等于所指的组合，

“白”+“菜”≠“白菜”，大包大包的书和一个空荡荡房间的组合并不意味着房间成了书房。前面所提及的“零”组合和“中和”组合的情况也足以证明，能指的组合与所指的组合是完全不同的模式。于是这里需要引出所指联结的多元性概念。

我们从不同角度根据所指的联结方式和意义关系分为几种情况：根据能指组合与所指联结的关系，把所指联结的方式分为“在场联结”和“不在场联结”；把所指在联结过程中的替换的是内涵系统还是外延系统，分为“内涵联结”和“外延联结”；按所指的含义在联结中的关系和作用，划分出“蕴涵联结”和“象征联结”；按一个所指连接的元的多少，划分出“双元联结”和“多元联结”；按符号元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划分出“思想联结”和“行为联结”。

1. 在场联结和不在场联结

我们把两个传播符号在同一平面或同一线性上的邻近部位出现并发生意义联结的，叫“在场联结”。言语链上的语符联结并不都是在场联结，但大多数能指层面的语符组合与所指层面的语义组合基本上同步进行。也会出现一个所指越过临近的语符与被间隔开的语符的所指进行联结的情况，或者与显现系统中没有出现的符号成分联结的情况，这是“不在场联结”。例如下面的言语链中的一些成分的语义都与不在邻近的成分联结；符号的语义关系不与符号的组合关系（语法）一致：

(1) 那位太太一男一女地生了两个孩子。
(2) 她的脸变得通红。
(3) 人被他打死了。
(4) 张三不小心打碎了一瓶酒。
(5) 衣服的两个袖口全穿坏了。
(6) 衣服被偷了。

句(1)的状语“一男一女”分别与宾语的“两个”和“孩子”发生语义联结（实际意义则是“一男孩子”和“一女孩子”）；句(2)的主语“脸”与补语“通红”语义联结；句(3)言语主体“人”与补语“死了”联结；句(4)定语“瓶”与补语“碎”联结；句(5)主体部分的“衣服”、“袖口”分别与“穿”、“坏”进行不同联结。上面言语中相关所指的组合关系不在能指的平面发生。句(6)“被偷”的关系成分没有出现，但在语义联结上仍然很明确，所指暗示了符号序列不在场联结“小偷”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称为“零”对应的联结，因为“被”和“偷”之间有一个空位（或者说处于潜符号存在状态），虽然没有具体的符号出现，但根据“环境”（也可说是“主导文化秩序”。此外，符号的组合规则——“语法”也是一种“环境”。“环境”具有主导文化秩序的功能，对传播符号的组合——符号的编码方式起着制约作用）完全可以补出来：衣服被（小偷）

偷了。

非语言的符号系统里不在场联结的情况更多，尤其像国画、舞蹈这一类艺术符号。画面中跨空间（联结的所指出现于画面，但不在同一图形组合中）的语义联结和超空间（联结的所指不出现在画面中）的语义联结正是绘画艺术的意境所在，魅力所在。至于舞蹈的所指始终存在于舞姿之外，甚至它必须借助于受播者的经验和联想，有时还需要并行系统的传播符号——音乐的启示，意义才得到真切的联结。我们看到许多商店的时装广告常是一具穿着时装而没有头形的模特造型，因为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没有头的人，更何况商店作为“环境”出现，其主导文化秩序限定了受播对象是顾客，所以它一点不影响广告的意图——其所指联结不在人体的造型，而在顾客对服装的意念联想和购买欲望之中。不在场联结有时更能起到传播效果，它能充分激发受播者的心理动力。

2. 内涵联结和外延联结

符号系统在组合的替换操作中形成了聚合概念，聚合从意指方面说有两大类。一类是内涵范畴的集，例如家具系列的床、桌、柜、椅、箱、橱等实物符号是出现在同一空间可以进行不同组合的“集”；一类是外延范畴的集，例如床系列中的水床、坑床、沙发床、板床、钢丝床等在相同组合中是可以相互替换的“集”。每个符号的组合虽然都是可感知的能指形式，但每一组合都会触发所指的潜在的意义，因此自然地就出现来自所指本身意义对组合对象的要求。如果组合的原级所指对组合对象的含义有强制性要求，就是内涵联结；反之为外延联结。

设一符号 X（能指），其含义为 Xa（所指）；另一符号 Y（能指），其含义为 Yb（所指）。如果 $Xa \wedge Yb$ 的组合中 $Yb \geqslant Xa$（表述为：Y 的所指意义 b 蕴涵着对 X 的所指意义 a 的要求），那么构成内涵联结。可表示为：

$$Xa \wedge Yb \rightarrow Xa \leqslant Yb$$

例如语素组合有“狐臭”，“狐”的所指中有“臭”的含义要求，于是“狐臭”形成强制性联结（所以没有“狐香”的对应）。“珠”和“球”有共同的语义蕴涵“圆球形”，但也有差别，差别是“珠”小“球”大，于是允许有“泪珠、珍珠、电珠、露珠”等组合，组合的所指在原级符号上所增加的指“小”类征，仍在原级符号所指的含义要求之中；相应地与“球”的原级符号组合则有“地球、星球、篮球、足球”等，其“大”的类征本来就在原级符号所指的要求之中。无“大”和“小”性征对比的“钢”、“木”等语符就既能与“珠”组合也能与“球”组合，构成新语符“钢珠”、“钢球”和“木珠”、“木球”。但是必须注意，这种组合与“滚球”、“滚珠”的情况不相类，“滚”能够进行多边对应，因为“滚”符合“球”和“珠”所指内涵中圆形的要求。所以“滚”和“珠”、“球”的组合是内涵联结，“钢”、“木”和“珠”、“球”的组合是外延联结。实物性符号也同样，例如服装就有与人体组合的含义要求，所以无论是时装广告或是时装模特表演都必须有

"人"的特殊含义(身份、地位、风格、修养等)存在,服装的潜在的意指接合在服装的能指层面已经有所暗示。总之,内涵联结有较大的强制性。

外延联结的要求比较宽泛,组合的一项(X 或 Y)的所指意义(a 或 b)相互在外延上进行限定,用字母公式表示为:

$$Xa \wedge Yb \leqslant Xa \cup Yb$$

如"钢球 / 钢珠"、"木球 / 木珠"都没有涉及原级符号所指的内涵要求,只在球、珠的材质上限定,缩小了原级所指的外延。言语链中语素组合成词时大都属于此类情况。实物实体符号的外延联结通常表现为限制原级符号的所指意义——实物实体的"实用"价值。假如一张方形的桌子主要用于餐桌外,并不严格限定它的其他用途,但是能指形式变化:四周加上凸起的边框就成了麻将桌(本质上仍是桌子)。假如给一只不起眼的狗穿上"衣服",不起眼的狗变成了宠物狗或马戏狗(它的"实用"价值被改变)。外延的限定是双向的,当限定"球"在钢质范围时,也限定了"钢"在球形范围内;当具有给人穿这个内涵意义要求的"衣服"跟"狗"组合就限定了"狗"的通性,同时"狗"也限定了"衣服"的通性。当然外延联结中外延的限定必然引起内涵的深化,内涵接合中内涵意义的限定也必然造成外延对象的变化。两者本质上是不可分隔开的。但是,内涵联结中增加(或负增加)的是原级符号内涵要求范畴内外延对象的缩小(或扩大),而外延联结中增加(或负增加)的是原级符号外延要求范畴内不存在(或已有)的含义的变化。"钢珠"仍然是"珠",只是从材质上缩小了"珠"的外延;"滚珠"虽然仍然是"珠",但在功能上使"珠"增加了内涵,具有特定的所指并呈现新的功能,如专指工业用的滚珠或轴承中的滚珠。所以两种能指组合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所指联结。

3. *蕴涵联结和象征联结*

符号能指 X 与组合对象另一个能指 Y,两个符号的所指存在一定的蕴涵关系,X 的所指意义 a 和 Y 的所指意义 b 在组合单位中共同依存,并互相吸收,形成融合一体的一个新意指(语义团)。用公式表示:

$$Xa \wedge Yb \rightarrow (XY)R(ab)$$

能指在所指的联结中存在着相关关系。言语链中表现为加合反应,即联结单位是两个语素义的融合,如"蜂蜜"、"牛鞭"、"红旗"、"人民"等比比皆是。功能符号中也表现多多,如服装的开纽方向与适用对象的相关关系便是,左排纽与右排纽以比例式双边对应与服装"语言"组合,成为男女服装的一种表层特征。设 X 为能指(服装),其所指为 a(成人穿);设 Y 为另一能指(左排纽),其所指为 b(女性穿)。则得出:

$$Xa \wedge Yb \rightarrow (XY)R(ab)$$

服装(成人的)+ 左排纽(女性的)→左排纽服装(成年女性的)

试转写为第二系统——言语符号表达：成人穿的服装（Xa）联结有着女性特征的左排纽（Yb），那么这就是给成年女性穿（ab）的左排纽服装（XY）。

在符号 X 和 Y 组合后，组合单位所指的联结与 XY 的所指意义 ab 没有直接的关系，ab 在组合单位中只是某种换喻或隐喻的象征价值（Zc），我们称为象征联结。语言学的修辞构词大抵如此，"社稷"（国家）、"干戈"（战争）、"矛盾"（言行自相抵触）等。许多传播符号具有意象外的意义也属于这一类。例如一幅画：有人骑着马而蜂蝶盘旋于马蹄。所指意境都在画外，古人用文字符号来暗示意指："踏春归去马蹄香"。南唐有《四畅图》名画，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势，一搔首者使小青理发趺坐俯首、两手置膝作轮指状。画面的搔首剔耳并非其实指，所象征的含义经过黄鲁直的题诗才显示出来："剔耳压尘喧，搔头数归日。"[①]实物实体系统传播的象征联结通常要借助第二系统来指示，比如这样的动态广告：一个出水的龙头，扳头拧了多下都没有把水止住；这时放上两粒胶囊成"丁"字状（模拟龙头开关），用手一拧，水止住了。虽然广告的意思大致明白，但"水"的所指联结什么呢？于是出现广告语言："两粒易蒙停，腹泻无踪影"。广告语言点出了广告动漫的象征联结。

4. 双元联结和多元联结

在一个传播符号链（或符号图、符号构架）里，符号的所指意义联结一般也有邻近组合的优先性，这样它可以与能指形成同步联结，但是也完全可能跳过能指层面与其他符号的所指联结。如果在符号的意指层面构成的联结只在二元间发生，则是双元联结；如果一个所指既与某个所指联结又与另一个或多个发生二元联结，则是多元联结。多元联结不是一个"元"同时与多个元的交叉联结，而是分别与多个元发生双元联结，形成一个以某一个"元"为"原点"的多项联结，所以也叫辐射联结。

言语链"张三打碎（了）一瓶酒"，"瓶"作为联结原点，它既与"酒"联结表示酒的容器和酒的数量，又与"碎"联结表示"打"这一动作的对象和结果，还与"打"联结表示动作涉及的对象。这是以"瓶"为原点形成的三向性辐射联结。如图 5-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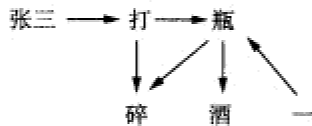


图 5-4

尽管内涵意义的接合是辐射型的，但在表层能指形式仍然是若干个二元的组合："张三打"、"打瓶"、"瓶碎"、"打碎"、"一瓶"、"酒瓶"。此外，如象棋盘里的每个子都分别与其他各子构成辐射联结，才出现下棋时棋局的多端变化。任何一类的传播都牵涉到传播符号的存在方式和传播主体（包括传播者和受播者）心理世界的实现。在现实的传播系统里有着三个生命世界：一是传播客体的现实世界，二是传

① 宋·蔡绦.西清诗话.引自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播主体的心理世界，三是规则排列组合的符号世界。符号世界的辐射联结既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也加强了人类的心智训练，使人变得机灵、聪明和富有创造力。传播中的符号世界以辐射联结的生命运动方式，一头与人类的心理世界的多元化相连，另一头与现实世界的多元化相连；符号世界就是处于人类的心理世界与现实的真实世界中间的中介世界。

5. 思想联结和行为联结

符号一方面是一个社会系统，同时又是一种个人行为；符号另一方面是人类社会思想的现实，同时又是受系统制约的个人表现。大量符号几乎是在人们进入社会活动时就已经存在，尤其像语言这样的符号，甚至可以说是“天然”的。所以也可以说，人们从一出生就是依赖符号生活的，人自身也在符号的互动关系中被符号化——每个人被赋予一个符号（比如姓名、性别、身份等）。这样，作为符号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跟自己的内部世界——思想发生联结，同时实现跟外部世界——通过行为发生联结。我们把符号跟思想的联结叫宣泄反应，把符号跟行为的联结叫生存反应。为了简化这个联结过程，我们用图 5-5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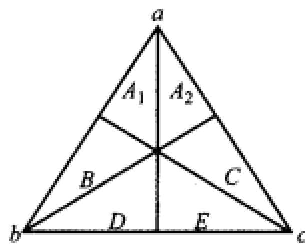


图 5-5

我们称它为“符号人三角形”，图中的字母分别表示：

A 符号人；A_1 思想；A_2 行为；B 自我制约；C 社会制约；D 自我表现；E 实现交际。

符号人由内在的思想和外在的行为构成，思想和行为必须借助符号来实现。符号人通过句法代码与思想符号进行联结，表达思想和情感，实现自我表现；通过语用代码与行为符号进行联结，表达对受播者的理解、愿望和要求，实现社会交际。

句法代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现成的；句法代码使符号人和“思想”进行联结，组织成话语。“思想”既构成话语的意义，也构成话语的每个组合元（语符）。体现“思想”的组合元（语符）具有个性化特征，正因为这一点，世界上几乎没有人说的话是相同的。在话语个性化层面，形成 $A_1+B=D$。这个过程基本上在自我传播中实现，比较重要的是编码。其可逆过程是解码。符号人和思想符号的联结突显了符号人在符号串产生过程中符号意义的创造价值。

语用代码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规则：符号人由思想人转化为行为人，通过语用代码跟“行为”符号进行联结，传递给受播者，实现交际。从而在话语社会化层面，形成 $A_2+C=E$。这个过程基本上在人际传播中实现，同样具有可逆性，形成传播的互动。符号人和行为符号的联结突显了符号串产生过程中传播和受播双方信念价值和结果价值的体现。

符号人三角形的三条边，ab 表示句法规则，ac 表示语用规则，bc 表示语义规

则。在 bc 层面，我们发现，符号人跟思想符号联结的个性言语被社会化，反之，符号人跟行为符号的联结的交际言语被个性化，于是符号由编码到解码到再编码之间进行了互动转换。整个符号系统正是在三角形布局中得以确定，并进行传播。每个词语符号的所指是客体事物的概念性存在，代表的是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而并无任何确指，只有符号人把它跟“思想”或“行为”联结时才产生具有特定价值的意义。“小桥流水人家”如果不跟“马致远”联结便毫无意义，仅仅是三个普通语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传播者不把“真理”跟“思想”联结，不把“人”跟具体的符号人联结，那么这句话同样是无意义的。因此，“符号人三角形”是符号价值实现（包括自我表现中的创造价值、交际活动中的信念价值——传播目的、意愿、要求和结果价值——传播效果、回应、行为等）的基本模式。

符号人跟“思想”符号的联结或跟“行为”符号的联结之后，使被联结符号的抽象意义消失了。比如“请客吃饭”这个语符列里，“吃饭”这个行为没有特殊的含义，“客”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当它们跟符号人联结后，“客”不再是所有可能被邀请的朋友、商人或顾客，而必定是特定对象，“吃饭”也具有了招待、宴请的意义；“客”和“吃饭”这两个语符原来的所指意义消失了。正如福柯说的：“说话或写作，并不是去说物或表达自身，这不是一件玩弄语言的事情，而是逐步成为至高无上的命名活动，并通过语言一直达到物与词借以能在自己的共同本质中联结在一起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使人们有可能赋予物与词一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一旦被人陈述，那么，被引导到这个名词或者为了达到这个名词而被跨越的所有语言，就被这个名词吸收了，从而也就消失了。”[①]从这一意义说，符号的所有联结关系中，符号人跟“思想”和“行为”的联结是最根本的。

① [法]米歇尔·福柯. 词和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61.

第 6 章　传播的符号和符号的传播

6.1　传播符号的意义分类

符号的“意义”要表达清楚不容易。因为符号的所指是通过能指形式与客观事物的事象进行联系的，虽然它代表的是客体事象的“意义”，但实际上是它与能指作为一个结合体（意指）来联结意义的。而且就是“意指”也并没有与事象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结，它是经过语言的折射才得到体现。一切非语言的实物集合，唯有通过语言才能获得符号系统的身份，是语言在分解能指的形式，是语言在指称所指的意义。巴尔特说：“从更广泛的范围讲，构想一个其所指在语言以外存在的图像或实物系统，看起来是越来越难了。感知某物所要表达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语言的分解：意义只在于指称，而所指的世界不过是语言的世界。”[①]于是所谓符号的意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以语言转写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一是人类对对象事物（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的认识而赋予的含义。符号的传播活动，实质上也就是意义活动。意义活动是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之一。

当一个传播符号单独地孤立存在，不跟任何其他符号组合时，具有的意义与它跟别的符号组合产生的意义是很不相同的。例如一个词语符号“天”，单独地孤立出现时，它传递的信息是多义的、不确定的、模糊的，但是人们还是会根据符号的历史形成和自己的心理经验，来获得它特定的基本意义，或者叫“词典意义”。当它与别的传播符号组合，并进入传播系统时，它的意义才得到明确的显示：

① 天很冷。
② 天上下着雪。
③ 天渐渐暗下来。
④ 不知不觉一天又过去了。
⑤ 天知道什么时候一切才会改变。
⑥ 天哪！一个“天”有那么多意义的变化。

---

①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引言[M]．北京：三联书店，1999．

同一个语符“天”，进入不同的组合，在意指接合的符号或其他符号的“环境”提示下，便形成不同的内蕴意义。句①的“天”受“冷”的意指接合，表示“天气”。句②的“天”受“上”的空间定位和“下雪”的“环境”提示，表示“天空”。句③的“天”跟它邻接的“暗”形成意指意义的接合，故表示“天色”。句④的“天”受数字“一”的限定，又被时间运动的“过去”制约，表示时间单位，相当于“日子”。句⑤的“天”因为跟认知动词“知道”组合，激发出隐喻意义，表示某一不可知的生命体——上帝或神灵——非人，于是“天知道”成为“非人所能预测”的转换意义。句⑥的“天”与语气词“哪”组合构成呼吁义，于是成为被呼唤的对象，具有权威的“神灵”的代称；至于跟附加符号——引号组合的“天”，表示意义不确定的孤立形式字符。上述几个句子里的“天”，能指形式相同，但其所指内容很不相同。说明传播符号的意指必须进入组合状态才能显现，并借助“环境”和传受双方的心理印迹来排除意义的浮动，获得确定的意义。

根据符号进入组合的状态，符号的“意义”分为静态意义和动态意义。静态意义是指符号本身在所指层面反映的符号与主体（人的思想）及和客体（现实事象）的关系，完全在传播符号文本中得到体现的意义。动态意义即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借助传播主体和符号指称对象的互动才体现的意义。下面将分别进行阐述。

1. *静态意义的分类*

符号是意义的携带者，任何一种符号都有特定的意义。为了区别符号自身的意义和符号在传播中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把符号的所指意义还是用“意指”来称呼它。根据符号本身所指对象的含义、符号与符号间的关系及符号内部的语义结构，我们把符号的意指分为若干类型，这些分类有助于我们把握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1）外延性意指和内涵性意指。符号联结的是对象事物的概念，而不是对象事物的实体。概念由外延和内涵两个部分组成，因此符号的意指也有两个指向，一个指向外延，一个指向内涵。但是通常一个符号的外延和内涵是统一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中的，并没有外在的显现形式。有时符号为了指示对象的外延意义，需要给符号加上某个指示外延意义的符号，该符号的意指就属于外延性意指。例如“中国人”里的“中国”就是“人”的外延性意指。上衣的左排纽也属于外延性意指。相对于“中国”和左排纽，“人”和“上衣”则是内涵性意指。言语符号“人”在外延上没有限定，它指一切人（其外延包括男人、女人、老人、青年人、中国人、外国人等），在内涵上则特指“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具有抽象思维和运用符号的能力”等。同样道理，实物实体符号“上衣”在外延上也没有限定，指一切上装（男装、女装、老人装、青年装、童装以及礼服、婚服、孕妇服等），在内涵上特指“能够给人穿，可遮蔽人体上身并御寒”等。自然符号的外延性意指和内涵性意指是一组对立

统一的概念，一个符号相对于内涵意指符号是外延意指符号，但它自身也是一个内涵意指符号，如在“中国人”中外延性意指的“中国”，本身具有独立的内涵性意指。也就是说，“中国”在“中国人”这个组合语符里是以外延性意指符号形式出现的，但是“中国”作为独立的语符则是一个内涵性意指符号。

（2）指称性意指和区别性意指。指称性意指就是进入对外部世界的分类，也是将符号与现实世界的事物可以联系起来以进行思考的概念性意义。比如“植物”、“动物”、“微生物”等，既是对现实事物的指称，又是对现实事物的分类。但是“植”、“动”、“微”三个字符作为语素符则分别表示生物群的差别。这种通过符号间的关系从外延上或内涵上赋予的一些特征以形成相互区别的意义，叫区别性意指。区别性意指不包含符号意指派生的换喻或隐喻性意义，并排除符号因组合而引发的其他意义。例如“走狗”中的“走”的意指不属于区别性意指，因为它已经引发出其他意义，并不作为“狗”的区别性特征出现和区别性意义使用。但是，同一个“走”在“走读”这个语符组合中，“走”相对于“住”构成作为学生读书是否住校的区别性意指。指称性意指和区别性意指，都属于符号的理性意义，它一般不引发出联想意义或隐喻性象征意义。比如一张方形桌子，它作为饮食文化符号，与“饮食”和“家具”这两个聚合类发生联结，其指称性意义是餐具（餐桌）。如果它的边缘加上凸起边框，便失去“餐桌”的指称意义，进入另一个聚合类，比如作娱乐用具——麻将桌。如果再在它的四角挖开四个圆孔，那么它便成为另一种娱乐用具——康乐球桌。“餐具”和“娱乐具”之间的符号差别属于指称性意指，同归属为“娱乐具”的康乐球桌和麻将桌之间的差别属于区别性意指。

（3）本意性意指和衍义性意指。任何一个符号几乎都有人们最初“给予”它的意义，它在社会的约定俗成过程中已经凝固在符号中，成为符号意指的核心部分，这就是本意性意指（或叫原级符号意指）。本意性意指的表现可以是概念，可以是表象，可以是状态，也可以是用途或价值。符号就其本身的价值来说，它的存在都属于本意性意指。但任何符号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使用中被衍化，会随着使用环境和使用者的不同而形成一些本意中原先不存在的意义，这些意义渐渐成了符号所指的一部分。我们把符号由本意衍生出的意义叫衍义性意指。衍义性意指总是随着环境和使用者而出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它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并根据环境和使用者情况而作出意指反映。衍义性意指包括符号的换喻、隐喻、暗示、联想、象征、借代等修辞学上的意义，也包括语义学的派生引申义、语用色彩义等。例如“北极熊”的本意指生活在北极地带的一种凶猛动物，但在20世纪冷战期间成了北方某超级大国的代称。又如某些动物在特定艺术活动或体育活动中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吉祥的象征物。本意性意指和衍义性意指在语义学中被称为“本义”和“引申义”。

2. 动态意义的类型

前面所述符号的意指不一定会全部进入交际系统，在传播符号链接里参与或介入的不仅仅是符号本身的意指，还有与其他符号组合及在自己的聚合场中呈现传播者意图的意义、受播者解读符号的意义、传播环境或话语情景所形成的意义。符号在动态传播中形成的意义，也叫内蕴意义。动态意义包括三个方面传播者意义、受播者意义和场景意义。

(1) 传播者意义。符号定义有三大标准，一是有人认知世界的自由创造性，即它是只属于人类的一种独立创造，具有任意性和约定的特点。二是有表现客体事象的指称性，即它与语言的概念有直接的联结，并与客观世界的现实事象有间接的联结。符号本身不是事物，是事物的替身。三是沟通心理世界和经验世界的传播性，仅仅有前面两点还不能算是符号，只有它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物的互动中担当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角色，在人类行为中实现发挥调节和组织功能时，只有当符号进入传播范畴，才具有了符号的资格。也就是说，只有符号的运动才使符号意义得以实现。尽管符号意义的实现首先是在人的心理，在人的大脑思维过程中，但从传播学来看符号意义的原点来自传播者。在传播行为中，传播者把他所要传递的内心感受、思想、评论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构成意象并凝固在意指中，形成能够展示的意义。我们暂时把这种意义称作传播者意义，或第一意义。传播意义具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往往在符号直接意指意义外添加上传播者的自我创造，例如传播者针对受播者说："你不是人!"话语符号中的"人"，根据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和编码—解码中的主导性文化秩序，而添加隐喻意义。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你不具有人的X!"X就是传播者添加的隐喻意义，可以指人性或道德修养或情感素质等。非语言传播的物质形态的符号，事实上未必能准确无误地全部表达传播者想要传递的意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在传播者身上的，由于符号系统掌握不熟练(如不善言语或文字)，或由于知识和文化修养欠缺，或由于概念基于经验而理解错误等。原因在符号的，由于符号意义本身具有暧昧性，一是符号意指的模糊性，二是符号意指的多义性(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说到)，三是符号的意义历史性。于是，传播者意义有时就被受播者误读误解。

(2) 受播者意义。同一个符号和同一组符号的组合所构成的意指，所传播的信息，应该是明确而稳定的，但一旦进入符号链接往往千变万化，正是这一特点使人们有可能运用有限的符号来表达无限丰富的意义。然而千变万化的符号链接在特定的环境里，又是具体明确的，否则人们就永远无法沟通，无法实现交际了。问题是受播者身上也会出现传播者身上出现的相同现象，符号系统的掌握度，自身的生活经历、经验及知识文化修养度，对符号所表达的概念的理解程度等，都会使符号传播的意义在受播者心理造成反响，受播者就可能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和解

释所接收的符号。受播者对符号的领悟和解释而导出的意义，即受播者意义。受播者意义就是受播者解码产生的意义，有人称为“生产性文本意义”，也叫第二意义。受播者意义既不同于传播者意义，也不同于符号系统本身蕴涵的意义。就以文字符号的传播活动来说，传播者书写的是这个意思，受播者可能理解的是另一层意思；而且也不一定就是字面上透露的意思（所谓“言内之意”）。例如上引的话语“你不是人!”中的“你”就是受播者，他很可能会根据自己与传播者的亲密度，不把它看作是骂人的话，而理解为自己“不懂得感情”，认为是传播者的一句反语，表示传播者在提醒自己需要对对方更大程度的情感暗示。从理论上讲，传受双方对符号理解的“一致”是完成信息交换的前提，如果出现“不一致”就会造成交际障碍或产生误解。但是，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传播者意义和受播者意义不可能达到“一致”，也不必要求“一致”。比如经典的文本符号《红楼梦》，经过千千万万受播者的解读，形成了一门热门的“红学”，这显然是第一传播者曹雪芹所没有想到的，许多“红学家”充满感悟的精彩剖析，也许根本不是原作者的初衷呢！正是这种传播者意义和受播者意义的“不一致”，使文本符号在受众中实现再创造，在传播中使符号的蕴涵不断丰富，符号的文化地位不断增值。

(3) 场景意义。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传播意义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环境”的意指。“环境”能使符号产生“言外之意”。“环境”也说场景。它包含：①符号系统自身的环境，如书写符号系统的上下文、实物实体符号系统的空间布局、图像符号系统意境配列关系等；②传受双方的已知信息背景，如言语的话题、实物实体的“实用”功能、艺术系列的准备知识等；③系统存在的社会环境，如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氛围、传受双方关系和彼此了解程度等。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上述因素而衍生出来的意义，就叫“环境意指”，或叫“场景意义”，也叫第三意义。传播符号是我们与周围世界、内心世界进行有效交往的工具，但许多感受不是在符号之中的，常常是语意模棱的。比方说这样的话，“她的头发理得很美”，撇开“场景”的话，你就不知道“她”是顾客还是理发师；“她是两年前生的孩子”这句话也同样不能确定“她”是母亲还是孩子。没有背景文化等预备知识，中国人要理解交响乐是十分困难的，中国的书法艺术对外国人来说也同样是不可思议的。系统内在的“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总是首先从符号系统内部寻找意义，而符号的内在意义不是预先可知的，需要加以分解和处理，了解其组合关系和结构，才能使意义显现出来。比如手头有份菜单，先要分析它的“外在场景”属于哪种类型，是菜馆的？家用的？还是广告的？纸上谈兵的？研究它的“实用场景”即膳食的对象，是亲属宴席？家宴？朋友宴？丧宴？喜庆宴？还是特定的礼仪宴？再观察菜单的“内在场景”，属于哪种情况的组合和配列，哪种等级和规格，等等。在综合分析各种“环境”意指之后，才能判定这份菜单的意义。

6.2 可推论符号与非推论符号

符号学的推论证明，在某种意义上，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符号世界有其自己的生命历程。虽然符号是人创造的，可符号系统一旦启动，再不为人们的意志所左右，相反人自己的言语行为倒要受符号系统的制约。我们根据符号的“生命”运动方式，把符号分为可推论符号和非推论符号。

所谓可推理符号，指可以用语言广义地定义为传播的信息，并原则上可用“比特”①（或叫“算法语言”）予以预测的系统。这类系统首先包含有词语而无语法的无声语言，如旗语、非洲土人的“鼓语”；其次包括既有词汇又有语法规则的陈述语言。它们都可以归纳出一套立足于二元体系的“算法”，从而可以对系统生成的一切组合进行预测。陈述语言的实用层次是人类的有声语言，包括各种民族各个国家的语言。陈述语言的最高层次是人造的数学语言——数字化信息处理，它不仅能用于推论和预测，还能作一些有推论无计量的如数理逻辑、拓扑学、对策论等学科的基础科学，还能作为语言学、化学和遗传学的程式语言。

可推论符号的运动是一个有意识的智力行为，因为意识与符号的演变过程十分有关，意识就是推论行为的产物。大脑在很大程度上像一架计算机，因此它一方面是没有意识的，另一方面又只有在有意识的符号层次上运算，其运算的结果那一小部分才属于“第二性”的。现代计算机显示出它的“推论型”行为，做运算，有记忆，还可以追踪目标等，它能在所有被认为推论的和有意识的智力活动方面发挥作用，因为计算机正是借助了符号的可推论性来运作的。可推论符号系统对绝大多数生物学上的法则也适用，例如人类基因组基本信息的解读，遗传密码的破译等。

如果说意识是符号无意识的运动的结果，那么也许会出现一个悖论：符号的无意识运动哪里来的？如果出自人类的意识的运动，就显得矛盾了。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在符号运动中还有一个系统，即非推论符号系统。所谓非推论符号，指一些来自“经验即存在”的符号，例如中国古代著名小令《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

① 比特，bit 的音译，是信息的基本单位。数字化信息运作时，每传送二进制中的一个位数（0 或 1）的信息量，叫做 1 比特。这是数字化时代最时髦的一个符号，比特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好像人体内的 DNA 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科学家预测，未来世界将是一个比特时代，它将重构人类社会。比特时代的四个重要特征是：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从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数字化生存.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总不能认为“藤、树、鸦、马”只是生物符号的组合和介绍，“桥、水、道、风、人家、夕阳”只是自然景物符号的组合和描述，它所表达的是诗人马致远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感受：“古道”是苍凉寂寥的，“西风”是萧瑟悲凉的，“瘦马”是疲惫无力的。至此，小令已经不是单纯地写景了，而是“夕阳”下（符号传播的时间），在“天涯”（符号传播的空间），诗人发出的“断肠”感叹（传播者的心理反应）。其意指异常复杂而丰富，绝非可推论符号所能转述和表达的。这种非推论符号超出实证主义认识论者的研究范围，也不能用一般符号学理论和规则去解释——它不属于言语链中结构主义语法的解读对象。但是它们依然符合符号学的基本条件：其能指是言语的书写符号，是人的一种创造；其所指是在指称作者内心感受与外界事物事象的关系，具有能指与所指结合一体的意指存在。只是这一类系统在“不可言喻”的境界里活动罢了。中国的古典音乐、传统的国画和书法，梵高的风景画、巴赫的赋格曲等，都是一种符号的“语言”，不过它们不单是用来表达思想，而更是用来表达感受。它们的涵义无法用推论的术语来转述。一些最初出现的科学论断，比如哥白尼的“异端邪说”和牛顿的“苹果”，都曾因与通常知识（可推论符号）相左而被人们嗤笑过。正是非推论符号系统的作用，使人类的生活那么绮丽多彩，使人类的感受、情绪和行为的自我依据有了价值。

人类的符号有各种各样，它们虽然都不是一项孤立的功能，但它们按其性质仍可以分出不同的等级，当然其间充满中间状态和相互影响。但是，可推论性与非可推论性，可以说是人类符号系统中最具有意义的两大类。可推论符号表达的是现实事实，是符号学上的第一大系统。而非推论符号表达的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感受、情绪和行为的自我依据的价值。可推论符号的低级形式在动物系统里也能发现，比如动物的模仿性动作、为安全而寻找的巢穴地势和方位等。非推论符号则只有人类才具有，它们是无意识化的有意识表达，即使像微笑和流泪这些在动物界也常有的本能活动，但动物界中绝不可能有人类行为那样的创造价值和意识功能。非推论符号是符号学上的第二大系统。

人类早期在符号创建方面的认识一开始就处于可推论符号和非推论符号的彷徨中。比如在中国，汉字创造的“意识”活动中就有非常深刻的可推论印记，早期汉人在纷乱的客观世界里努力去发现客体事物的“类”，分别用汉字符号给予它们识别的标记，比如模拟客体事物形象的象形字，大量形声字和会意字当中设立的偏旁或部首，就是早期人类给世界客体事物分类的尝试。如象形的“艸”从表示本体草

到泛指草本植物;"木"从表示本体树到泛指木本植物;"禾"从表示庄稼到泛指种植作物;"日"、"月"、"風"、"雨"从表示太阳、月亮和风雨到泛指相关天象;"豕"、"犬"、"虫"、"豸"从表示猪、狗、蛇、豺豹到泛指动物,等等,虽然不能跟现代的分类科学相比拟,但是反映了古代先民认识世界的愿望和追求,以及对符号的粗浅探索。这些文字都是可推论符号。但是,早期人类仍然处在"无意识"状态中,他们意识到的自我和真正的自我尚有许多距离,更多地依靠潜意识的创造力去创造各种大量的非推论性符号,符号中到处可见神话的影子,到处表现出对神圣事物的崇拜,表现出人类最初的宗教信仰,于是形成了非推论性符号——原始艺术:音乐、舞蹈和崖画等。符号也被神化,符号的符号——文字则很长时期掌握在少数有能力能跟神沟通的巫师手里。可推论符号和非推论符号并行不悖地走过了数千年,成为人类表现世界和表现自我的工具,也成为人际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历史地走过来的符号,同时也成为人类自我的生长写照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载体。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归纳:可推论符号来自于"自我"世界对"自然"世界的反馈,非推论符号则来自"神性"世界对"自我"世界的反馈。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把亿万年的自然进化史演化为一个创造世界的盘古和一个创造人类的女娲。"盘古"和"女娲"是以最经济的方式保存人类史的非推论"符号"。但是在这两个神圣的名字里,我们却又看到了人类试图阐释历史的可推论符号原理:"盘古"就是瓠,圆而混沌,象征宇宙;"女娲"就是蛙,象征多育[①]。这两位天神原来也是一个"符号"。这样,我们发现符号世界有两个深层的特性,它们好比"生产能力"和"独立生命力"。可推论符号系统(语言文字、数学、逻辑、科学)是"生产性的",它有自己的"语法"(算法),可以使自己成为"有思想的机器",并能够预测。非推论符号系统(音乐、美术、诗歌)是"有独立生命力的",它遵循独立自主的法则,即不可能简单地把它还原为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或者其他学科。非推论符号的这种价值就是人类价值,它超出了只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繁殖之需要的生物价值。在生物价值与人类价值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我们可以看到这将不是一种自动平衡,可推论符号系统会从社会学、心理学或生物学找到"理由",可能使这种平衡得到稳定,也可能会导致战争或犯罪。但是非推论符号可以凭着直接的经验直觉,以特有的"独立生命力"实现表达和交流的"极点感受",使二者达到平衡。

非推论符号系统的高级层次表现是美术、诗歌、音乐、道德、宗教等方面的文化符号,人们在这一系统里获得的认识将是神秘的、美好的、极度兴奋的"极点感受"。它们是非理性的,非实用主义的,是超越了自我和非我的界限的东西。非推论符号系统在传播理论里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并被重视和研究。如果无数精妙

①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上)[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

的艺术品都能用推论的术语(简单的言语链)表述的话,那么艺术品早就失去了永恒的存在价值,艺术家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他们根本不必为一首诗、一幅画、一段乐章去呕心沥血了。现代心理学、现代艺术、现代解梦术和现代神话,都是在非推论符号的生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特别要指出,艺术传播符号就是典型的非推论性的人类情感符号。艺术传播符号为传播情感、主观经验的表象或传播人的"内在生活"的种种特征赋予形式。它跟语言符号的不同在于,语言符号通过"词"指向概念及概念所代替的具体事物,艺术符号却并不把我们带往超出它自身之外的意义中去。我们在艺术符号中发现意象并直接从中把握浸透着情感的意象,所以艺术符号是一种特殊的非推论符号,因为它不能像其他可推论符号那样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与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这就是为什么新闻图片不是艺术,未经艺术加工的照片也不是艺术的原因。虽然非推论艺术符号也具有能指形式,也能按照传播符号学原理去解析,但是符号与符号之间能指的组合或意指的接合,不是靠"可推论"来确立,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通道是传播者——艺术创作者非理性的"冲动"和"灵感"。从简单的感性形式到复杂的知觉形式和情感形式,都能在艺术中得到表现,艺术符号创造的是情感意象。在艺术符号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神性"世界向"自我"世界的反馈,传播者的"自我"意识冲动地、情感地投射在"神性"的艺术作品中。

可推论符号和非推论符号也不是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它们经常互相渗透,互相借用。在语言系统中,可推论符号构成了语词结构和意义的理据性,非推论符号则构成了语词结构和意义的联想性。汉语中从英语 blackboard 借用来的"黑板",从字符结构可以推论最早期的黑板是由"黑"色的"板"制作的;与"黑板"具有对应关系的"粉笔",也能从字符结构推论早期粉笔的组成和功能,表示它是一种白色粉末凝聚成的书写工具。在另一些词语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字符组合的非推论性。例如"凤凰"这个词语,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能说出它的构词理据,它究竟是一种神鸟还是两种神鸟?有人说"凤"是雌鸟,"凰"是雄鸟。但是,有人说"凤"是雄性,可比喻风流男子;"凰"是雌性,可比喻美貌女子。也有人说"凤凰"是一种不存在的动物,用它来象征高傲富贵;有人说"凤凰"是神异动物龙的对应物。民间还存在更多的说法。但考据学家会告诉你:"凤凰"古作"凤皇",就是"皇凤","皇,大也","凤"古通"鹏",所以"凤凰"就是伟大的神鸟(大鹏)。考据学家充满理据,从可推论符号角度分析。民间俗语言学也充满联想,从非推论符号着眼,进行认定。其实民俗学的解释里,也往往从非推论性解释中掺杂可推论性分析,比如他们引用司马相如的名曲《凤求凰》来证明"凤"是雄性,引用"龙凤配"的说法来证明"凤"是雌性。

所以,可推论符号与非推论符号之间,绝不是完全割裂的。可推论符号有时也得用上比喻或象征,非推论符号有时也必须依赖言语。事实是,因为言语也无力进

入最终的实在，而比喻或象征也总是很不充分。其中作为艺术传播的文学语言，便是具有双重特征的符号系统，文学艺术是集语言符号和艺术符号于一体的产品。文学作品是由语言符号组接而成的艺术，它独立地自成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语言或文字是它的能指，是它的表达符号。我们把它称为“文学中的符号”，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这样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由可推论符号组合成的意指群。文学作品内部所有语言符号必须服从传播符号学的一般规则。但是文学作品本身又是一个独立整体，表现了一种完整人类情感，它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学符号”。当我们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艺术符号系统时，作品整体的情感功能是由作品中各个符号及其结构共同实现，作品中相对独立的符号已经淡出整个作品的艺术意义，它们固有的符号意义都消融在作品的艺术意象之中，失去了一般传播符号的指称价值。我们把它们称为“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属于艺术符号，是美学意义上的符号。所以文学作品《水浒》里的“宋江”不能指称历史上的宋江，虽然用的是同一能指形式，其意指完全不同，前者是艺术形象，后者是历史人物；同样，我们不能把《红楼梦》里的主人公“贾宝玉”简单地比附作品的著作者曹雪芹，前者是没落王朝中一个典型的叛逆者形象，后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就如前面所引马致远的小令，诗篇里出现的“小桥、流水、人家”和“古道、西风、瘦马”，不是乡村风貌的真实意象，而是寄托着诗人深厚情感的艺术意象，所以它们不再是一般的可推论语言符号，而是艺术性的非推论符号。马致远的《秋思》之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就是诗篇的非推论符号的艺术感染力，感染力是非推论符号艺术意象的创造效果，也是艺术符号的重要特点。托尔斯泰曾说：“不但感染性是艺术的一个肯定无疑的标志，而且感染的程度也是衡量艺术价值的唯一标准。感染越深，艺术则越优秀——这里的艺术并不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换言之，不问它所传达的感情的好坏如何。”[①]

由此可见，美学功能的语言符号实际上是打破日常语言既定形式的艺术代码，在形式的组合与意指的接合上创造出新的艺术意蕴。因此，文学艺术在语言意义作用的两极上，一极以代码的常规为前提，组合成篇，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符号；另一极以不受常规代码的束缚为前提，进行意指接合成意境，这是美学功能的诗的语言。无疑文学语言是具有创造性的语言。文学语言的“花”能形容女子，它跟一般意义的“花”不是同一个符号，文学语言的“花”蕴涵着对于女子“美丽”、“娇嫩”、“芬芳”和“青春”等特殊的感受。如卡西尔所说：“与概念语言并列的同时还有情感语言，与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并列的还有诗意想象的语言。语言最初并不是表达

---

① 列夫·托尔斯泰.文艺论.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23.

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和爱慕的。"[①]文学语言作为文学艺术符号，与音响、线条、色彩、构图等其他艺术的艺术语言一样具有形式美感和情感的意义。

6.3 传播互动中的象征意义

人类传播是以符号方式为信息媒介的一个社会互动过程，因此一切信息都依托在动态的符号流中。符号动态的传播活动是为了传递或交流信息，而人类的许多信息包含着观念、思想和情感，都是非物质形态的存在，符号的指称通常很难直接通达这一层面，于是可推论符号要借助比喻或象征符号来实现意义，非推论符号要依靠言语符号的补白以显示其意指。国画上的题诗、乐曲上的标题等，就是用书写符号来提示非推论符号的意指。人类对于颜色的理解有明显的民族个性和文化特征，每个民族都有对各种颜色的好恶感和象征联想。比如黑与白一般是黑暗与光明的显证，人类追求光明，厌恶黑暗，似乎是生存的普遍规律。西方文化中常用白色代表正面的、美好的，用黑色代表反面的、丑陋的。芭蕾舞《天鹅舞》里白天鹅代表纯洁、善良和爱情，黑天鹅代表邪恶、欺诈和仇恨。在中国人的古老习俗里，也有类似的认同。但是，在具体符号化时却会出现很大差异，黑色是西方人丧事的标志，新娘要穿白色礼服；中国古代白色是丧事的标志，新娘要穿大红的礼服。颜色在民俗事务中的性征，具有非可推论性，要依靠文化传统去阐释。

一般说非推论符号的阐释要借助可推论性的语言文字进行，反之，可推论符号也要借助非推论符号提供联想。文学作品采取比兴和象征手法、生活中的请柬使用大红纸封等，就是用非推论符号的意指来充实可推论符号。也就是说，在传播活动中两套符号系统同时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当符号不仅仅以自身意指的本意来承载信息，更是通过符号衍生意义——象征（包括比喻等）来传播心理的、非生物性的、高层次的信息时，可推论符号与非推论符号更是形影不离，这样便引出了符号的象征性行为这个概念。

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经常把符号与心理现象联系起来，如赋予梦中接触到的一些符号以象征性意义，并与现实作一对多的稀奇古怪联结。一个舌头一碰就痛的病人梦见自己想要一份热舌头，于是这样解释梦里的象征：热舌意味着她想给她丈夫和前来劝架的人一顿臭骂；热舌意味着性交的替代物，因为她丈夫阳痿无法同她性交；热舌还意味着对她母亲有婴儿般的依赖；热舌意味着她幻想这是舌癌而感到死亡与惩罚的凶兆；热舌还意味着一个在梦境中以为自己达到全智全能的夸大狂患者。我们不考虑释梦者的解释是否合理和真实，只把这种透过符号具体形象的

① 卡西尔. 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91.

表层意义赋予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以传递与符号具体形象相似或相近的观念、思想，或寄托某种特别的感情，我们称为象征行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叫象征符号。象征符号是具有至少双层意义的符号，第一层是符号的本意，第二层是符号经过类比或联想获得的具有象征性价值的意义，即象征意义。

一切传播符号，其意义必须通过能指的物化形态来传递，能指是符号代表客体事象特征的可识别形式。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①]。福柯所说的"同感"，既是一个获得符号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传播符号的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一方的"财产"，也不是先验地存在于符号中的"事实"。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间进行符号交流，传播符号引发的意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思想和情感，就会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是历史的，有时变化会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而已。"同感"使传播的双方对符号意义达成基本一致，否则各自就会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联结中"寻找"意义。意义联结很远时，出现意义的空间距离很大，要靠联想去填补。通过传播符号的相似性和毗邻性关系，受传者借助自身的"主导文化"或文字符号的"优先解读"提示，来获得符号的意指。按照符号学的观点，符号能够表达的意义首先要获得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历史的、当下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对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认可。我们每个人出生和成长过程已经有了语言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必须接受约定俗成的语言事实，因为语言不是个人的。因此，真实性也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也需要以集体的认可为前提。但是，在"寻找"意义时，无法从相似性或毗邻性关系中得到启示，在传播过程中又没有经验性约定和现成的知识储存，那么就需要受播者去创造"神话"。我们借用符号学家一贯用的概念"神话"，实际上是指未经约定的新意指。那么，如何形成"神话"，又如何使"神话"成为"事实"呢？

"神话"的有效性通过两个方面获得支持：在第一个层面上传播符号(权且称它为基本符号)的意义(类似于词典中一个词的本意)凭借所传递信息的特定性和信息的准确性给予支持。当能指与所指在第一个层面上的对应关系确立后，在第二个层面上，基本符号进入第二符号系统与新系统的所指建立对应关系，组成新的符号。根据这个原则，传播符号可以继续进入新系统，建立新关系。但是符号的创新往往不是循规蹈矩一步一步深化的，而会出现跃迁，跳过中间系统，突然以新的意指呈现，特别是进入非推论符号。这时类比、联想和隐喻就特别发挥作用。传播符号的象征意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

① 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译. 词与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2：80-81.

象征意义代表一种非推论符号的意指，例如给少女送上玫瑰花象征现代年轻人的爱情表白，出土陶器上的双鱼图像征原始部族男女的性爱。符号“花”和“鱼”的表层意义向第二层意义转化，这种转化的实现虽然有某种内在的类比和联想，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精神活动的深层非推论符号的运作，是经验性的非理性创造，其中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对生活的感悟。但是，象征意义在反复使用中获得社会性和约定的“经验”，往往成为符号意指中固定的一部分。当我们提起“银行”的时候，大家不会把它的符号意义与黄金白银联结，因为“银”的隐喻性意指与现实生活中的钱币（包括硬币和纸币）功能早形成了固定联结。

象征符号也只有在传播的互动中才能实现价值，传受的任一方出现不协调，符号就会失去象征意义。没有传受双方的互动关系，也就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在这里，“意义—互动—解释”正是象征意义得以产生和实现价值的三个前提性的环节，人（传播者）是依据“意义”从事行动的，意义是在传播“互动”中形成的，意义是由人（受播者）来“解释”的。当符号得到“解释”时便产生回应，原来的受播者转为传播者，他把自己的“解释”注入符号，形成“意义”。于是在新一轮传播互动里，“意义”已经不是原来层次上的意义。新一轮传播活动中，受播者是第一轮的传播者，他会对自己在第一轮传播中的行动依据的“意义”进行修正或充实。这个过程，叫“意义交换”或“符号互动”。意义交换必须在传播活动双方具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中实现，其关系可以有全同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如果是全异关系，那么交际互动就失败，意义交换无法实现。如果是全同关系，传受双方达到完全一致的认识，那么就没有进一步交换的必要，互动无法继续进行。只有交叉关系才使意义形成交换空间，使传播互动可以活跃和持续，意义交叉部分就会随着传播互动信息轮的不断滚动而不断扩大，从而加深传受双方的感受的交流和彼此的理解。

在现实话语中，当某人惊呼：“火！”在场人将根据现实场景加上自我联想作出反应。“火！”的理性意义一般会直接地进入传播，但它的象征意义在互动传播中往往更能产生强烈的刺激。不同的回应一定与不同场景的行为联结着，那么“火”的象征意义也会获得不同的解释。如果回应是：“打火机，给！”便跟抽烟场景的行为联结。如果回应是：“快，快拨 119！”便跟火警场景的行为联结。如果回应是：“是啊，真火！”便是与一种热烈场景和情感共鸣的行为联结。回应过程实际是“意义—互动—解释”的传播过程，符号组合越是简单，有时想象空间就越大；符号组合的非推论性越强，符号的象征性意义也就越丰富。人们把诗歌说成是“凝炼的语言艺术”，其道理恐怕就在于此。

一个传播符号出现在传播活动过程中，一般会引起三层意义：科学的、实用的、美感的。科学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意义联结上通常是单一的，一般不引起联想。在科学研究领域，每个符号都跟理性意义联结，要求准确表达科学概念，表达所研

究对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必须排除一般符号的多义现象。功能符号的意义联结是双向的，既指向客体的实用意义，又指向心理的联想意义。非推论性艺术符号则主要表现的是美感意义。但是，符号在互动传播中，除了自身的符号意义外，还会产生交换意义。

传播互动中符号的意指的象征性越强，意义交换产生的价值就越大，“自我”和“世界”这种最基本的二元论更被显示出来。并且“自我”和“世界”在意义交换过程中会进一步出现分化。“自我”分化为“主我”（主体意识中的“我”）和“客我”（别人意识中的“我”）；“世界”分化为“主观世界”（即符号世界）和“客观世界”（意指世界）。“主我”和“客我”互成镜像，“主我”通过符号的传播互动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的意义交换才达到对“客我”的认识，从而完成两者的统一，或叫身心合一，实现真正的社会“自我”。“自我”的形成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这过程还包含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统一的过程，符号世界向意指世界转化的过程。

我们看到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符号世界的范畴和概念化，比如欧几里得的集合空间、牛顿关于时间和单向的因果论——在一般生物生存领域已经够用了，可是一旦人的认识深入到微观世界（电子、微粒子）或宏观世界（银河、天体）里，这些范畴就不再适用了，相对论中的时空连续体和量子力学的统计因果律，实际事物的结构越来越与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概念远离，变得简直不可思议。另一些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也用不同的方法经过不同的过程得出类似的结论。还有一些学科（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电影）原先符号的“意义”（或说被淘汰的概念）已无力应付全部存在的客体事实，不能胜任原来的符号职能，于是被交换、被扩充，甚至被“神话”化。世界被分化，一个是经验世界，那里保留着最常用、最一般、最抽象的符号以维持经验的“秩序”；另一个是纯符号化的世界，用来调整“主我”和“客我”的关系，虽然更倾向于人类的精神活动，但是它们却更接近真实的物质世界。再有一个便是“神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用灵感方式的想象把“主我”融入到“客我”，或者异化为“非我”、“无我”。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传播符号都具有生命，一切都是有感情之物，一切被形象化、艺术化和“陌生化”。如文学作品里的语言符号，都找不到客体事象真实的对应，出现的“我”也非真实的“我”，更不是传播者自我写照的符号。

6.4 符号传播的基本模式

人类创造了作用于传播的符号，赋予符号以意义和象征意义，从此人类摆脱了自然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束缚。传播符号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产生能动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传播符号系统以自己的秩序来建立社会文化系统，并制约人类社

会生活和人的行为。在作为人类最基本活动方式的传播活动里，符号化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行为。一切事物包括人自身正在被用作传播符号的身份进入传播系统，给以符号意指意义和象征意义。自身被符号化的人经过人际间的互动，“人”的意义被交换并通过交换实现自己对现实的追求和了解。

传播符号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符号和符号的内容，而且研究整个世界。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凡是人类行为的一切“过程”（人际沟通的过程、认识客体和自我的过程，以及给予世界万物以意义的过程）、涉及的一切事物（包括客体世界、内心世界和符号世界；物质的、精神的和虚拟的），以及所有对象物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其最基本的目的首先在于使研究者把人类的传播行为、传播方式和传播象本身的内容构成，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更准确、更清晰的知识。传播符号学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来精细化我们对对象的认知，正如显微镜为植物学家提供了工具来使对象认知精密化一样。同理，显微镜下的细胞图像和日常花叶的图像也就完全不同了。前科学时代的知识“图像”与科学时代的知识“图像”，就因观察的工具和方法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世界的认知中可以有“常识”和“科学”的区分，在人文世界的认知中可以有“实用”和“艺术”的区别。传播符号学研究人在符号化世界中的作用，同时研究人在符号化世界同时符号化自我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符号学是一门用符号研究符号的学问。

这样，“人”生存的空间正在成为一个包括“人”的符号空间，或意义空间。甚至我们生活周围的消费商品、日用实物也被深刻符号化，人们已经满足于它们的“实用”功能，而把它们（包含膳食、服装、家具等）变成功能符号——符号化的实体物品或符号化的服务。人们在自身符号化的过程中，不是在消费物质而是在消费“符号”，即由物质消费转化为精神消费。人们在挑选服装时，不只是为了满足实用，更注意服装的款式、风格、质料等能指层面反映的符号意义，以及在意义之外给予人们的象征价值。中国关于服装的社会功能有许多谚语，如“衣成人，水成田”、“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衣是人之威，钱是人之胆”等，已足够暗示服装象征意义的人文价值。无论是膳食或购物、汽车或家具、娱乐或观赏，无论是理发或洗澡、旅行或住店，人们总是从商品或服务中寻找“实用”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寻找某种只属于自己的“感觉”，体验某种自己神人的“意境”，追求某种表现自我存在的“价值”。我们也许随时能从大量的广告中领悟到这一点，聪明的广告商始终善于从商品的人文价值观念切入，刺激每个可能的消费者的“自我”，创造着商品实用价值背后的“意境”，引发人们购买的欲望。

由于传播符号的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在“组合—联想”合二而一的空间展开，能指和所指的联结形成一定的“关系”，“关系”使符号具有“共同性和共享

性”，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共同所有。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但是，由于同一群体的每个成员认识有深浅和感知有先后的差别，相互的共同性就深受历史文化积累和个体知识素养的影响，于是在对符号组合意义的解释和联想意义的生成方面个体差异很大。作为本身也是“符号”的“人”进入传播符号系统，既是传播者或接收者，同时又是符号组合的潜参与者。因此，当我们在解释某个传播符号或者运作某个传播符号序列时，我们事实上已经作为“主体符号”在符号运动中充当了角色，从而人作为文化传播的传播符号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前面已有叙述，符号有可推论符号和非推论符号两种系统，前者在传播过程中导致事实，后者在传播过程中导致价值。事实来自符号的本意，价值来自符号的象征意义。人从两种系统的交互传播中一方面接近现实世界，接受事实；一方面超越现实世界——在自我世界中创造意境，获得价值。整个传播过程非常复杂，它包括几个构成要素：

(1) 传播者，又称“信源”。

(2) 受播者，又称“信宿”。

(3) 信息(或讯息)，即由符号系列组合而成的意指系统。

(4) 媒介，又称“信道”。

(5) 反馈，指受播者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

因为符号本身是信息的携带者，所以符号的传播一般可以从信息传播原理去解释；但是因为符号携带的是双重信息，所以符号传播有内部的自我传播和外部的信道(空气、光、电缆等)传播。符号传播又必然是一个互动，所以有递归传播和反馈传播。

所谓“自我传播”就是人在大脑内部进行的信息处理，即把接受的外部信息或需要传播的信息进行编码(符号化)。或把接收到的外部信息进行解码(意义化)。虽然这是个体系统内部的传播，但对符号的形成和输出有关键作用。以语言符号为例，言语的编码经过由思想到扩展性话语的复杂途径。这里需要把由动机产生的意向或思想实现符号化，即借助内部言语机制把思想及其语义表象改变成词语，然后纳入话语的深层句法结构，进而转化为表层句法结构，再呈现为线性序列的扩展性话语。言语解码即言语理解，可以称为编码的逆向过程，只不过可能要比前者更复杂。首先受播者应能感知和理解每个接收到的单词，其次能根据句法规则理解整个由单词组合成的句子系统，接着，是对整个传播符号串——句子进行理解，形成整个话语链的意指——不是各个单词符号的意义的总和，而是从话语链本身

显示的意义到言语外隐含的、象征的意义，中间包括非常复杂的逻辑推理和充满联想的非推论心理过程。

所谓“信道传播”就是外部传播，它从传播类型说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从传播方式说包括言语传播、书写传播、电讯传播、影视传播等。无论哪种传播都必须通过某种媒介，媒介即信道。传播媒介一般指两种类型，一种是传播信息的载体或中介物，还有工具和技术等；另一种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团体或传媒机构。

所谓“递归传播”就是符号一边组合一边传播，不断把一个多元的符号链（或符号图、符号构架）按二元组合原理分级逐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语义团。递归传播时不仅进行符号组合中意义的传递，还进行逐步降级减元联结，这样既便于“算法”操作，又限制了符号的自由组合或成分的随意移动，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完整性。递归传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传播符号序列里每二元实现组合时，所有的临时结果都暂时保存在符号串的某个基本元中，然后再进行下步的组合，新组合的临时结果也同样暂时保存在符号串的某个基本元中，如此一步一步地推下去。下面就用传播递归法试处理一个言语符号链：

言语链	他	去	年	在	实	验	室	用	电	脑	努	力	地	干	了	十	个	月。	
符号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一级二元组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二级二元组合	1		2	3		4			5				6		7		8		
三级二元组合	1		2		3				4				5		6		7		→1

第一级把 19 个语符（语素）递归组合成 12 个意指单位（词）。第二、三级又把意指单位进一步递归组合，减低到 7 个“意指元”（成分）。最后复归为 1 个完整的“表达元”。递归法不仅是一种操作，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它把信息容量扩展到最大，而使承担的符号“元”降低到最小。这样，既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又便于传播信息的接收。

所谓“反馈传播”就是符号传播的一种自动平衡，即当符号正在响应外部干扰（任何传播都不可避免出现干扰）的系统中，输出被监控着返回输入，以便使整个系统的功能保持理想状态，或者趋向预定的目标。反馈模式大致如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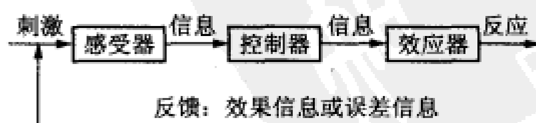


图 6-1

“传感器”相当于视听器官，“控制器”就是经过训练的大脑，“效应器”相当于言

说器官和行为器官。反馈把系统的现时运动趋势与它的历史的控制效果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另外，我们看到在传播过程中，符号所传递的目标信息和效果信息都是随机变化的东西，系统中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噪声干扰，因此传播活动不太可能一次完成，必须有一个过程来演进。为了实现传播的目的，必须随时将效果及时反馈回来，以调整后面的传播。但是反馈传播不像图示那样单向和直线，调节则表现为多元的相互作用，因为符号价值包含许多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某种意义上获取反馈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是受播者的能动体现。反馈是传播活动双向性和互动性的积极反应，也是符号实现价值的重要机制。

我们发现，在递归传播中通常都有反馈传播的参与，这才保证了传播中不致丢失信息或传递错误的信息。我们假设有下面一段话语：

> 两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分别获得了个人冠军和亚军，后来都进了省城大学，在计算机数学方面有很突出的成绩。

话语中画线的部分表示存在着信息的噪音干扰因素："两个班级的同学"可以理解为"两个"班级的同学，也可以理解为"两个班级"的同学，前一个理解只涉及两个人，后一个理解可能有上百人；"进了省城大学"可能是进了名称叫"省城"的大学，也可能是省城里的大学；"在计算机数学方面"需要看"计算机数学"是一门学科名称呢，还是对"数学"进行计算机运算"方面"？第一个多义性噪音干扰通过后续话语"获得了个人冠军和亚军"的信息，进行反馈而消除。第二个多义性噪音干扰则必须依赖社会背景知识来解决反馈问题，要知道这两个同学所在的省城里有没有以"省城"命名的大学。至于第三个多义性噪音干扰，就要根据这两个同学的具体学习情况来决定。因此，事实是反馈传播是在递归传播基础上实现符号序列解码的过程，整个过程是一种综合知识的运用。

结　语

符号指称客观世界，但符号不等于客观世界本身。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意义，但意义却不在符号之中，意义只是符号使用者的心理效应和抽象的概念化事实。但这里又不得不回到最早的问题，什么是符号？符号是人类在心理与行为上不同于动物的最显著的特征。符号在现代人类学、哲学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符号”是歌德的世界观和诗的核心，“符号”是荣格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符号”是申农关于信息定量测定及其理论的立足点，“符号”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奠基石。“符号”是伟大哲人哲学思考的起点，“符号”是不朽艺术驾驭成功作品的依托，“符号”使人生变得辉煌璀璨，“符号”使世界更加色彩斑斓。

对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研究正越来越引起科学家们的注意，符号形式及其范畴既不像康德所假定的那样是先天的、被动消极的结构，也不像休谟和实证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后天的、靠简单重复性形成的，而是个体的智能的集合和有关功能的共同创造。人类在创造符号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心思，构成符号形式的不仅有“理性”的成分，融入普通常识和科学知识，也有表示人类智力活动和文化积累的全部——语言、神话、艺术等等特征的一切感受。符号既是理性的锐器，帮助人类从自然界中走出来，向着无限的世界挑战；符号又是情感的阳光，让人类的每个有血有肉的个体充满智慧和才华，成为具有爱的心灵的美丽化身。人类创造着世界，也创造着符号，也因此创造着“自我”，并使客体符号的虚指性转化为“自我”符号的实在性。

符号纯粹是人类对客体事物的刻画吗？

符号形式也许有过对客观事实的模拟，但它仍然凝聚着每个人的智能。就拿原始汉字而言，人们都说象形是它成立的基础，但仔细考察则发现并非如此，真正含义上的象形字只占汉字总数的极少比率，2%都不到。而且即使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象形字，也包孕着人类祖先的高度抽象的思维结果。比如说描绘婴儿的一个“子”字，甲骨文中刻画成一个脑袋大大、双手摆动而只有一条腿的样子，见图1（Ⅰ）。人们都说这是个象形字，那么为什么婴儿被描绘成一只脚的呢？难道原始人的婴儿生下来是一只脚的吗？文字设计者也许是这样思考的：婴儿的脑袋跟身体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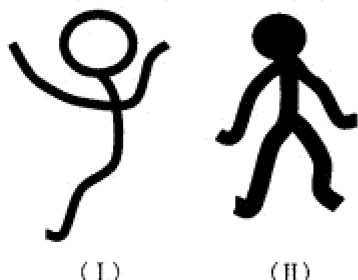


图1

相对要显得大，而且婴儿不会走路，这大概是婴儿与成年人的最大区别特征。所以就把“子”的头画得特别大，把脚画成只有一只，表示婴儿不能走路。反之，甲骨文中表示成人概念时，就画了一个并不突出的头部，而双腿分叉的“大”，以表示是个成人，见图1（Ⅱ）。我们看这两个字严格说根本算不上“象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汉字是“象形”的产物，而可以说是原始先民根据客体事物形象进行抽象，它已不是对客体事象的临摹，而是抓住了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创造，是一个符号。再说由“大”派生出来的“天”，如果说“大”还算是成熟人体的象形，那么“天”（指事字）就根本无象可形了。在成年人的头顶上加一个标记，象征人类头顶的“天”。这个富有象征色彩的“天”（包括神话学、心理学、天体学和文学艺术意义上的天），已不是简单的“给予”意义，而是同一文化活动中不同领域密切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的产物了。

一切符号都是人类活动中经验的、理性的或纯粹无理据地感受的相互依存的结果，我们很难区分原始汉人的模拟式绘画和象形符号有什么不同，很难区分象形符号和象形文字又有多大区别；就如我们无法指出实物写生和抽象绘画明确的界限在哪里。一个人打喷嚏时，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性反射什么是礼仪性符号，事实则两者都是。一个人处在被“关系”罗织的网中，几乎一切行为被规范而符号化，于是一个生理性反射的喷嚏不管是自然状态还是意识状态都被刻上礼仪文化的印记——成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微笑、哭泣等等无不如此。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整齐划一地要给符号归人某种范畴，因为符号就是符号，它们既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又是现实世界的符号；它们在给世界万物定义，也在给自己定义；它们以其可推论性使世界变得有序，又在无意识层次上创造着另一个世界——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比真实世界更属于人类自我。

第二个问题，符号在人类思想行为中的作用究竟多大？

回答这个问题，不妨把人类放在与动物比较的大系统里观察，那么首先人类肯定具有社会的先天本能，人类正是以此组织成社会并须臾不离地生存其中。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的这种本能似乎又远远比不上蜜蜂、蚂蚁，蜜蜂、蚂蚁比人更社会化得多，它们精心组织了一个社会，分工细密，等级分明，没有族群内的战争，也没有名利权力之争。但这是一个纯粹以本能的直觉为基础的社会。其次，人类组织成社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由人类自身创造的原级符号系统，与语言高度发达的情况相反，人类直觉器官的能力则大大减弱。然而蜜蜂和蚂蚁却具有精巧复杂的天生的通讯系统，它们能运用自己的本能的“符号”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和控制行动，有时比人类还更有条不紊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另外，动物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简直到了出神人化的境地，与之相比，人相对地被异化而缺乏了适应性变化，到处表现出人的“生物无助性”。甚至在一些人身上还出现强迫性不适应症。商代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在周灭商之后不能适应社会的变

化，竟然耻食周黍（“周黍”对这两位“圣人”而言，已是符号化的食物！）而离开社会群体，躲避到了首阳山上，靠野菜野果充饥过活。一个普通的农民告诉他们，这个天下都归属于周王朝，那么首阳山的一草一木不也是属于周王朝的了吗？两个顽固的老头竟然就停止采集，饿死在首阳山。在封建社会里，一直把他俩看作抱节守忠的典范。人类因着符号的作用扩大了这种“不适应性”。

符号还在另一个领域产生着超乎寻常的影响。所有动物都有某种仪式化的潜在力，几乎所有动物都有独特的求爱程式，雄性孔雀的舞姿和开屏作为求偶的“艺术”程式，便是很典型的事实。在人类社会中，性行为则更加进一步程式化，把原始的性爱本能掩盖在富有想象的仪式背后，成为一种习俗和风气。比如中国古老婚礼中新娘的头盖、绣球红带、洞房花烛等完全是以礼仪方式再现原始抢亲的“游戏”。原始婚姻曾有过抢亲的历史进程，男方把抢来的新娘安置在本部落的山洞里，然后乘着黄昏时结合。这一历史面貌在汉语言文字中被符号化地真实记录下来，如“洞房”（把山洞做新房）、“娶亲”（“娶”即取，抢的意思）、“结婚”（“婚”古作昏。乘着黄昏结合）等，同时还用非语言形式的礼仪符号把这一原始婚姻的“原型”再现出来。但正是这种符号化的礼仪，使人类逐步进入文明时代。也唯有人才可能使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性行为）符号化为一种程式的礼仪，每一礼仪（包括吃穿住行各个方面）后面都蕴涵着文化信息。

这里大体说明自然界有两个种类进化的分支，恰好表示了两条通向较高级行为方式的可能途径：一条是靠高度发达的直觉，该途径的终点是昆虫社会；另一条虽然直觉能力相对不够发达却靠着自己创造的符号，学习或模仿来推动自己的行为，该途径通向哺乳动物和人。第二条途径又随着对符号的自觉使用而使人与哺乳动物区别开来。

第三个问题，符号是怎样发生的？符号意义是从哪里来的？

符号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与语言怎样发生的这个问题一样，是个古老而一直困惑着人们的问题。由于它是如此神秘而重要，不少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法国的卢梭、勒南，德国的莱布尼兹，美国的亚当·斯密士、洛克等，先后提出种种假设和看法。人类学家摩尔根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方案都会遭到重大的困难。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放弃了，因为大家公认它是一个讨论不出结果来的问题。”[①]足以说明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以致巴黎语言学会 1899 年会章上明文规定：“本会不接受任何语言起源及世界共同语的创造问题的报告。”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一直没有放弃探索的努力，而且也没有约束住人们对这一问题孜孜以求的大胆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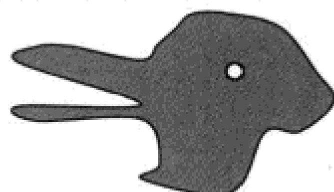
符号学的前身神话和巫术是和早期人类的有声符号——语言紧密地交织在一

---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起，可惜最原始的口头言语没有提供任何与符号起源相关的信息。也许原始言语是由许多有意指的符号（词），也许还没有什么组合的规则（语法），还不算陈述言语，只是有某种区别意义的叫喊。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实施巫术，不论是口头的（相信叫一下某事物的名称就能控制该事物），或非口头的（旧石器时代留下的岩画以表示对某一种动物的支配或实现狩猎的愿望），都应该归之于最原始的符号行为。图腾、原始艺术、宗教仪式、神话或巫术的主题就是把现实中的实体变成神灵化的符号，相信符号具有神灵并能把自己的意志转移到其中去。这个过程应该与现代符号学原理是相通的，把生命或神灵描述成野兽或别的自然物，把内心感受转化为实物，即使是一种不完全物质性“精”、“神”、“气”等心灵的实体都转化为外在的实体。这样，符号具有了超人的力量，代表事物或心中感受的符号变成了确信在现实中存在的精灵和神仙。从此出现了奇迹，好像符号（词）一下子变得高不可攀、神通广大，甚至符号本身就是神圣的实在。于是符号获得了意义，获得了与实物实体不一定有实在联系的象征意义和价值。对符号的这种“巫术”信仰促使了人类不再依赖物质实体思维，只要借助符号的“巫术”就能进行思考，甚至只要有符号“巫术”就可以支配和控制事实。符号的指称功能就是从这种原始思想中成熟起来的。

因为符号能神秘地代表和暗示其自身之外的东西，就把我们领入了知觉和错觉的两重感觉和两重联想中。符号直接意指的知觉把我们引向客观事实，符号含蓄意指和互动意指的错觉把我们引向象征意义并形成艺术。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提供给我们一张图（如图2所示），他说：“我们既能把这张画看成兔子，又能看成鸭子。懂得这两种解读并不困难。描述一下我们从一种解释转换到另一种解释时发生什么变化，就不那么容易了。显然我们并没有那种错觉，以为自己面对一只‘真的’鸭子或兔子。纸上画的这个形状跟那两种动物中的哪一种都不太像。然而在鸭子的嘴变成兔子耳朵时，毫无疑问这个形状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形，而且把在此以前被忽视的一个部位加以突出，成为兔子的嘴。”“我们在看到鸭子时，也还会‘记得’那个兔子，可是我们对自己观察得越仔细，就越会发现我们不能同时感受两种更替的读解。”[①]这张画就相当于某个符号，不管它给我们如何的错觉（象征意义），我们感受到的形象总是使我们与真实的事实联系起来。贡布里希还用了镜子的例子，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自我似乎跟我们自己是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镜子里的“我”的形象的大小是现实的“我”的形象的大小的一半。几何学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我们还要固执地相信“我”在镜子里看到了实际上的“我”（本来的大小）。符号像


图2

① [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

镜子一样反映的是虚像，我们宁可把它当作实像。实像和虚像二者不可兼得，因为我们既不能自己看自己，又不能用错觉去观察错觉。符号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这里，符号形成“错觉的艺术”，使我们获得最大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快感。符号的真实度，决定于媒介，就像错觉程度与镜子质量有关差不多，不过这就不是符号学要解决和研究的问题了。

既然符号通过媒介折射地传播，不可能避免错觉，那么，尽管错觉给人一种独特的感受和心灵的享受，但人们还是希望达到真实，于是为了减少符号的错觉，常常借助第一系统——语言（言语）或文字（书写）来给符号以解释（旁白或说明）。因此符号学必须从语言学着手，语言符号的研究是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最后我们要指出语言符号实际上是符号传播中的最有效的、足以避免错觉的媒介。



参考文献

[1]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
[2] 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卢利亚.神经语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 米歇尔·福柯.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7] 余志鸿、黄国营.语言学概念[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
[8] 余志鸿.中国传播思想史·古代卷[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9] 余志鸿.符号——传播的游戏规则[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10] 余志鸿.现代语言学[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11] 戴元光,金冠军.传播学通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1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3] 张祥平.人的文化指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 B·邓斯,N·平森.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5] 克特·W·巴克.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16] 卫志强.当代跨学科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17] 约瑟夫·房德里耶斯.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8] 利奇.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学院出版社,1985.
[19] 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
[20] 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2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2] 皮亚杰.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3] 公孙龙子.涵芬楼藏影印明正统道藏本.
[24] 《荀子·正名篇》,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传播符号学
作者＝余志鸿著
页数＝１５７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７
ＳＳ号＝１１８９２２３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１９０６８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ｚｄｎｅｔ．ｏｒｇ．ｃｎ／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６１９０６８３＆ｄ＝８８ＡＡ５０６３Ａ５３ＤＤ１０７６６ＡＢＦＤＦ６９３４Ａ２３５Ｂ